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496/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6949
地 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 99 号
邮 码：510400
电 话：(020) 26297022、26297033
电子邮箱：gdsy_xbbjb@gd.gov.cn、
2001xb@126.com
出版日期：2023 年 1 月 18 日
设计排版：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印刷单位：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定 价：15.00 元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心

主 任 吴显标

副 主 任 鲁开垠 潘 清 杨应棉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爱霞 冯颖红 吴显标

张 山 杨应棉 林少红

郑 锋 戚志恒 鲁开垠

潘 清

主 编 潘 清

副 主 编 张 山

编辑部

主 任 张 山

副 主 任 余 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新时代团结奋斗的逻辑探析 黄桂荣 (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劳动观的五个维度 韩 雷 (10)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刍议中国共产党民族凝聚核心地位的奠定 陈载舸(16)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探究与实践启示 程林顺(20)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岭南文化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价值与路径 车孟杰 (26)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推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研究 中山市委统战部 (32)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归国人才群体的基本特点 左 玲, 何 虹(37)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现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 在陆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刘 强 (44)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及其对香港政治发展的影响 覃辉银(5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进路研究 常庆林 (58)

协商民主研究

- 新时代地方政协践行群众路线的路径研究 徐 军 (64)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 以程序民主推动实质民主——《蕉岭议事规则》创制、价值与成效 莫岳云, 许国燕 (69)
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张师平(76)

中华文化研究

-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杨竞业(82)
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崔晓敏, 施言志(88)
红色资源的“五个认同”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以茂名市为例 莫飞燕(93)
新时代背景下江门非遗保护与统筹发展研究 余文星(98)
南越国食官考 乐新珍(102)

一家之言

- 乡村振兴视域下失地农民转型的社区教育模式研究——以增城区社区教育学院为例 李 霞(109)

Main Contents

A logical analysis of unity and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Huang Guirong(5)
Xi Jinping's five dimensions of socialist labor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n Lei(10)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al cohesion.....	Chen Zaige(16)
Histor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ith cultural identit.....	Cheng Linshun(20)
The value and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Lingnan culture into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Che Mengjie(26)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nited Front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Zhongshan Municipal Committee(32)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turned talents in the early founding ceremon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uo Ling, He Hong(37)
A stud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young teachers from mainland and Taiwan.....	Liu Qiang(44)
Perfecting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Qin Huiyin(52)
A study on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Chang Qinglin(58)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local CPPCC's Mass line in the new era.....	Xu Jun(64)
Promote the actual democracy of procedure democracy– "The Rules of the Banaolin" creation, value and effectiveness...	Mo Yueyun, Xu Guoyan(69)
The important role of United Fro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ways to achieve it.....	Zhang Shiping(76)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Dongjiang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to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Yang Jingye(82)
On the thought of “Harmony”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Cui Xiaomin, Shi Yanzhi(88)
The value of “Five identities” of red resources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	Mo Feiyan(93)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Jiangmen's non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search.....	Yu Wenxing(98)
Examination of food officials in South Vietnam.....	Le Xinzhen(102)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less peasa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engcheng Community Education College.....	Li Xia(109)

新时代团结奋斗的逻辑探析

黄桂荣

(肇庆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73)

摘要: 团结奋斗既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主题词, 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锤炼铸就的宝贵精神品质。要从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中深刻理解团结奋斗的理论逻辑, 从党的百年光辉奋斗史中准确把握团结奋斗的历史逻辑, 从掌握历史主动开创美好未来中深切感悟团结奋斗的实践逻辑。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基础, 努力维护团结奋斗的局面, 凝聚起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关键词: 团结奋斗; 新时代; 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05-05

“团结奋斗”既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主题词, 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锤炼铸就的宝贵精神品质。2022 年 10 月 16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从大会主题到铿锵结语; 从强调“三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 到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从强调“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才能胜利”, 到号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无不闪烁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团结奋斗。在新征程上, 我们要深刻把握团结奋斗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基础, 努力维护团结奋斗的局面, 凝聚起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从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中深刻理解团结奋斗的理论逻辑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伟大团结奋斗精神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滋养

传统文化经典中有着丰富的关于团结的文献记载, 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美德。如古人“和衷共济”所强调的就是团结, 这里“和衷”意为和睦同心, 即要求团队成员彼此同心, 方能共渡难关。又有古训: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兰。”意思是说, 志同道合的赞同话语让人如沐春风, 而同心协力可以汇聚成巨大的力量, 无坚不摧, 无往而不利。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的巨大的“和”字, 就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和为贵”的道德实践原则。将其上升为人间至理、达道,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它以超越时空的智慧、价值和理想, 绵延、丰富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理念, 成为凝聚人心, 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

收稿日期: 2022-12-13

作者简介: 黄桂荣 (1964.10-), 男, 广东新兴人, 中共广东省肇庆市委党校 (肇庆市社会主义学院) 统战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与统战理论。

国际关系的基本遵循。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奋斗问题

在《共产党宣言》中，面对“旧欧洲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使命，主张“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 (P43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基本口号，写入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部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早在 1872 年，马克思在总结第一国际的经验时就指出：“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2] (P180)} 列宁在总结革命斗争的胜利经验中指出：“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分子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3] (P270)} 因为劳动者的团结行动，必将汇聚成磅礴的前进动力，推动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团结奋斗精神，团结奋斗构成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团结统一问题，特别强调党组织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三）培育和发扬团结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

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不同时期历史任务，通过创造性的团结实践解决了为何要团结、团结谁和怎样团结等问题。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向党内一位高级干部谈过什么是政治，他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告诫我们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团结入手，最大限度地动员与组织群众，团结和凝聚革命力量。号召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

在一起，画出最大同心圆。“石榴籽”“同心圆”之喻，生动体现了中国各民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血肉联系，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要把维护民族团结、多党合作作为基础性事业来抓。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习近平总书记以极其宏阔的国际视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4] 只有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团结友好，互信互利，才能应对复杂的风险挑战，建设好共同的地球家园。

二、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精神谱系中准确把握团结奋斗的历史逻辑

（一）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根本前提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如果达不成团结，就形成不了完整的社会，就只能任人奴役、任人宰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建立并领导统一战线，将广大人民凝聚成为推动革命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正如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回顾中国共产党 28 年浴血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靠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精神，把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起来，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在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就根据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始终以宽广的心胸，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5] (P3)} 习仲勋同志曾撰文：“回想起来，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6] (P89)}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集体，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提出了“三色”建军

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策略，壮大了革命队伍，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巩固了红色政权，使得这块根据地最终得以“硕果仅存”，为红军长征最终确定落脚点奠定了基础。党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借鉴陕甘边革命斗争中“又联合又斗争”统一战线生动实践经验，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根据民族矛盾、中国革命形势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调整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关键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而中国人民大联合的关键就是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抗战胜利的历史证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延安时期党和人民心连心，军民之间就像“鱼”与“水”，共克时关，引领中华民族走出了危机。陈毅元帅名言“人民群众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胜利”证实没有兵民团结奋斗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依靠以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大团结取得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和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深深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胜利。

（二）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思想是维护党的团结的根本基石

确立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宝贵经验，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坚强的领导核心，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取得胜利的的根本保证，更是维护党的团结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同志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7](P310)}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正是由于我们先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国共产党才能以高度团结的面貌，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前进。反之，如果党内出现了不拥护领导核心、不服从中央的现象，就会给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造成巨大危

害。譬如，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刚开始形成，当时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结果造成红军力量的重大损失。又譬如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结束，确立核心，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赢得了几十年国泰民安的发展环境，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创造了条件。正反经验教育全党：确立和拥护党的领导核心对于维护党的团结极端重要。同样，科学的指导思想既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也是统一思想、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博采众长、守正出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厘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使全党思想达到了空前统一，为实现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团结就是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总结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

团结奋斗的精神标识，体现在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体现在建设年代“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体现在新时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体现在新时代“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旋律之中。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团结奋斗精神铸就了四个“伟大成就”实现了四个“伟大飞跃”的辉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在不畏牺牲、浴血奋战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在敢想敢干、大胆探索中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众志成城、不懈奋斗中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当年,河北平山县北庄村晋察冀边区唱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歌曲,并传唱至今。《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中华民族共赴国难、团结抗日的决心,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最朴实的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7日给北庄村全体党员的回信中特别提到这首歌曲,信中写道:“78年前,《团结就是力量》从你们那里唱响,成了亿万人民广为传唱的一首革命歌曲。如今,你们带领乡亲们传承红色基因,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摘掉了贫困帽子,我感到很高兴。”^[8]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党和人民的事业都离不开团结,团结奋斗始终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三、从历史性成就和创造美好生活中深切感悟团结奋斗的实践逻辑

(一) 团结奋斗是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磅礴力量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勠力同心、攻坚克难,用勤劳勇敢、团结智慧、举国体制把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特别是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面临形势的复杂

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前所未有地凝聚起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团结奋斗,稳经济、促发展,反贫困、建小康,战疫情、斗洪峰,化危机、应变局,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被攻克,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被跨越,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办成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创造了“人心齐,泰山移”的人间奇迹。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越是艰险越向前”拼出来的、是“一个汗珠摔八瓣儿”干出来的、是“敢教日月换新天”奋斗出来的、是全体人民“拧成一股绳”“撸起袖子加油干”创造出来的。

(二) 团结奋斗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充分焕发亿万人民创造伟力的时代要求

当今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风高浪急,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9]。中国高铁、中国天眼、港珠澳大桥、“天问一号”“嫦娥五号”“蛟龙号”“奋斗号”等一一面世,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伟力喷发的记忆符号。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草地”“雪山”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立场,越是需要团结成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始终手拉着手、心贴着心,只要9600多万名党员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战胜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就一定能够凝聚起亿万人民的一往无前之勇、应变求变之智、攻坚克难之力,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新的复兴伟业。

(三)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掌握历史主动创造

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回望历史，我们党初心如磐，奋斗精神、使命不改。如今生活条件虽然好了，但团结奋斗的精神一点也都不能少，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当前，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我们发扬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战略部署，主动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用团结奋斗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心怀“国之大者”，从实际出发，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形成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生动局面。要坚持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大团结，形成团结奋进、开拓进取的良好局面，合力奏响“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团结奋进的时代强音。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团结奋斗。要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善于团结和带领亿万人民大众，激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精神动力，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创造精神、奉献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3]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J].当代世界，2017（12）.
- [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 [6] 刘志丹纪念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习近平回信勉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把乡亲们更好团结凝聚起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N].人民日报，2021-02-09.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责任编辑：张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劳动观的五个维度

韩 雷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又一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进行了全新的阐述, 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的新表述, 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 劳动的抽象之维得到消解, 劳动的重要性也得到进一步彰显。对此, 我们需从理论、文化、价值观、教育和实践五个维度来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劳动观进行研究, 才能更加深入的理解其深邃意涵和精神实质, 从而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

关键词: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劳动观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10-06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劳动的重要性, 阐明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劳动精神的必要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结合中国实际,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 为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的伟大目标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 尤其是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深化对劳动的认知, 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态度上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劳动观意涵深远、内容丰富, 需要我们从理论、文化、价值观、教育和实践五个维度进行分析, 这样才能深刻领悟其“真意”, 形成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劳动观的系统把握和深度认识。

一、理论维度: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 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中形成人本身, 并形成人类社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分析可以发现,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 如《1844 年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及《资本论》中均对劳动做出了科学的论证, 阐明了劳动在人、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劳动也是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视角。

首先,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 人并非神创, 而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 “只是由于劳动, 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 由于这

收稿日期: 2022-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8VZT004)、天津海河教育园区课题项目“课堂教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 版教材使用实效性研究”(YQSZ202010)、校级课题“职业院校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思政课教材的实效性研究”(zdk12020-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雷 (1981-) 男, 天津人,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建设。

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1]在劳动的作用下人从自然界独立出来，人又通过劳动逐渐形成了属于人的“人化的自然”，或称为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劳动在人、人类社会形成中重要性的论述具有三重意蕴。第一，阐明了劳动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驳斥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人起源上的谬论。第二，深化了人们对劳动的认识，劳动的重要性得到显现。第三，劳动的地位得到提升，转变了人们对劳动的态度，使人们能够正视劳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观进行了创造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观，对劳动进行了新的诠释，劳动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发展。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中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继续指出，“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观得到进一步发展，深化了对劳动重要性的认识。

其次，通过“劳动二重性”提升人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认识，消解了由于分工导致工人对劳动认识上的偏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工人只能在被资本家雇佣后才能进行劳动。工人阶级受这种生产关系的遮蔽并不能意识到商品的价值是自身劳动所创造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商品自身生成的，而是来自于工人的劳动创造。为了系统的分析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其中，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的存在形式。它反映着商品生产所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价值是通过物与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劳动是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和不

同形式的劳动。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理论向人们揭示了什么样的活动才能创造价值，解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裹挟，使工人认识到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进行了全新的论述。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4]。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其一，将劳动具象在日常生活，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通向幸福；其二，将劳动作为战胜困难、铸就辉煌的重要方式，使得人们更加珍视劳动的价值创造功能。习近平深化了对劳动的认识，把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发展为劳动幸福论、劳动铸成就论。

最后，劳动在人的历史生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有前提的，而这一前提就是物质生产资料，也即是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是这样”^[5]，这里所说的物质生产可以理解为劳动的另一种形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6]，这一论述立足于唯物史观，突出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阐明了劳动是人类文明演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申了劳动的意义和作用，突出了“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由之路”，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7]，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也使得人们对劳动的理解更加系统、全面。

二、文化维度：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

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年的文化历程，形成了具有连绵不断、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从古至今，从朴素到现代，映射在文化长河中、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色、展现中华民族特点的基因就是勤劳。中华民族通过勤劳铸就了辉煌、通过劳动创造了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中华文明。毋庸置疑，勤劳是中华民族最基本、最高尚的美德。在悠久的历史历程中，从“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到“克勤于邦”，再到“人生在勤，不索何获”的传统美德；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到“铁杵磨针”的民间故事，无不都是中华民族勤劳精神的生动写照。可以说，勤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彰显中国人文化风格的名族“名片”，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8]。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背景下，仍需发挥文化软实力在增强民族自信、调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这一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就是继续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勤劳精神。

勤劳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基因”，是激励每一名中华儿女积极向上、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通过勤劳，中华民族不断攻坚克难；通过勤劳创造了加快世界文明进度的“四大发明”。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两个层面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勤劳精神进行了诠释。首先，通过勤劳助推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现固然同人生目标有着直接关系，但更离不开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促进这种坚持不懈精神的动力就是勤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9]。其次，通过勤劳激发人们对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既“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10]在这里，勤劳精神成为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中勤劳观的再诠释使得勤劳具有了现代性意义，勤劳在促进人的发展、社会进

步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

勤劳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是人们开展劳动活动的逻辑先在，它在开始劳动的初始阶段向人们注入了积极的劳动意念，增强了人们愿意劳动、坚持劳动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中勤劳观的诠释，使人们能够从动态层面来理解勤劳；祛除了勤劳的抽象之魅，使其落脚于现实；使人们对勤劳的字面理解转向对勤劳的现实作用和实际意义的关注。

三、价值观维度：新时代弘扬劳动精神的现实需要

价值观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基于思维、感官而呈现出对事物的态度、观点、判断，是人们判定事物是非曲直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等会起到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呈现出全新的景象，需要每一位建设者均形成积极地劳动的精神状态，主动地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第一，树立正确劳动观的现实需要。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是否具有正确的劳动观对于能否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可是，现实并非我们所预期，一些大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出现偏误、没有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如季爱民和蔡欢通过调查发现“24.546% 的大学生经常做家务，接近 61.818% 的大学生偶尔做家务，13.636% 几乎不做家务。49.091% 的人表示“想成为高级管理人才”，仅有 4.545% 的人表示“想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11]。此外，王飞和徐继存的研究显示，大学中仅有“7.4% 的同学参加过打扫教室的劳动，35% 的大学生参加过校外服务性劳动”^[12]，可见，大学生群体的劳动观存在较大的偏差，他们并没有对劳动形成客观的认识，对待劳动的态度需得到改善。这也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13]。

第二，抵制负面社会思潮的现实需要。社会思

潮是在某一具体时空内形成的，集中反应某一特殊人群心理意向、思维方式的统称。社会思潮可以分为正面思潮和负面思潮两个类型。尤其是负面思潮不仅干扰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而且误导人们的价值取向。近年来，负面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从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到“佛系”、“丧文化”等无不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14]，需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引导才能消解负面社会思潮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15]，唯有如此才能消除负面社会思潮的影响，才能激发广大青年的奋斗热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第三，厚植工匠精的现实需要。工匠精神是对职业道德、职业技术的统称，意指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或态度。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需要以工匠精神作为指引才能提升中国产品质量，才能提升工艺水平，提高工人的职业素养，才能使中国制造成为国际品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16]。

四、教育维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育人目标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我国，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理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可以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在此基础上，2020年颁布并实施的《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意见》中明确指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将劳动纳入育人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实的需要。唯物主义认为，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具体化，是促成人类社会形成，推动人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促使历史进步的内在力量。因此，关注劳动、重视劳动教育是推进人的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人是生产力中的重要构成要素。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其能力也得到加强，人通过劳动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工具改善生活状况、提升生活水平，又通过劳动不断实现自己的愿景，这就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劳动教育的提出使得“德智体美”有了更具体的实现方式。德育、智育有着提升人们思想境界，获得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功能；体育、美育具有强健体质、陶冶情操的作用。事实上，这四者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通过后天习得的能力。而要促进这些能力生成的基础就是劳动。确切的说就是“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劳动教育内涵了劳动教育理论的习得和劳动技术能力的培养。通过劳动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明确劳动的真谛，掌握必要的劳动技术，同时在劳动教育中也使得德智体美得到更好的培育和锻炼。其一，通过劳动可以使得青少年对德智体美的理解具体化，在具体的劳动中去体悟德智体美。其二，通过劳动架起了连接德智体美之间的“桥梁”，使得德智体美劳成为一个整体，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相承接。

教育是德、智、体、美、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在这五育的相互促进中样才能使对人的培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否则教育的功能就会被窄化、弱化，育人的作用也会被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项事业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对于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也应更加全面。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有利于构建更加系统的教育体系，而且也使得人才培养更加全面，体现了我国教育改革的科学性，彰显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

五、实践维度：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和谐起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7]。与此同时，在经济新常态和就业新形势的共双向作用下，劳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面对的挑战也异常尖锐。如何营造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考验。2015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指出，“要深刻认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8]。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一，通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可以提升劳动者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动力，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19]。其二，“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20]。其三，通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可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突出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关于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指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这样，越要发挥职工群众主人翁作用，越要关心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和职业发展，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实好”^[21]。为了使全社会形成对劳动者的尊重，营造良好的爱劳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各条战线广大职工和各族人民群众要向他们学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热情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为他们的健康和幸福、为他们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学习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具有三重作用。其一，可以营造良好的劳动环境，增进每个人的劳动意愿，消解不劳而获的负面心态；其二，提升人们对劳动的重视，使得尊重劳动、崇尚劳动成为社会的“正能量”；其三，可以在社会中形成“效仿”，使得向劳模看齐、向先进工作者致敬蔚然成风。

“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2]。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构建良好劳动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发力、合力共进才能有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生成。为此，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解决好劳动就业、培训、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问题；关注企业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权利权益。另外，各级政府继续完善相关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各种障碍，不断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促进全面发展。除此之外，各级党委和政府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来关心和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切实把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不断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创新，扫除制约、影响广大劳动群众就业、创业的机制和政策障碍，降低就业创业成本；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良好的劳动关系离不开工会和企业的参与。工会是职工的“娘家”，“要坚决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3]。发挥工会在连接企业和职工关系间桥梁的作用，具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发挥好工会的作用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发挥工会的政治责任，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第二，工会要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为劳模、大国工匠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第三，工会要切实为员工谋福祉，“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职工是企业盈利、促进企业正常运转的主体。作为企业要时刻关注职工利益,维护职工权益,因为“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24]。因此,作为企业要了解员工的利益诉求、及时化解影响员工情绪、利益的各种问题,为员工台、提供培训服务、关注那些在生活、经济、家庭等方面有问题的员工,不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这样才能体现企业的责任、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生成。

如何使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激发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新的历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进行了新的阐述,既丰富了其内容,也使得劳动具有了新的意涵。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的论述内涵广褒,意蕴深远,逻辑缜密,是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在理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的全新阐释系统的回应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什么要倡导劳动、劳动的重要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从抽象走向具体。在实践上,为如何开展劳动教育,开展什么样的劳动教育做出了指引,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了力量。

参考文献:

- [1] 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2.
- [2][15][23][19]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4、12、6.
- [3]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6-04-30(1).
- [4][6][7][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6、44、44、4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 [8]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 [9] 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0.
- [10][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69、544.
- [11] 季爱民,蔡欢.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下的大学生劳动观调查分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J].2015(2).
- [12] 王飞,徐继存.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的调研[J].课程.教材.教法,2020(2).
- [1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1.
- [17][22]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46.
-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
- [2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0.
- [21]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9.
- [24]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

【责任编辑:张山】

刍议中国共产党民族凝聚核心地位的奠定

陈载舸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要: 近100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为其丰标不凡的特质所决定、由其国运民命的担当所形成、因其架海擎天的能力所成就, 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日渐巩固、不可替代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16-04

历史表明: 进步成熟的政治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定能产生出强大的磁场, 将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吸引过去, 令其按照一定的方向和规律运动, 该政治力量的凝聚核心地位便藉此形成。一个世纪以来, 在中华大地上, 中国共产党上下求索, 拨云见日, 以志存高远的革命理想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凝聚起巨大的民族伟力, 推翻了旧制度, 创立了新中国, 振兴了中华民族, 其民族凝聚核心地位日益巩固。

一、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为其丰标不凡的特质所决定

政党, 是阶级、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必要工具。政党的性质, 反映着一定阶级的特性, 决定了该政党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任何政党, 都有其本身所固有的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质的规定性。中国共产党有丰标不凡的政党特质, 故而有云集影从的凝聚磁力。

其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有着科学严谨的理论指导, 她善于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来引导人民群众前进。

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凝聚核心地位的政治前提。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原理, 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作为自己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故而, 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治国的大政方略时, 有理论基础, 有大局观念, 能审时度势, 充分考虑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充分顾全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 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 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引导和战略指挥上的保障, 并因势利导地带领人民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从而充分展示出其凝聚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于此, 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 自觉自愿地汇聚到中国共产党周围。听党话, 跟党走, 成为中国人民的行为惯常。

其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有着垂范百世的行藏表率, 她善于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来激励人民群众前进。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华儿女的全部特性和优点: 她卓越先行, 公而忘私, 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彻底

收稿日期: 2022-07-07

作者简介: 陈载舸 (1951-), 女, 汉族, 祖籍广东兴宁, 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秘书长、教授, 主要从事中华诗词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性；她旗帜鲜明，光明磊落、英勇善战，一往无前，不怕困难挫折，不惜流血牺牲；她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能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团结群众，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前进。在条件十分恶劣的战争年代，广大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冒弹迎锋，坚贞不屈，敢于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共产党员努力践行初心使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和各个岗位上，他们一往无前，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在困难和灾难来临之际，他们迎难而上，奋不顾身，舍身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用自己的优良作风和模范行为，引领和鼓励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极大地影响群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有着明确坚定的服务目标，她善于通过遵循自己的建党宗旨和实现人民的利益要求来团结人民群众前进。政党宗旨是政党性质的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第一天始，就公开声明自己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与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应该并且必须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必定要服务于人民：她要求党的工作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她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做人民的“负责的勤务员”；她要求所有的党员必须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悉心地体察社情民意，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真心地维护民众愿望……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得到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由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得以凸显。

二、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由其国运民命的担当所形成

领导集体是否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是否能

占据社会凝聚核心地位，关键看其是否具有国运民命的担当。中国共产党的方略和行动足以证明其凝聚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其一，中国共产党有得民心的救国主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既承受着严酷的封建压迫，又遭遇到残暴的民族欺侮。于是，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斗争，就成了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并没有找到一条完成此使命的正确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围绕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国建国主张。社会实践证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充斥着独裁，它使得公民权利缺位，行政权力式微，不仅根本无法最大限度地聚合起全民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其所造成的民族离散力与日俱增，故而不得不遭到人民的唾弃，其统治地位最终被推翻。民主党派所提出的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的主张，缺乏现实可行性；再加之其先天不足，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故而也不能得到人民的赞同与推崇。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为的是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它紧紧地把握住了广大中华儿女的热切愿望，能够化解民族危机，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利益，赢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故而中国共产党“逐渐从社会与政治的边缘性政党发展为核心性政党”^[2]。

其二，中国共产党有崇高的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其理论原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远大目标，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高度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当作自己的行为归属，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国家历史使命与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有机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目标、民族共识、未来前景的新的规划蓝图，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是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在中国现阶段的具体体现。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前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理想信念的决然坚守,为初心使命的不懈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全部理论创新和理论实践的主旨。

其三,中国共产党有强烈的责任担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史上一系列壮丽篇章: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转变,“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3]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贫穷落后到扭转命运的历史性飞跃。为了加快促进经济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随即,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现在,为了极大地激发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长征……综上所述,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今天又领着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在其殚精竭虑地戮力于国运民命中日渐巩固。

三、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因其架海擎天的能力所成就

中国共产党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不仅是因为她有标举不凡的特质,有为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责任和担当,而且是因其具有卓尔不凡的把控和治理能力。

其一、中国共产党能从容应对危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应对和化解各种危局和困境中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100年: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屠杀政策,使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遭到惨重损失。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为党从失败走向新胜利指明了出路。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中国革命再次濒临绝境。在此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当时当刻,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捐弃前嫌,主动与交战10年的国民党携手抗敌,同支危局,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众志成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长年战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社会动荡不安。在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等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医治了战争创伤,肃清了反革命余孽,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89年到1991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巨大困难和危机。在此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果断平息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

其二、中国共产党能适时制定良策。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使农民

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加工定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总体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使建国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当经济建设工作中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居首要地位时，中共中央提出，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若干五年计划。若干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扎扎实实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人民群众的生活迈上了新的台阶。

其三、中国共产党能理性修正错误。我们党走过的道路并不是笔直而平坦的，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然而，每当革命事业暂时遭到挫折时，我们党总是自己主动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拨正前进的航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将淹没于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之际，我们党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重新举起了革命的火炬，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回击。其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党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认真整顿了党的思想作风，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1958年，由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挫折，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党及时总结

经验教训，调整了方针和政策，使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灾难。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使得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有些掌权者出现了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标、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范围而谋取个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对此，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提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决不姑息”^[4]。2022年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作了工作报告。“两高”的报告中都毫不隐讳地展示了一系列反腐败数据，充分彰显了我国反腐败取得的重大成果和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完善能力。

近100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地位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日渐巩固、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A].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1004.
- [2] 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5).
- [3]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01/c-121612030-2.htm>.
- [4]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22/c1001-20289699.html>.

【责任编辑：张山】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探究与实践启示

程林顺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 中华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在与外来思想的碰撞中觉醒并强化为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应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发展规律, 不断探究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历史探究; 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9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20-06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民族关系事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是指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共同体概念指一定空间内的宗族、族群、行会、宗教及社会团体等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所确立、认同和共享基础之上, 以我国 56 个民族为成员整合形成。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与融合, 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与整合, 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中华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的总和就是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根植于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一)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根”, 中华民族的独特身份就是中华文化。在近 6000 年的人类历史上, 全世界只有中华文化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反映, 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形成的载体, 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点与格局。^[1] 中华文化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特质, 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和各类观念文化的核心,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二) 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的基础

中华民族是经长期历史发展融合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命运共同体, 也是文化共同体, 更是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彰显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中华民族历史是各民族同舟共济、砥砺前行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 汉民族文化也不等于中华文化。^[2]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

收稿日期: 2022-11-27

作者简介: 程林顺, 男,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文化。

集大成，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3]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借鉴，在政治信仰、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共同的因素不断增多，逐渐形成有历史内涵的集体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

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我国各民族在思想政治、情感共鸣、生活习俗、行动合力等方面的共同性特征和集体意识。

（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上的秦汉雄风、大唐气概、康乾盛世，皆为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民族大融合，促进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识框架，建立起中华民族认同感。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表现为文明的外在形式，农耕文明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海纳百川、敢于拼搏，不同文明特质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禀赋，共同孕育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根脉

中华民族是由境内众多民族混合而成，各民族共同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例如中国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山川河谷地带是汉族、藏族、彝族、羌族、蒙古族、回族、白族、傣族、水族、佤族、苗族、怒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哈尼族、土家族等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带，体现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分布形态，聚族而居、群体协作的农耕文化，基于市场交换意识而产生商业文化，兼具原初特征、流动特征、征服特征的游牧文化在

西南民族走廊交融交汇。《后汉书·西羌传》载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晋语·国语》记载“皇帝以姬水城，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些记载表明了古羌人与汉族先民同源。对于古羌人与藏族的亲缘性关系，藏族学者多识认为“藏”和“羌”是同一各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藏汉民族在人种、族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到从夏朝开始汉藏民族已有交往。明清时期彝语支民族在大小凉山地区形成彝族聚落，明代纳西族向北扩张，元代以来蒙古族南下与当地族群融合，明清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进入西南民族走廊地带。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发展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脉。

（三）各民族共同捍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化了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十九世纪的新疆各族人民协同清军，挫败了英、俄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藏军民在隆吐山、江孜两次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者。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少数民族地区成为抗战力量供给的大后方，数百万的少数民族积极支持抗战。在云南，参战兵力达37万余人，伤亡10多万，其中许多是少数民族官兵，包括彝、白、傣、回、景颇、傈僳、瑶、苗、壮等20多个少数民族。^[5]中华民族为应对亡国灭种危机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各民族同仇敌忾、精诚团结，奋力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同时，强化了中华民族整体观念，觉醒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理论渊源

梁启超先生作为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的人，他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实际上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而由此印证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杨度先生则从文化角度提出“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的观点，强调中华文化的承继性。顾颉刚先生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里，提出并论述“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于一个政府统治

下的人民”属于同一民族，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非常强大的。

孙中山先生明确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孙中山先生倡导“五族共和”思想以增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他在《三民主义》第一讲中就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李大钊先生于1917年2月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里，阐释其中华民族理念及含义，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各民族共处于“共和国体”之下，是以得建“新中华民族”。他指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即此主义之“新”，就在于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民族文化、风俗、语言上的区隔，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唤起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民族认同及国民对国家的基本政治认同。李大钊先生由阐述“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把中华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运动相结合，为共产党人探索民族革命道路、摆脱民族危机提供了理论铺垫。^[7]

毛泽东同志早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里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几万万”。可见，毛泽东同志是共产党人中最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毛泽东同志在其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开篇就是以“中华民族”为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观点，阐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共同体整体”的权威性叙述，对中华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影响深远，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始终牢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原则。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认识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是整体与部分、一体与

多元的关系。56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是“多元一体”，其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体”，而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各民族的差异化统一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中，^[8]各民族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9]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是不可分割的实体。^[10]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过程中逐步觉醒，逐步强化为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明确阐释了民族发展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理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指导价值。^[11]

（五）新时代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新的内涵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无法描述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与实践路径，中华民族理论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不是西方学术框架和话语体系。通过全盘西化嫁接西方民族理论不可能焕发新枝，只能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途径，建构中华民族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华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植根沃土，要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始终离不开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华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在心理上的互相认同与

互相尊重，形成各民族同胞像自己家庭里的家人一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互守尊严、共存共荣，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1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崭新论断是指导民族事业发展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民族发展规律做出的重大原则性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民族工作实践中的进一步深化。^[1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崭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是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证分析及其实践启示

文化认同包括表象的如语言文字、饮食、节日等习俗文化和内核的如道德文化、心理特质、血缘宗亲等核心价值文化两个方面的认同。各民族对共享的文化的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文化认同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最深刻、最基础的体现，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一）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的相关调查统计结果分析

课题采取网络问卷调查与座谈、访谈的形式，对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习俗、文化认同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识情况开展调研，发放并收回调查问卷300余份。统计分析民族院校在校学生、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的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方面的认知情况。

1.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状况。通过课堂问卷、微信群问卷与问卷星调查统计，认为当前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情况较好的比例达到82.1%，选择一般的占17.9%，选择差的比重为零；89.3%的认为自己对中华民族有强烈的情感，一般的占10.7%；53.6%认为我国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状况较好，认为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一般的占39.3%，认为不理想的占7.1%；67.9%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中的认同度较高，选择认同度一般的占28.6%，认为认同度低的占3.6%；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果较好的比例为85.7%，认为效果一般的占7.1%，认为效果不佳的占7.1%；对中华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了解程度较高的只占35.7%，53.6%的选择了解程度一般，10.7%的选择不了解；选择经常参与中华文化传承活动的比例为32.1%，选择偶尔参加的占到60.7%，没有参加的有7.1%；选择非常认同中华传统节日习俗的比例达到85.7%，选择部分认同的为14.3%，参加中华传统节日习俗活动的愿望强烈；对民族传统医药持有的看法上选择认为其治病效果好的占85.7%，认为治病效果一般的占14.3%，认为传统民族医药没什么治病效果选择为零；认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较强的占比为50.0%，选择影响力一般的占3.6%，46.4%的选择中华文化在世界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总体上看，民族成分多元地区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度明显高于民族成分单一的地区；阅历和年龄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度有一定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接受程度越高；双语学校毕业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度较高，其视野更加开阔、宽容度更高、参与能力更强。

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模糊理解与认知困惑。比如对藏羌同源，汉羌同源，汉藏同源的历史不了解；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不清楚；不明白少数民族语言是属于中华民族语言的分支；有对少数民族节日与中华传统节日不一样的疑问；有对中华传统古典诗词了解不深的困

惑；有的简单将中华文化等同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把少数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有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与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存在片面理解。

2. 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认知困惑的原因分析。一是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认知渠道过于单一。国民教育教材中介绍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少，教育过程中知识获取局限于学校老师课堂教学，课外阅读书籍不够丰富；能经常性参与的中华文化传播活动机会少，群众性民族文化活动及体育竞赛活动少；在民族地区偏向于观看带民族文化和语言元素的电视、视频节目；网上与网下社交群体范围小；观看革命传统与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影片机会少。

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与各民族之间差异性的关系不清楚。中华民族共同性是具有主导性的，差异性是从属性的，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石。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共同性会增加，民族间相互交往交流变得越来越宽容和包容，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排斥越来越少。强调少数民族特殊性需要控制好对“度”的把握，既不能只强调中华民族共同性而消除差异性，也不能只强调各民族差异性而不分良莠全盘肯定和保护“特殊性”，否则就是人为固化和强化差异性，最后演变成保护落后，从而错过发展机遇，成为妨碍发展的阻力。

三是没有准确领悟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之间的关系。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最高利益，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政令统一、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根本前提。对民族地区给予一定特殊优惠政策，是为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使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尽快赶上全国发展水平，不是给少数民族“特权”或是对少数民族照顾太多了。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对地处偏远地区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继续坚持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坚持守望相助、共同繁荣发展，而不是简单取消其少数民族身份所附带的一些优惠政策，以避免发展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在市场经济冲击中处于落后位置。随着情况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与全国均衡程度的地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也会适时适度调整。

四是在民族关系判断上存在错误的民族思想。在民族关系上存在传统部族社会的思想观念，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把本“民族”看作是心目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政治认同，认为中国 56 个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祖先血缘等差异是“民族”差异的政治基础，认为应当以本“民族”为单元争取“自治”、建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不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国所有民族的要求，我们强调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认识到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是民族团结的大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是面向世界的政治归属感。

（二）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启示

1. 文化认同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寻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高于对本民族文化认同，这是文化认同的根本要旨。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或只认同少数民族文化而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做，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要以文化认同实现各民族最大动员，以文化认同为基本依托推动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不断提升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荣誉感。

2. 通过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团结与进步。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统一于中华文化的共同性中，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代表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一个民族文化强盛，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就强盛，体现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和关键环节，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3. 坚持以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认

同感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民族认同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其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我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要引导各民族将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结合起来，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4. 在民族问题上要坚持把“中华民族”看作是心目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基础的政治认同。在民族问题上要坚持现代公民国家的基本立场，把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把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祖先血缘等差异主要看做是次要的文化差别。要不断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认同、利益联结，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对各种民族观点理性分析、预期判断，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想，弘扬团结之善，制止分裂之恶，凝聚各民族合力，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5.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根本保障作用。我国探索走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废除民族地区压迫人的落后制度，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发展力不断增强。截至2019年，中国民族地区累计减贫25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1%下降到4%。到2020年上半年，西藏、内蒙古、青海等省份实现区域内绝对贫困“清零”，还有10余个人口较少民族实现了整族摆脱绝对贫困。^[1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根本保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平衡与充分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 [1] 张亚涛.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探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 53.
- [2] 白漠.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特征[J]. 人民论坛. 2011(23): 193-195.
- [3] 于风政. 论中华民族建设的主线与方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3): 10-16.
- [4] 吕翠微, 高美惠, 孙广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路径探析[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04): 30-32.
- [5] 少数民族谱写的抗战壮歌. 解放军报—中国军网[EB/OL]. (2017-07-06).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7/0706/c85037-29387938-3.html>.
- [6] 郑大华.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J]. 近代史研究, 2017(4): 4-9.
- [7] 王锐. 锻造“政治民族”: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J]. 开放时代, 2019(2): 122-135.
- [8]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4): 1-19.
- [9] 费孝通.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188-210.
- [10]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332-351.
- [11] 费孝通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29-33.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179.
- [13] 朱维群. 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 环球时报, 2018-5-3(14).
- [1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15] 社科院民族发展蓝皮书: 民族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 中国青年报, 2020-10-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1625402404418490&wfr=spide&for=pc>.

【责任编辑：温开照】

岭南文化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价值与路径

车孟杰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 佛山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佛山 528300)

摘要: 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底色, 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孕育形成忠义爱国、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求真务实等人文精神, 有利于增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认同、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创新共识、筑牢意识形态思想防线,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发挥着积极的引领、带动作用。应立足岭南文化, 通过健全文化统战制度、活化岭南文化遗产、弘扬岭南人文精神、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等,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 岭南文化; 粤港澳大湾区; 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26-06

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 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2] 这些重要论断都突出了统战工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重要地位。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组成部分, 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是新时代深入开展大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也是凝聚粤港澳三地人心和共识、加强粤港澳合作, 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的强大法宝。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在凝聚人心和共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是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 是文化的 DNA”^[3], 文化是当代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以岭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丰富的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 是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为坚韧的精神纽带, 为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文化支撑和价值引领作用。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岭南文化底蕴

粤港澳三地史缘相通、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文化同根同源。由“珠三角土著居民遗留的南越文化, 跨五岭而来的中原文化, 以及随海潮不断涌进的域外文化”^[4] 构成的岭南文化,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底蕴, 主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文精神。

(一) 岭南物质文化遗产

岭南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岭南文物、遗址、建筑、园林等, 保存着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西樵山采石场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等出土的石器、陶器, 共同记录着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文明轨迹。

收稿日期: 2022-11-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的意义与实践”(2020-GDSYKT--06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岭南文脉传承研究”(2022SDX005)

作者简介: 车孟杰(1987-), 男, 广东茂名, 博士,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佛山市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岭南文化。

建筑如镬耳屋、蚝壳屋、骑楼、碉楼等，整体风格美观大方、兼收并蓄，注重实用性，符合岭南人民的生产生活规律。园林则以余荫山房、梁园、清晖园、可园等为代表，注重山水布局、层峦叠翠，形成精巧秀丽、天人和諧的岭南园林风格。

（二）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岭南戏曲、工艺、民俗、饮食等，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生产生活的生动记录。戏曲文化如粤剧、广东音乐等，利用俚语方言演唱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关注现实生活，给人带来雅俗共赏的娱乐享受。技艺文化如陶艺、剪纸、扎狮头等，既展现岭南工艺的华美精巧，也彰显岭南手工艺人的智慧创造和工匠精神。民俗文化如龙舟、醒狮、武术等，蕴含浓厚的岭南风土人情和文化魅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文化符号。饮食文化如粤菜、早茶、糖水等，既追求饮食的清淡、精致，也包容不同食材和烹饪方式，凸显粤港澳三地居民简约而洒脱的生活品质。

（三）岭南人文精神

岭南人文精神是岭南人民思想观念、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等的反映，包括忠义爱国、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求真务实等，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鲜明文化基因。

一是忠义爱国。自古以来岭南人民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如南越女首领洗夫人，唐代张九龄，明末清初屈大均，近代郑观应、孙中山等，都对祖国河山深怀无比热爱之情，他们的忠义爱国精神传承至今并不断影响后人。

二是开拓创新。历代岭南思想家拥有浓厚的进取变革意识，敢为天下先，如六祖慧能对佛教进行改革、首创禅宗“顿悟”旨趣，明代陈献章、湛若水高扬人的主体价值、创立“江门学派”，清代康有为、梁启超推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等，使岭南地区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创新创造活力的区域。

三是开放包容。自秦代中原移民进入岭南，又经唐宋数次文化碰撞，如韩愈、苏轼贬谪岭南，张九龄等人北涉中原，推动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融合；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岭南地区传教布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裹挟着殖民文化席卷岭南地区，不断促成和深化岭南开放包容的精神。

四是求真务实。从唐宋“蕃坊”“市舶司”到清代“十三行”，岭南先辈通过水上、海上商品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又由于“大山阻隔而免受北方战乱和政治风波的干扰，逐渐形成了重利实惠的社会风尚”^[5]；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三地人民勇于实践探索，逐步形成求真务实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二、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的作用

岭南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文精神，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文化资源，是凝聚粤港澳三地人心和共识、朝着既定目标奋进的强大文化动力，为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增进文化认同，提升大湾区统战工作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6]。文化认同是粤港澳三地往来联系、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是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千百年来，岭南文化以其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内涵，感召着生产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时至今日依然使粤港澳三地保持着血脉相连、文脉相承、同宗共族，形成共同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推动着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积极开展。

如岭南建筑和园林等，积淀着厚重的岭南历史文化底蕴，记录着粤港澳三地居民生活印记，成为他们记忆中的共有文化场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这些具有岭南风格的建筑、园林与现代城市元素相融合，共同塑造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独特岭南风貌，不仅为大湾区留下浓厚的岭南乡愁，也为粤港澳三地居民保存深刻的岭南印象。再如春节“行花街”、端午“扒龙舟”等节庆民俗和醒狮、武术等活动，是粤港澳三地居民的集体记忆。将这些岭南非遗元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强化大湾区居民自身的岭南身份意识，建构起岭南文化认同。至于岭南人文精神，则具有高度认同的文化内

涵,使粤港澳三地居民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增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深层次文化认同。

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岭南文化充分发挥着构建粤港澳三地文化认同的功能,不断增强三地居民对岭南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从而唤醒港澳同胞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最终提升大湾区凝聚力,促进大湾区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 凝聚改革创新共识,增强大湾区统战工作活力

岭南文化中所蕴含的内涵丰厚的人文精神,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为坚韧的文化基因,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开展统战工作不能或缺的精神资源。通过在统战工作中弘扬岭南人文精神,能够将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凝聚、团结和动员起来,为致力于开展更具活力的大湾区统战工作而达成共识。

如岭南文化中的开拓创新基因,能促进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创新工作方法、开拓工作思路,正确把握当前多元多变的大湾区统战形势,积极应对复杂繁重的大湾区统战任务,推动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开创大湾区统战工作新局面。再如岭南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基因,能调动各民主党派的力量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中,争取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的力量支持大湾区建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求同存异、建言献策,共同推进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高效开展。又如岭南文化中的求真务实基因,能促使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勇于直面困难,以顽强拼搏的奋斗姿态,投身于具体实践中,积极回应大湾区统战工作的时代之需,增强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解决风险挑战的能力。

(三) 筑牢意识形态思想防线,保持大湾区统战工作定力

岭南人文精神不仅能凝聚统一战线成员共识,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还能发挥自身抵御错误思潮、维护大湾区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净化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稳固统一战线阵地,从而促进大湾区发展大局稳定。

长期以来,岭南文化一直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做出重大贡献,从古代的冼夫人、张九龄到近代的郑观应、孙中山

等,都积极促统一、反分裂,争取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这种蕴含于岭南文化中的忠义爱国精神,在现代充分激发了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使粤港澳三地达成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意愿,最终促成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为新时代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下牢固基础。当前,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多元复杂的社会思潮,以忠义爱国为主体精神的岭南文化,坚决将错误腐朽思潮拒之门外,发挥强大的正能量作用,充分维护大湾区的意识形态安全,为粤港澳三地居民筑牢思想防线。同时,大湾区统一战线成员也能利用岭南文化的优势,保持定力,全力开展统战工作,为大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和谐的舆论氛围。

概而言之,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背景下,岭南人文精神体现着中国精神的精髓,彰显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够凝聚粤港澳三地推动大湾区发展的共识,增强粤港澳三地人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有效抵御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不断促进大湾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从而为推进大湾区统战工作筑牢精神文化根基。

三、整合岭南文化资源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路径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应注重全面梳理、整合和利用粤港澳的岭南文化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其中的文化认同、凝聚共识和思想引导等正面价值功能,有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开展,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凝聚力。

(一) 健全文化统战制度,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顶层设计

所谓文化统战,“就是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7]。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重要文化资源,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和高度加强岭南文化统战的顶层设计,发挥岭南文化力量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的作用。

1. 提升岭南文化在统战工作的地位。文化统战

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具有高度的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尤其注重发挥岭南文化的重要作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统一战线部门和成员，要强化岭南文化统战的意识，重视岭南文化统战的作用。要把握岭南文化统战在大湾区统一战线体系中的引领、带动作用，注重在大湾区各项具体统战工作实践中充分借助岭南文化开展统战作用，不断树立岭南文化统战的价值理念，使岭南文化统战思想深入人心，切实在大湾区统战工作中提升岭南文化的地位。

2. 建立岭南文化统战工作协调机制。为确保岭南文化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统一战线部门和成员必须开拓工作思路，提升工作层次，构建岭南文化统战平台，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大湾区还应成立专门的岭南文化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整合财政、宣传、文化、旅游、教育等相关部门的关系，相互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制定开展大湾区岭南文化统战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创新激励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等，为顺利开展岭南文化统战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与制度保障，使岭南文化更好地融入大湾区统战工作中，并最终达到增进文化认同、协调利益关系和凝聚社会力量的目的。

3. 找准岭南文化统战工作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在统战工作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8]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发挥岭南文化力量，必须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岭南文化统战工作始终，为粤港澳大湾区统一战线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依托岭南文化资源，推动岭南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相融合，着力于活化岭南文化遗产，全面打造大湾区统战工作特色品牌；着力于弘扬岭南人文精神，全力构筑大湾区统战工作思想阵地；着力于开展文化交流合作，全方位提升大湾区统战工作实践效能。

（二）活化岭南文化遗产，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统战工作的特色品牌

进入新时代，粤港澳三地统战部门和统战成员要在充分保护岭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传承特色非遗、发展文化产业、利用名人文化等，活化岭南文化遗产，实现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传承岭南非遗。深度挖掘和整理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岭南非遗元素，在保护的基础上做好传承发展，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发挥岭南非遗的大湾区文化认同效用。如在大湾区中的历史建筑、博物馆、学校等场所，引入和推广包括粤剧、龙舟、醒狮等在内的岭南非遗项目，举办系列民俗文化展演和节庆活动，推动岭南非遗走进粤港澳三地的社区、景区和商业区等，让传承岭南非遗的观念“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巩固大湾区统一战线注入文化动能。同时，重视对非遗传承人的扶持和培育。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遗传承人是统一战线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出台相关政策，对粤港澳大湾区优秀非遗传承人进行制度化安排，引导支持非遗传承人结合专长，积极开展岭南非遗活动，参与到大湾区统战工作中。

2. 发展岭南文化产业。在大力开展岭南非遗活动的基础上，做好岭南非遗的产业转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长，这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9]粤港澳大湾区统战部门要利用好文化产业这个朝阳产业，重点围绕建筑文化、饮食文化、龙狮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具有深度岭南文化体验的文化旅游产业，融入大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岭南文化可见、可感、可享，成为粤港澳三地人民独特的生活印记。同时，充分发挥岭南文化产业的人才蓄水池的作用，调动文化产业人才的智慧和才能，并鼓励、支持和引导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发展文化产业，服务与大湾区统战工作的开展。

3. 发挥岭南名人文化优势。岭南自古名人辈出，从古代的赵佗、冼夫人、张九龄到近代的孙中山、

康有为、梁启超等,尤其是近现代红色人物如彭湃、陈铁军、叶挺、叶剑英等,他们的生平事迹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价值财富,也给大湾区民众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为大湾区统战工作的开展建立起独特的情感纽带。通过讲好名人故事,将其生平事迹及思想价值如春风化雨般浸润民众心灵,凝聚情感、建立认同、形成共识,强化岭南名人文化的教育与感召效果,使名人文化与统一战线整体开发、一体利用。同时,加快岭南名人故居的修缮和保护,尤其注重在红色名人故居中凸显红色名人的价值引领,不断增进大湾区民众对岭南红色文化的认同。

(三) 弘扬岭南人文精神, 构筑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思想阵地

岭南人文精神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也是推动大湾区统战工作的强大思想动能。必须大力弘扬岭南人文精神,筑牢岭南文化共同体意识,夯实粤港澳大湾区统一战线的思想根基。

1.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粤港澳大湾区统战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传统媒介载体,及时、有效地对岭南文化统战工作进行宣传报道,让民众认识到岭南文化融入统战工作中的典型案例与重要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岭南人文精神的熏陶。与此同时,还要运用好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兴媒介载体,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对岭南人文精神的宣传推广,加深民众对岭南文化统战工作的认识,从而增强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认同,进一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深入开展学术研究。通过借助科研院所、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等科研机构的科研力量,积极开展岭南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学术研讨活动,使广大岭南文化的专家学者、爱好者参与进来,以学术研讨活动的开展,促进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助力粤港澳统一战线的加强与巩固。在此基础上,设立统一战线智库,如以社会主义学院为载体,遴选一批研究能力强的专业人员,打造专业学科团队,为其配备研究所需经费和良好科研环境,对岭南文化与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充分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咨询提供参考依据。

3.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要发挥岭南文化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开展,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10] 大湾区统一战线的人才队伍,必须充分吸纳与岭南文化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中高级知识分子和领军人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他们运用岭南文化服务大湾区统战实践的能力,引导带领统一战线成员深入参与到大湾区统战事业中。

(四) 开展文化交流合作,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的实践效能

在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工作中,岭南文化蕴含着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必须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增进粤港澳三地青年文化情谊,推动岭南文化走出去,扩大岭南文化在海外的认同感和影响力。

1. 举办粤港澳青少年岭南文化之旅。粤港澳青少年的文化交流方向,应该着重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互通性和共同价值,从举办岭南文化溯源、岭南文化之旅系列活动入手,汇集在港澳就读的广东学生、在粤就读的港澳学生,在海外就读的粤港澳学生等参与其中,一同了解大湾区的千年岭南历史文化底蕴,体验岭南非遗项目、聆听岭南名人故事,畅想大湾区的未来建设。同时,也通过相关活动,增进粤港澳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情感交融,增强他们对岭南文化的认同感,凝聚形成爱国爱港爱澳强大合力,利用好大湾区的发展平台,抓住机遇,为大湾区的建设贡献粤港澳青春力量。

2. 开展海外留学生岭南文化体验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海外留学生,是大湾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必须立足岭南文化传统、坚定岭南文化自信,以海外留学生岭南文化体验活动为桥梁,推动岭南文化与海外留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通过开展岭南文化体验活动,让海外留学生更直观感受岭南文化的魅力,同时对海外留学生讲好大湾区的岭南故事,传递忠义爱国、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求真务实的岭南人文精神,以此促进中西文明的对话交流,破解偏见,形成共识,将海外人士的智力、人脉、人文优势转化为大湾区统战资源优势,发挥其服务大湾区建设的积极作用,不断将大湾区打造成为人文

与经济共荣的世界级城市群。

3. 召开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统战资源，也是重要的对外人文交流资源，在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有着积极的价值。为此，应着眼全球视野，通过定期召开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论坛，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向世界传播好大湾区的岭南人文价值，不断扩大岭南文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正如梁启超所言：“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是我们的责任。”^[11]因此，必须加强大湾区与海外的岭南学术交流，推进大湾区岭南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接轨，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构建起岭南文化在海外的交流与研究体系，逐步提升大湾区的海外统战效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3.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01).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316.
- [4] 陈思维.促进人文湾区建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8-02(5).
- [5] 唐孝祥.试论近代岭南文化的基本精神[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20.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00.
- [7] 许立坤.文化统战概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2.
- [8]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7.
- [9] 坚守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N].人民日报，2020-09-21(0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9.
- [1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35.

【责任编辑：张山】

推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途径研究

中山市委统战部

(中山市委统战部, 广东 中山 528400)

摘要: 新时代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针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 推进新时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探索, 要突出思想建设, 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政治把握能力; 重视制度建设, 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规范性; 重视“关键少数”, 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领导能力; 重视活动开展, 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 建立学习联系机制, 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重视组织发展, 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成员质量。

关键词: 民主党派; 基层组织; 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32-05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最基本的组织细胞、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 是民主党派联系广大成员的桥梁和纽带, 也是民主党派组织成员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开展组织活动、完成本党派各项工作任务的基础和依托。其自身建设的情况, 对民主党派效能的发挥将产生重要影响, 而民主党派效能的充分发挥, 是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键。如何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 认清新形势、把握新要求, 努力探索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提高基层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水平, 不仅是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 也是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的必然要求。为此, 中共中山市委统战部专门成立课题组, 采用多种形式对此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做法, 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以及解决的基本途径进行剖析和研究。

一、新时代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

新要求。

(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 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伟大梦想的实现, 既离不开执政党的坚强领导, 也离不开统一战线成员的凝心聚力和各民主党派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不断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把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广大群众都凝聚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梦想上来, 才能带领本党派成员坚定不移地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二)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这就要求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两

收稿日期: 2022-11-13

作者简介: 课题组成员: 吴剑安, 男, 中共中山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罗颖涛, 女, 中共中山市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何振锋, 男, 中共中山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和干部工作科科长、李星, 女, 中共中山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科员(执笔人), 课题指导人: 张山, 男,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大主体，执政党和参政党同心同向，亲密合作，共同发展。因此，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必然要求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共同努力、共同发展，既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也需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履行职能方法，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三）民主党派自身发展对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统一战线也面临着领域更加广泛、成员结构更加复杂多元所带来的风险挑战。需要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共同应对、迎难而上。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修订实施，《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都为各民主党派提升自身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障，同时也对民主党派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确保党派成员能够有序、高效参与到政治协商工作中，着力提升政治协商实效提出了新要求。

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比照新时代新征程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比照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调研发现，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有：

（一）基层组织的思想理论建设较为滞后。

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在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不断完善的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下，对比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水平，目前各民主党派的思想理论建设还远不能支撑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需求。调研显示，普遍反映缺乏系统的针对基层支部的思想理论指导书籍和手册，存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习不够透彻，对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对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方式方

法不够多等现象。这种理论水平的相对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发展。

（二）基层组织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体制机制建设虽然已经基本具有顶层设计的思想，如民革中央、民盟中央、民进中央等相继出台了有关制度建设的文件，总体而言参政党的制度建设在不断完善，但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体制机制仍比较薄弱，以中山市为例，仅民革中山市委会参照民革省委会有关民革广东省基层支部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民革中山市委会基层组织工作细则》、《民革中山市委会标准化支部工作制度》、《民革中山市委会基层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职责》等工作条例。对标中共基层组织建设，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存在制度建设缺乏定期修订与完善，基层支部负责人执行制度时也常常出现落实不力的情况。如，基层组织财务体制机制的缺乏与财政、审计体制机制对接建立健全；思想理论学习的体制机制考核标准有待进一步精细化；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基层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落实；“一人一议”“支部课题”等参政议政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推进，等等。以中山市各民主党派为例，近年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的体制机制由于缺乏系统性、配套性、完整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成员的执行力与创造力，制约了基层组织的发展。有的制度缺乏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不能充分激发党派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不能发挥好能动性，从而使得体制机制在落实过程中显得乏力，不利于基层组织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三）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行家里手，学术专业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缺乏党务领导工作的经验，组织领导、组织管理能力水平不足，在基层组织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整体作用不突出。二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都是兼职的，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需要承担大量本职工作事务，很难兼顾党派组织的领导、管理事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派成员的党派意识，影响了党派成员参加党派组织的活动的积极性。三是部分党派上一级组织对基层组织的班子考核存在有流于形式的现象。

一些党派尽管设置了考核制度,但是奖惩机制模糊,缺乏执行力度,影响基层组织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四) 基层组织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不足。

对中山市各民主党派基层支部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民主党派基层支部大多为综合类支部,成员工作单位分散,无固定活动场所。仅 60% 的支部每月可开展一次活动,33% 的支部每季度可开展一次活动,活动的频率与中共基层党支部活动相比明显偏低;民主党派基层支部活动 70% 以上为政治理论学习,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彰显特色、创新性工作开展不够;基层组织的发展近亲繁殖现象明显,成员年龄层次普遍较大,活力不足;50% 的党派成员认为党派对自身的宣传不够,人才吸入不足。上述一些问题,导致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自身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五) 基层组织的成员政党意识不够强。

调研发现,大多数单位都能够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但仍有少部分基层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把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日常的业务开展上,存在统战意识不强,对统战工作重视不够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对本单位的民主党派成员关心支持不够,甚至设置不利于党派成员发展的障碍,影响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影响了基层民主党派成员对参政党成员的角色定位的认识。基层组织成员由于自身业务繁忙,平时更加注重做好业务工作,而缺乏学习研究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欠缺主动和所在单位党组织沟通、寻求支持和帮助的主动。与老一辈相比,部分年轻党派成员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认识还不到位,角色意识缺乏。部分党派成员对参政党与群众组织、社会团体的区别认识不清,凝聚共识的意识不强。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导致基层民主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淡薄、价值定位模糊,是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一个问题。

(六) 基层组织的成员发展质量把关不够严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党派不是俱乐部,不能不加甄别、来者不拒。”作为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知识型政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多为

各行各业的精英。但近年来,由于普遍存在的基层“老龄化”现象,一些党派基层为了发展新成员,在吸收新成员加入时,存在不注意把握质量关口,片面追求数量;不注意考核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考核要求不够严格的现象,导致了党派成员的层次和素质有所下降,甚至出现断层现象,影响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政治交接、组织的战斗力和组织的形象。民主党派的成员素质是民主党派履职尽责的重要保证,也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重要基础性因素,因此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一问题。

三、推进新时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 路径探索

(一) 突出思想建设,聚焦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凝聚共识,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政治把握能力。

各民主党派要高度认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把加强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政治把握能力。一是建立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会。学习中共党组织成立“讲师团”、“名师团”,培养出一支政治素养好、理论水平高的专家队伍,为各党派的思想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二是搭建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平台。通过学术论坛、研究期刊等主阵地以及网站、公众号等新媒体充分展示各自党派在基层组织建设上的思想建设成果,在基层组织中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宣传,促进思想交流,提升思想内涵;三是健全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激励机制。加大对本党派理论建设研究者的激励和鼓励,全方面支持思想建设的理论研究工作,为其提供和创造必要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四是坚持研学与修炼结合的模式。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中共党组织建立基层支部学习实践教育基地。及时总结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和特点,为各党派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能用、好用、管用”的工作指导,提高运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二) 重视制度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规矩纪律意识,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规范性。

制度建设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作为参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各民主党派要根据

新时代、新要求，以党为师，借鉴学习中共党组织的党建经验，总结探索星级党派成员、星级模范支部等党建标准化成果。对标中共党组织的党建制度，编印《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规范》、《基层组织工作实操手册》等工作规范，为基层组织的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操作标准，推动基层组织标准化建设。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深化各民主党派之间交流探讨，推动基层组织制度规范和组织建设，如深圳市、浙江省等地积极探索出的民主党派市委机关及基层组织党派成员之家标准化建设模式，从现有的定期考核和验收来看，成效显著，值得借鉴和推广。

（三）重视“关键少数”，加强干部培养，强化干部交流成长，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领导能力。

领导班子是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少数”，强化基层组织的队伍建设就是要抓重点、抓关键，着力加强各级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建设。一是要严把“选拔关”，在配备领导班子时，力求选拔出一支能力强、威信高，团结向上、充满活力，敬业奉献、开拓创新的领导班子队伍；二是要严把“教育关”，通过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专题讲座等，对基层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不断增强其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提升领导力；三是要搭建交流平台，通过统战部门牵头，与省、市级组织部、党校联系，搭建干部交流、培训平台。如在党校的培训中，在加强理论学习和多党合作史的学习的同时，也为民主党派基层干部与中共的基层干部加强交流提供平台，一“校”多用，资源共享。四是要把加强纪律教育作为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坚持与中共党组织对标看齐，自觉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开展好党派的纪律教育活动。加强基层党派基层组织的内部监督建设，学习中共基层的监督经验，加强基层组织的日常监督。

（四）重视活动开展，创新活动形式载体，强化成员政党意识，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

深入开展有意义的基层组织活动，要求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一是要提升党派成员自我建

设的能力，可以借鉴中共自我革命精神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理念，结合党派自身实际和新形势新情况，通过主题教育活动、交流研讨会等促使党派成员改变观念、从作风建设的角度强化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和责任感；二是学习中共党员先锋模范带头的做法。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通过表彰评选和媒体宣传，形成经验、总结推广，不断丰富组织活动内容、创新组织活动形式、提高会员参与热度，在基层组织中营造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三是针对基层组织缺乏活动场所的问题，通过市委会和基层组织共同筹备场地和经费，建立“党派成员之家”作为基层组织定期学习、举行会议和发展新会员的阵地，为基层组织活动解决后顾之忧。如，中山市各民主党派市委已建立36个功能不同的“党派成员之家”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做法；四是对照中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心策划活动形式，结合岗位增添活力。建议按照成员所需和群众所需，每年围绕1-2个主题，采取调研、学习、交流、联谊、实地考察、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实现多效合一的效果；五是拓宽基层组织成员履职渠道，实现双循环。一方面为本单位的工作、建设和发展积极地提供建议和意见，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履职。另一方面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支持党派整体参与社会管理，由市委会通过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将基层广大成员的意见、建议、看法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提供给上级组织，实现外循环。

（五）建立学习联系机制，强化问题导向，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一是民主党派市委领导班子要进一步密切与基层支部所在中共党组织和统战部门联系，落实好领导班子联系地方和基层组织制度，帮助基层组织适应新形势、立足新发展，对照中共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标准，对标对表，查找不足，剖析原因，制定方案，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使基层组织不断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班子成员要加强合作共事能力建设。一方面主动争取本单位党政领导的支持，积极与单位党政领导沟通交流，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引导好基层组织成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正确看待“有为有位”和“有位有为”的关系，通过努力工作和做出成绩赢

得基层中共党组织的认可。同时紧密围绕本地、本单位党组织的中心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中共党组织的决策提供参考,提供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双向努力,实现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和党派组织的积极努力相得益彰,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履职和规范化建设夯实基础;三是基层组织应积极主动争取地方统战部门的大力支持,为组织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如,争取与统战部门建立邀请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列席单位重要会议,认真听取并合理采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提出的意见建议等机制。

(六) 重视组织发展,严把准入关口,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成员质量。

各民主党派应重视组织发展,做到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成员,处理好发展数量和发展速度的关系,对标中共党组织,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严把民主党派成员“入口关”,进一步提高基层组织的成员质量和水平。一是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标中共党组织,严格组织发展程序,规范新加入党派成员的资料,加强入党派前的考察和入党派后的培养,努力提高发展成员的质量;二是要定期对所在党派成员的结构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优化组织结构和人才结构需要,有针对性地吸纳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加入民主党派;三是要加强民主党派市委与拟发展对象所在党委党组织的协商,征询党组织的意见。同时认真落实民主党派市委领导同拟发展对象谈话要求,及时了解思想动态,加强思想政治引导,从源头抓好共识教育;四是要建立好新成员动态档案库,严格成

员组织关系管理,及时掌握有关情况,并从政治、思想、生活和工作上关心新成员成长。只有慧眼识珠,吸收政党意识较强,自身素质较高,并且对党派工作热心的新成员,基层组织的建设才能后继有力。

四、结语:

在新的征程上,各民主党派要以党为师、永跟党走,继续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这是新时代新时势新任务新使命对参政党基层组织提出的新要求、赋予的新责任。因此,参政党必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厘清影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不利因素,以党为师,从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坚持把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新时代参政党基层组织自身建设,使之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以取得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推动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成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使之更加成熟定型、展现制度优势,做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重要作用、作出巨大贡献的参政党组织。

【责任编辑:温开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归国人才群体的基本特点

左 玲¹, 何 虹²

(1.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2.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大批海外学子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回国服务, 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丰功伟绩。具有留美生是规模最大群体、重视实学、学历较高、理工农医类就业率略高于人文社科类、求职方式以个人联系为主、就业领域以高校、机关工厂为主和分布地域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等特点。系统概括这一群体的基本特点对新时代我国如何完善人才战略布局、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留学归国人才; 基本特点; 人才优势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37-07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面对祖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 一大批海外学子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回国, 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洪流中, 为新中国科技、教育、经济、政治、文化、医药、卫生、国防、外交等各领域的创建发展、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做出奠基之功, 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实践证明, 广大留学人员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2] 当前, 深入总结这一群体的基本特点, 对新时代我国如何加强人才国际交流, 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一、留学国别: 留美生是规模最大群体

落后就要挨打。1840 年以来,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一次次打开了天朝大国的大门, 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不甘落后的中国人多么希望能通过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来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面貌,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出国留学潮和归国潮。在这些浪潮中, 越是发达的国家, 中国留学生的人数越密集。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的历史阶段, 从西方不同国家归国的留学生数量不尽相同, 但从整体上看, 留美生始终是留学归国人才中的最大群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举国上下, 共赴国难。一时间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归国, 数千位留日生几乎全部归国, 留学其他国家的学生也陆续回国。八年抗战, 中国几乎与外界失去了交流。抗战末期, 出国留学人数, 尤其是赴美留学生人数大增。1932 年中国留美生仅占留学生总数的 27.4%, 到 1946 年已高

收稿日期: 2022-1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留学归国人才群体的国家认同研究”(17BDJ050)

作者简介: 左玲(1976-), 女, 陕西西安人, 博士, 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留学归国人员研究和统一战线理论研究; 何虹(1962-), 女, 陕西西安人,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一级调研员、副教授, 研究方向: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达 88.8%。^[3] 据华美协进社统计, 1948 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计达 2710 人, 分布于全美 45 个州, 只有内华达和南北达科他三州大学没有中国学生。1949 年华美协进社再次统计, 中国留美生比上年增长了 40%, 达到 3797 人。^[4] 这与美国领土未曾沦为反法西斯战场、文化教育设施未遭受战火摧残和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亲美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 美国不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还提供各种奖学金以鼓励中国学生前往深造。另一方面, 国民党政府为了战后的重建工作, 大量派遣各种进修人员、实习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考察人员前往美国, 美国自然成为众多学子求学出国留学的理想之地。抗战胜利不久, 国民党重新挑起内战, 打败日寇的喜悦在中国人民心中昙花一现, 失望和沮丧笼罩中华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 海外留学生看到了中国重新崛起的希望。在中共强有力的号召和各项政策措施的引导下, 激发出一大批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海外学子陆续回国, 为共和国各项建设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49 年 8 月到 1954 年 12 月海外留学归国人才的留学国别和归国人数的详细情况, 见表 1:

表 1: 留学归国人才留学国别和人数情况统计表 (1949.8-1954.12)

年月 国别	1949.8- 1950.6	1950.7- 1950.12	1951.1- 1951.12	1952.1- 1952.12	1953.1- 1953.12	1954.1- 1954.12	总计	百分比(%)
美国	310	221	290	35	37	44	937	65.8
英国	50	28	71	24	13	7	193	13.6
日本	14	13	39	36	16	1	119	8.4
法国	17	13	29	13	11	2	85	6
加拿大	3	2	7	7	4	3	26	1.8
瑞士	6	1	4	2	2		15	1.1
菲律宾	3			1	3		7	0.5
德国			2	2		2	6	0.4
瑞典	3		2	1			6	0.4
奥地利		3	1	2			6	0.4
荷兰		1	1	1	1	2	6	0.4
丹麦		1	4				5	0.4
印度	1		3				4	0.3
比利时	1			1	1		3	0.2
新西兰			2				2	0.1
澳大利亚					1	1	2	0.1
意大利	1						1	0.1
马来西亚						1	1	0.1
总计	409	283	452	128	89	63	1424	100
百分比 (%)	28.72	19.87	31.74	8.99	6.25	4.42		100

资料来源: 根据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 (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59 页的数据整理而成。

由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从登记的留学归国人才数量来看, 留美生人数最多, 达 937 人, 占留学归国人才总数的 2/3, 始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归国人才中的最大群体。其次是由欧洲归国的留学生, 占 1/5, 主要集中于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 留英生占 13.6%、留法生占 6%。留日生居第三位, 占留学归国人才总数的 8.4%。

二、学历层次: 重视实学、学历较高

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和造就不同的人才。受中国社会性质、现实国情和社会制度、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的目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 世纪下半叶主要以“实业救国”为目的; 20 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 主要以“政治救国”为目的; 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 主要以“学术救国”为目的。因此,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中国海外留学生选择的专业有不同的侧重。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 渴望能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实用知识来改变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无情地告诉中国人, 要改变近代中国落后的面貌, 必须彻底变革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批又一批地海外学子开启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浪潮, 但清政府组建的“内阁”有名无实, 封建制度的根基依旧坚如磐石, 渴望通过政治型人才变革中国社会制度的愿望未能实现, 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未好转, 依然一盘散沙, 战事频繁, 民不聊生。而现代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巨大变革作用, 让中华儿女逐渐意识到学术救国和知识救国的迫切性, 深切感受到一味的学“器物”、学政治、学思想并不能真正救国, 进而转道西方追求学术, 产生了从“重文轻理”到“重理轻文”的转变, 并立志为结束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和早日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奋斗终身。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专业选择方面, 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纷纷走上“学术救国”之路。当然, 这也与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国民政府的执政需要

直接相关。当时国内大学生失业率比较高, 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生首当其冲。

为赢得抗战胜利和实现国民政府政治、军队、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党政府在选拔出国留学学生时, 开始有意识地向理工科类倾斜。1943 年 3 月,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在谈到今后国家工作的重点时, 明确提出了大力培养土木、电机、机械、水利、空运、建筑、卫生、衣服和矿冶等实业人才, 对实现教育、军事和经济的统一, 以及加强心理、伦理、社会、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4 月 28 日, 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经济部等部门: “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 应照十年计划, 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 拟具整个方案为要。” 随后, 教育部制定了《留学教育方案——五年留学教育计划》, 陆续发布了《1943 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12 月, 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 分为实科(理、工、农、医)共 36 个专业和文科(文、法、商、教)共 25 个专业, 被录取的余国琮、叶笃正、侯祥麟、王守武、朱康福、魏荣爵、秦元勋和萧前椿等 327 人于 1944 年秋陆续赴美留学。随后, 教育部在重庆、西安、成都、南京、北平和上海等地, 采取公费生和自费生考试同时进行的方式, 分别设置考点举行考试。到 1948 年 1 月, 国民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时, 公费生和自费生一共录取了 1900 余人, 其中赴美留学学者一千余人。^[5]

这些留学生大都怀着“学术救国”的目的远渡重洋, 努力学习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实用技术以期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尽管西方不同国家的文化各有特点, 但多讲求实用。受国内复杂局势的影响, 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子大多选修相对远离意识形态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等比较实用的学科, 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则相对冷淡, 这一点同 20 世纪上半叶及其建国后的留苏群体以选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的“政治救国”目标大不相同, 也预示着从思想改造、思想批判运动和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开始, 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回国参加国家建设的留苏群体和留美群体的历史际遇和命运道路大不相同。1949 年 8 月到 1950 年 12 月留学归国人才的专业选择的详细情况, 见表 2。

表 2: 留学归国人才国别和学科情况统计表 (1949.8-1950.12)

国 别	理	工	农	医	财 经	文教	政法	其 他	未 祥	共 计	
										人 数	百分比 (%)
美 国	59	131	47	45	33	121	92		3	531	76.7
英 国	11	25	3	6	6	14	13			78	11.3
日 本	5	4	1	5	2	5	5			27	3.9
法 国	6	2		1	2	13	6			30	4.3
瑞 士	2	1		4						7	1
加拿大				1		1	2	1		5	0.7
丹 麦			1	1		1	1			4	0.7
菲律宾		1					2			3	0.7
奥地利	1	2								3	0.2
比利时							1			1	0.1
印 度						1				1	0.1
意大利							1			1	0.1
荷 兰	1									1	0.1
人 数	85	166	52	63	43	156	123	1	3	692	
百分比(%)	12.3	24	7.5	9.1	6.2	22.5	17.8	0.1	0.2		100
合 计	52.9				46.5			0.1	0.2		100

资料来源: 参照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和第 16 页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由表 2 可以看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海外留学归国人才所学专业 and 人数虽大不相同, 但选学理、工、农、医专业的留学生总数(占 52.9%), 要高于选修文教、政法和财经专业的留学生总数(占 46.5%)。这既与 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政府的留学派遣主要以理工农医类为主直接相关, 也与西方国家和新中国对待自然科学类留学生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留学生的态度、政策不尽相同直接相关。

当然, 由于国民政府时期到海外留学的人员是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出国前已经取得学士或硕士学位、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 甚至早年已经有过留学和回国经历, 在国内外相关学科领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归国人才的受教育程度颇高、学历

较高,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据1948年的统计,“在美国大学的2710人中,研究生最多,为1680人,占全数的62%;其次为大学生,为702人,占25.9%;此外,特别生62人,占2.3%;其他266人,占9.9%。当年的录取生中,就有“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工程师、技术员、公务人员、银行职员、新闻记者、会计师、医师、律师、待业青年等。”^[6]这些归国人员中的大多数所学专业都是自然科学,并且是新中国极其缺乏的较为实用的领域。这部分人能回归祖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服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学科分布:理工农医类就业率略高于人文社科类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行各业急缺各类专门人才。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广泛争取留学生回国服务的举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到祖国。其实,早在1949年夏天,周恩来就开始部署这项工作,由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奉命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在美工作时,周恩来就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1949年8月到1954年12月欧美日留学归国人才的人数和就业情况,见表3:

表3:留学归国人才数量和就业情况统计表

年 月	登记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949.8—1950.6	409	383	93.6
1950.7—1950.12	283	268	
1951.1—1951.12	288	304	
1952.1—1952.12	113	126	
1953.1—1953.12	76	57	
1954.1—1954.12	63	65	
总 计	1232	1203	97.7
说 明	1. 1954年底尚有11人未来京报到,18人未分配工作。 2. 从1950年7月开始,就业数可能包括上一阶段因学习等原因未能就业的留学生,因此就业率只计算几年来登记学生的就业率。		

资料来源:参照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出,1949—1950年登记的留学归国人才的就业率高达93.6%,到1954年底,除18人未就业外,其余全部就业。与国民党政府时期留学归国人才就业困难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方面反映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急需大批学有专长的留学人员为国效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中国政府对留学生回国和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

尽管国民政府选派的留学生以理工农医类为主,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的留学生却占相当大的比重,主要原因是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类的留学生在海外很难就业,再加上美国政府对他们不加以限制,还给予津贴资助帮助他们回国。回国后,新中国让他们学习一段时间后,几乎全部安排工作。从1949—1954年参加工作的留学归国人才的专业背景来看,选学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农学、医学和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的留学生的就业率,略高于选学文化、教育、政治、法律、财经和管理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留学生。详细情况见表4:

表4:留学归国人才选学专业和就业情况统计表(1949.8—1954.12)

专业领域	理	工	农	医	文教	政法	财经	未 样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机关厂矿	64	148	40	43	85	40	50		470	45.3
学校	76	78	20	33	80	9	30		326	31.4
学习	2	7	2	2	54	54	49		170	16.3
其他	15	14		4	21	4	14	2	74	7
总计	157	247	62	82	240	107	143	2	1040	
百分比(%)	15.1	23.8	6	7.9	23.2	10.1	13.7	0.2		100
总计	548				490			2	1040	
百分比(%)	52.7				47.2			0.2		100

资料来源:参照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

录 (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0 页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由表中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学习理工农医类自然科学的留学归国人才达半数以上,占 52.7%,人文社科类占 47.2%,比例大体平衡。这一点与国民政府时期留学生的派遣专业基本吻合。从所学专业看,工科生最多,文教类第二。从就业去向看,到机关厂矿和学校工作的人数最多,占 76.7%。参加学习的占 16.3%。

四、求职方式：以个人联系为主

海外留学归国人才群体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职业选择和工作安排问题。早在新中国诞生前,中共就启动了积极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部署,1949 年 8 月前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简称“科代会”),12 月初成立的“办委会”和 1952 年 11 月成立的“高教部”等组织机构,专门负责处理海外留学生的归国事宜及其归国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办委会以“团结和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目标,制定了对留学归国人才采取“一般的号召,在自愿的基础上早日学成回国为人民服务”原则。^[6]为充分尊重他们的就业意向和帮助他们尽快就业,办委会专门制定了四条原则:“第一,学社会科学的留学生,一般动员他们先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学习,然后再参加工作,如有特殊困难或客观需要例外;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一般都动员他们马上工作,在工作中学习。第二,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工作问题者,根据本人专长、志愿及客观需要,与有关部门洽商进行,并与本人协商解决。第三,本人有工作机会者,可以自己进行。”^[6]这些原则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同时对不同学科的留学归国人才也有分别对待的一面,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实属自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归国人才,对回国后从事什么职业非常谨慎,因为有些学生在国外时听说回国后不能随便改变工作单位,因此,一些暂时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发展理想工作的留学生,宁肯先到革命大学继续学习深造、也暂不就业。1950 年是海外留学生归国人数最多的一年,根据办委会登记

的人数,大概在 500 人以上,参加工作或学习的留学生大概有 472 人,这一时期留学归国人才的求职方式的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留学归国人才就业途径统计表 (1949.8-1950.12)

类别		由“科代会”或“代委会”介绍	完全靠自己进行	自己进行由“科代会”或“代委会”协助	共计
工作	人数	112	208	45	365
	百分数 (%)	30.7	57	12.3	100
学习	人数	107	3	2	112
	百分数 (%)	95.5	2.7	1.8	100
共计	人数	219	211	47	472
	百分数 (%)	46.4	44.7	10	100

资料来源:参考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 (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 页和第 19 页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出,建国初年参加工作的留学归国人才近六成都是自己联系,由“办委会”介绍或协助的占 43%。参加学习的留学归国人才基本上都是由“办委会”介绍。在留学归国人才的职业选择方面上,“办委会”非常尊重留学生的个人意愿和选择,但在学习问题上,“办委会”介入较多,绝大多数参加学习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留学生都由“办委会”组织安排。

五、就业领域：以高校和机关工厂为主

“办委会”对海外留学生的回国工作和就业去向非常尽责。留学生归国时多经香港到广州,再转往上海、天津或北京等地,“办委会”及早就在广州、上海和沈阳等地设立招待所,并向贫困者发放旅费,精心安排归国人员的接待工作,与上海、广州等市人民政府共同负责招待。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0 年底留学归国人才的就业情况,详见表 6:

表 6：留学归国人才就业领域分类统计表
(1949.8-1950.6)

			机关 厂矿	学校 任教	学习	其 他 情况	失 去 联系	共计
办 委 会 成 立 前	1949 年 8 月底 -12 月初	人数	31	32	43		26	132
		百分数 (%)	23.5	24.2	32.6		19.7	100
办 委 会 成 立 后	1949 年 12 月初 -1950 年 6 月底	人数	87	60	81	18	5	251
		百分数 (%)	34.6	23.9	32.3	7.2	2	100
	1950 年 7 月-12 月	人数	121	97	31	19		268
		百分数 (%)	45.1	36.2	11.6	7.1		100
总 计		人数	239	189	155	37	31	651
		百分数 (%)	36.7	29	23.8	5.7	4.8	100
说 明		1. 办委会成立前共登记 163 人，其中 31 人当时工作学习未治定，由科代会移给办委会，故总数为 163-31=132 人。 2. 办委会成立后至六月底共登记 246 人，其中 26 人为工作学习尚未治定之新回国留学生，另加科代会移交之 31 人，故总数为 246-26+31=251 人。 3. 1950 年 7 月至 12 月底共登记 283 人，其中 41 人为工作学习尚未治定之新回国留学生，另加 6 月底工作学习未定 26 人，故总数为：283-41+26=268 人。 4. 其他情况中有二人为去学校继续升学。						

资料来源: 参考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 页、第 16 页和第 17 页的数据整理而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归国人才群体中, 参加学习的人数占 1/3, 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归国的留学生中近一半的专业是文教、政法和财经类, 需要学习一段时间才能工作。随后, 负责留学生归国事宜的“高教部”, 为改进留学归国人才的接待、管理和工作分配等问题, 使他们充分就业, 专门提出海外留学归国人才的工作原则是“应当从积极方面考虑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 使他们多做一些工作, 并且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个人志愿。”对社会科学类留学生, 在他们学习完成后, “原则是应当根据他们的专长, 分配适当的工作。今后应当注意开辟一些新的工作园地, 以充分发挥这些留学生的专长”。^[6]根据这一原则, 学财经类的留学生往往分配到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部门, 学文教和政法专业的留学生多数分配做图书管理和资料工作等。此外, 还“设置专门的编译机构, 广泛地进行编译对我们有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的工作, 吸收这些留学生参加”。^[6]因此, 参加工作的留学生人数出

现了逐步上升趋势。绝大部分留学归国人才被安排到机关、厂矿、高校和研究所工作。

六、地区分布：以华北地区为中心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新中国诞生后, 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对工作单位所在区域的选择非常慎重, 多以北京为中心, 逐步向华北的其他地域和华东、东北、中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慢慢延伸。这既由国家机构的设置、安排、选址和各地区的人才优势等宏观因素决定, 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国家各项建设和全国各地的快速发展。详细情况见表 7:

表 7：留学归国人才工作地区分布情况统计表
(1949.8-1950.12)

			华北 (北京)	华东	东北	中南	西北	西南	香港	共计
办委会成立前	1949年8月底-12月初	人数	37 (31)	13	10	3				63
		百分数 (%)	58.7 (49.2)	20.6	15.9	4.8				100
办委会成立后	1949年12月初-1950年6月底	人数	103(90)	17	17	5	5			147
		百分数 (%)	70.1 (61.2)	11.9	11.9	3.4	3.4			100
	1950年7月-12月底	人数	157(25)	19	15	9	6	10	2	218
		百分数 (%)	72(60.5)	8.7	6.9	4.1	2.8	4.59	0.9	100
总 计		人数	297(146)	49	42	17	11	10	2	428
		百分数 (%)	66.4 (34.1)	11.4	9.8	4	2.6	2.3	0.5	100
说 明		1. 表内人数仅限于去机关工作或学校任教者，去学习者因地点均在京，未计入，其他情况也概未计入，故总数即表二中一二两项之总和。 2. 华北项下（）内数字为在北京工作者。								

资料来源: 参照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 页和第 17 页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1949 年 8 月到 1950 年 12 月登记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中, 六成多归国学子的就业地域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这种分布格局与国民政府时期留学归国人才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工作的情况基本一致。其次, 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华东地区, 占 11.4%。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最需要干部, 因此, “办委会”当时“多方面想办法打破留学生的

思想顾虑,主动地分配留学生去东北工作”^[6],所以,去东北地区工作的学生大概占一成。中南和西北地区的留学归国人才人数较少,占6.6%。西南地区人数最少,仅占2.3%。

当然,由于不少社科类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尚处于学习阶段,还未参加工作,上表并不能全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年所有留学归国人才的工作去向,但基本倾向非常明显。当时海外留学归国人才的就业地域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政治因素干扰,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海外留学归国人才真实的求职意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作出“人才是第一资源”^[1]的重大判断和“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8]的重大部署。通过对建国初期留学归国人才群体六大特点的梳理与概括,对新时代我国如何处理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海归人才、尤其是高精尖人才的重要作用,如何完善人才战略布局、用好用活海归人才,如何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如何引导海归人才矢志爱国奋斗、锐意开拓创新,如何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将各方面优秀人

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5.
- [2]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2).
- [3]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750.
- [4]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434.
- [5] 樊洪业.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422-423.
- [6]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6,4,18,23,24,8.
- [7] 李喜所.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24.
- [8] 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求是,2021(24):4.

【责任编辑:杜联藩】

在陆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刘 强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近年来,台籍青年教师前进大陆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步融入大陆的校园生活和当地的社会生活。但是,在逐步融入的背后,仍存在一定的障碍和问题。只有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制定并实施恰当惠台政策,台籍青年教师才能更深层地融入大陆社会。

关键词:青年教师;台籍;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44-08

在本研究中,台籍青年教师被定义为年龄在 18-45 周岁,具有台湾地区户籍,并在大陆从事教职的群体。社会融入是指台籍青年教师在移入地社会的生活状态及其演变过程的一般概括与描述,是台籍青年教师被包容进移入地主流社会或各种社会领域的状态与过程。台籍青年教师基本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大多数在岛内曾有过兼职教师的经历,也就是说,曾经属于“流浪博士教师”的一员。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Z 市相关部门开展的“在陆台湾青年教师社会融入问题”课题研究,分析台籍青年教师在移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于发挥高校台籍青年教师的独特作用,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在陆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的现状特点

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来看,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虽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台籍青年教师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但是从“社

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由于社会网络的缺乏,台籍青年教师在大陆发展呈现出相对弱势的状态。因此,社会融入的基础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2019 年 6-8 月,Z 市组织了相关专家学者对辖区内的台籍青年教师开展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活动,调研 4 所学校,陆续收集完成,共发放问卷 50 份,回收问卷 46 份,经过审核,有效问卷 46 份;深度访谈 10 次,访谈人数 16 人,形成 10 份访谈资料。对台籍青年教师在 Z 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有了初步的把握,下面主要从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 经济层面的融入

经济层面的融入是一种生存性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基础,主要体现在职业地位、经济收入以及消费模式等方面。拥有一份职业,并能够通过职业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形成一种稳定的消费模式,是台籍青年教师能够初步建立起在移居地稳定生活的基本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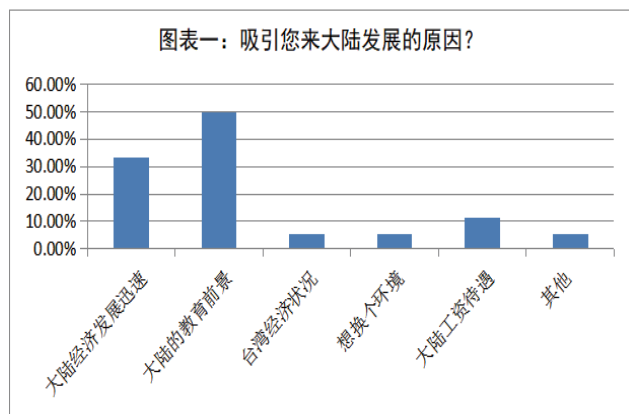
就职业地位而言,工作是促进社会融入的首要路径,是通往社会融入的大门,甚至是“唯一”“最重要”的路径。台籍青年教师之所以选择到 Z 市来参加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与岛内大致平等的收入条件下,A 高校和 B 高校能给他们提供一份稳

收稿日期: 2022-11-20

作者简介: 刘强(1978-),男,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港澳台问题。

定的、有发展前景的教职（见图表一）。而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份教职，关键原因是他们具备在台湾地区或世界其它地区学习获得的知识技能优势。也就是说，高学历台籍青年教师的“才识”在其经济融入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台籍青年教师显然非常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积极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学校管理方及在校学生都对台籍青年教师的表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们认为台籍青年教师的国际化知识背景、教学理念和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深受学生喜欢。如A高校管理层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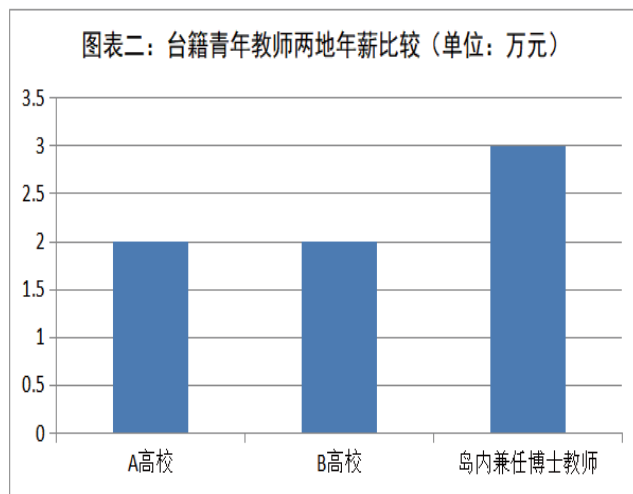
“台籍青年教师职业素养比较到位，学术素养较为深厚”。B高校负责人亦表示：“这些台籍青年教师工作就业认真，教学方式方法多样，往往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教学上，跟学生的互动比较多”。而台籍青年教师则普遍认为，大陆学生更尊重老师，在大陆工作，会比台湾那边更有成就感。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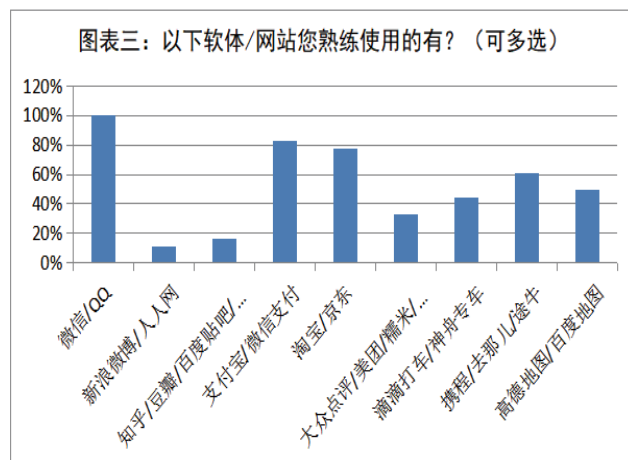
就经济收入而言，能够获得比移出地相对较高，与移入地主流社会相一致或略高水平的经济收入是实现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的另一重要条件。B高校在校园征才中明示，“助理教授、应届博士毕业生年薪人民币20万元”。除此之外，该校还为每位助理教授和应届博士提供安家费5万元，科研启动费5万元。A高校所能提供的相关薪酬待遇略低于B高校，但仍然高于台籍青年教师在岛内的收入水平（见图表二）。因为上述两校的台籍青年教师在岛内多为“流浪博士教师”，他们即使每周承担

10多节课程，但因为寒暑假没有课，平均一个月收入仅3万多元台币（人民币六七千元左右）。^[1]



资料来源：根据Z市调研数据及岛内相关数据整理形成

就消费模式而言，虽然有少部分台籍青年教师认为B高校和A高校离市中心相对较远，生活不太便利，购物不太方便，但是大多数则表示，当前大陆的商业环境和交通越变越好，大部分的东西很容易购买到，特别是绝大多数台籍青年教师都掌握了网上购物工具和手段，购物消费相当方便。（见图表三）当然，也有台籍青年教师谈到“现在Z市的消费模式和台湾地区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有教师表示，Z市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和台湾差不多，对在这里工作生活还比较适应。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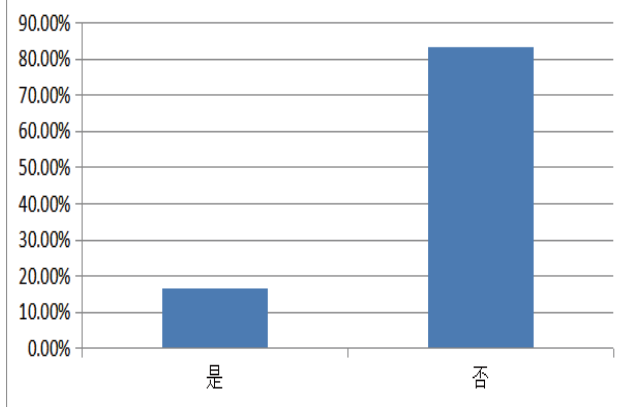
总之,就经济层面的融入而言,由于岛内“少子化”、机会有限、兼任待遇不佳等原因,以及大陆地区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岛内“流浪博士教师”群体前进大陆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他们不仅愿意到大陆发展,而且已经基本融入学院或学校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在经济融入方面呈现出深度嵌入的态势。

(二) 社会层面的融入

台籍青年教师的就业,倒逼他们与大陆学生以及大陆同事建立人脉关系,尽管这种人脉关系并不深,并不广,至少能够使他们在本地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使社会层面的融入成为可能。而社会层面的融入是台籍青年教师在经济融入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指台籍青年教师在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融入。可以通过他们与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大陆同事和大陆学生交往以及与所属社区的互动等方面进行测量。

在与同乡会组织的联系方面,尽管台籍青年教师参与现有的台商协会、台商青年会和台胞台属联谊会等组织的人数不多或兴趣不大(见图表四),但是却对于同一身份的“教师老乡群体”情有独钟。除此之外,A高校和B高校的台籍青年教师还自发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这些朋友圈所提供的信息和活动甚至构成了台籍青年教师社会活动的核心内容。这些“老乡群体”的社会网络为台籍教师能够

图表四: 您是否参加过在陆台湾人的社会组织(台湾同乡会、商会或青年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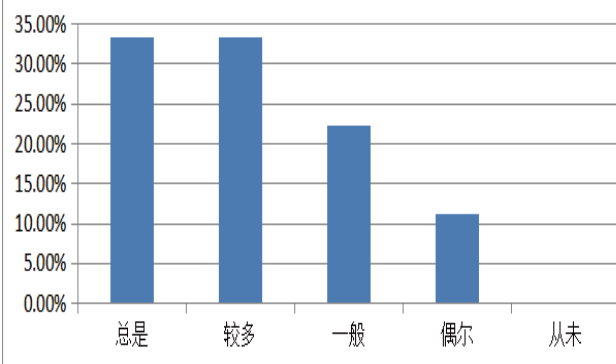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进入并迅速融入大陆地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渠道。如有部分台籍青年教师就靠“老乡”提供的信息才来了到Z市的,而且来到Z市之后,这些已有的原乡社交网络对于他们进一步融入Z市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港湾”。

在与大陆学生和大陆同事交往方面,“语言教学中的课堂气氛比一般工作环境中的氛围来得更为轻松,这种相对轻松的交流氛围为师生彼此之间建立亲密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而共同的职业也促成了台籍青年教师和大陆教师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台籍青年教师通常会在他们遇到困难问题时,向自己的大陆同事求助(见图表五)。这种通过职业或学业产生的社会交往,是台籍青年教师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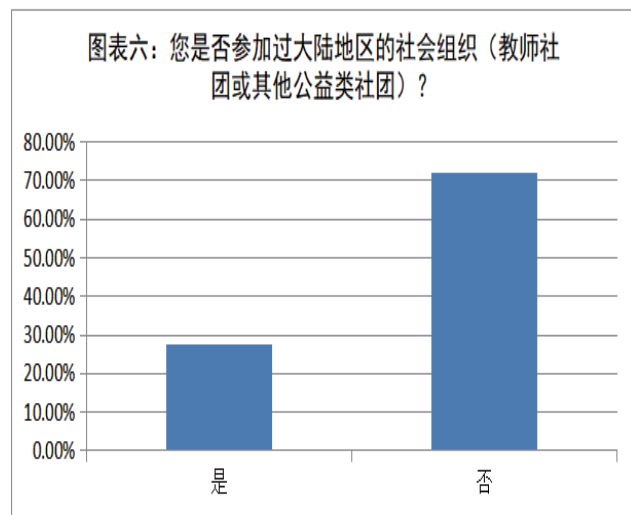
图表五: 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或困难的话,是否会向大陆同事求助?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在初步适应大陆地区的校园生活之后,他们的社会交往网络不会再简单停留在自己老乡群体的舒适区,也不再局限于校园领域,而是开始逐步涉足广阔的社会生活。尽管从参与社会组织来看,台籍青年教师加入当地社会组织的数量并不多(见图表六),但他们还是勇敢地迈出了校园,与当地社会建立了初步的社会联系。如台籍青年教师L就经常到学校附近的市场购买生活用品,而且可以和卖蔬菜的老板轻松地讨论两岸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台籍青年教师开始与大陆居民建立恋爱甚至是婚姻关系。而由“婚姻和恋爱关系带来的社会交

往为这些台籍青年教师带来了在移居地社会的强关系，这些由他们的恋人或爱人带来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社会关系是台籍青年教师最可倚赖、最为坚固的社会关系”。^[3]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台籍青年教师不仅通过实体的社会组织建立起初步的社交网络，形成最初的社会资本，而且他们还通过虚拟的网络社群，如微信/QQ/新浪微博/豆瓣/天涯等社交媒体和网站，与大陆更广阔的社会建立联系（见图表三）。这种社会联系使他们对大陆地区的方方面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虽然这种广度的认知与了解并不必然导向台籍青年教师对大陆的认同，但无疑为日后的认同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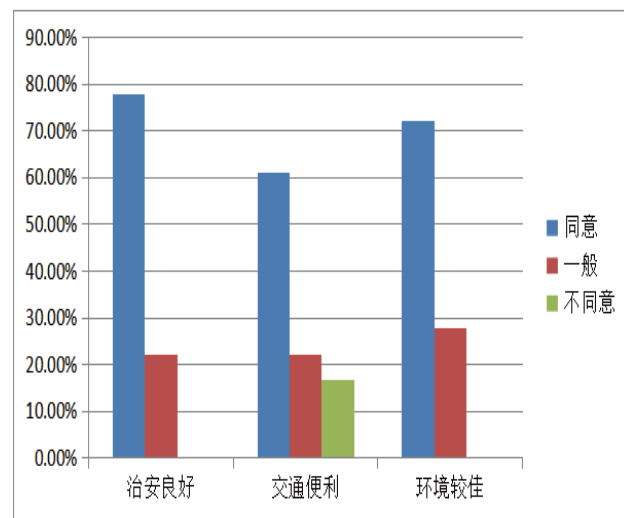
（三）心理层面的融入

社会层面的融入能帮助台籍青年教师了解更多关于大陆的风土人情以及生活习惯，并引发对生存状态的思考。正如有台湾青年所说的那样，“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将自己所学的东西跟外面世界结合，也许人生有不同的思考和体验。”^[8]而且，由于社会交往和互动必然伴随着情感的流动，易于导向个人在情感、安全感以及归属感等方面的需要，从而使社会融入进入心理层面。尽管台籍青年教师心理层面的融合状况必然充满着捉摸不定的特征，但是我们还是能通过他们“对居住地的评价”、“对

自我身份的认定”以及“在Z市继续工作和生活的意愿”等方面作大致的把握。

就对居住地的评价而言，多数台籍青年教师对他们居住的Z市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他们普遍认为这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交通设施便利，城市干净整洁，环境状况较佳，社会治安良好等等（见图表七）。在访谈中，很多台籍青年教师还纷纷反映，在Z市的工作生活很快刷新了他们对大陆的认知，来了以后，才发现很多事情不是台湾一些媒体报道的样子。台籍青年教师M还指出，“大陆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非常便利，回到台湾之后反而有些不适应，感到台湾很落伍。岛内还要用信用卡支付，由于没有环境，商家不配合，电子支付没有办法推广。在这方面，大陆已经超过台湾很多了”。其他教师也反映，移动支付和软件打车这两项互联网科技应用的普及能够说明，大陆对新鲜事物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非常强，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不能与之相比。他们还普遍盛赞大陆学生求知欲强，有着向上拼搏的激情，会主动想办法改善现状，而不满足于“小确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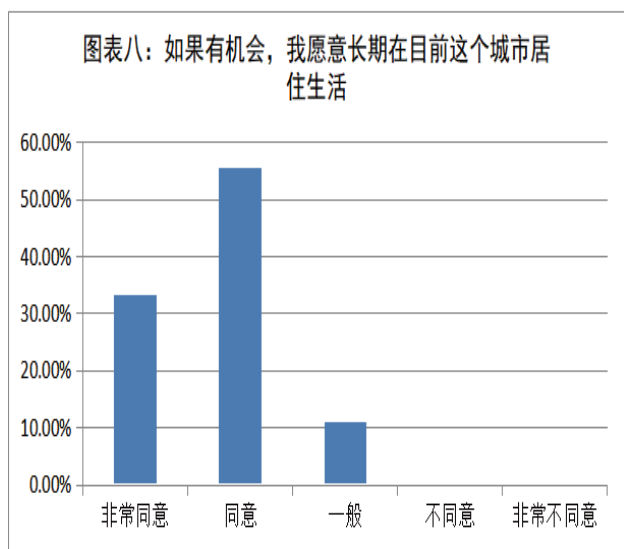
图表七：台籍青年教师对居住地的评价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就对自我身份的认定而言，虽然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让台籍青年教师群体产生Z市民的感觉或认同，

甚至有青年会对 Z 市有一些不喜欢或不适应的感觉。但是,一旦离开,也会形成一种无意识的牵挂。经常往返于两岸的台籍青年教师 H 即表示,“已经开始把 Z 市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打算在这里好好地工作生活”。在谈到居留意愿时,多数台籍青年教师均表达了愿意长期在 Z 市居住生活的想法(见图表八)。教师 U 甚至无奈地表示“回不去了”,“来了就不准备回去了”。也就是说,从显性的视角来看,多数台籍青年教师未必对大陆或 Z 市产生深刻的身份认同,但从隐性的视角来看,一种模糊性的牵挂情绪或认同情感也隐然成形。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总之,台籍青年教师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三个层面的融入过程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经济层面的融入必然引发社会层面的融入,而社会资本的增加也会反哺经济融入,进一步增强他们长期在 Z 市就业的意愿和能力。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又伴随着心理层面的融入,而心理融入的状况必然会对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产生重要的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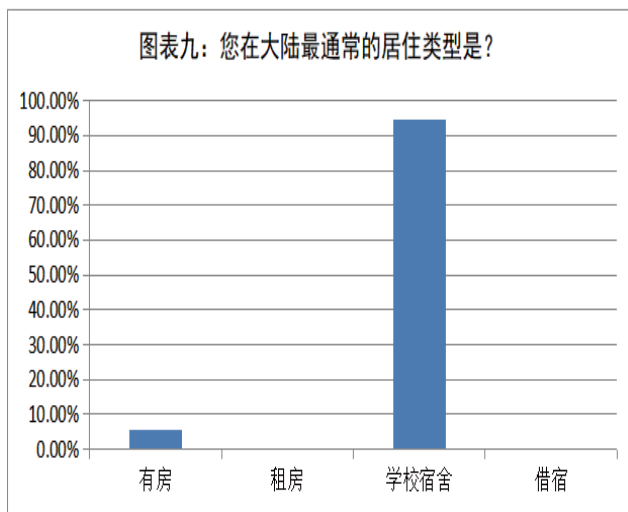
二、在陆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的主要问题

台籍青年教师在较高的经济融入的前提之下,既能在社会交往方面与本校的大陆同事和在校学生

保持良性的互动,也能在心理层面慢慢接纳移入地,开始全面地融入 Z 市的校园生活和当地的社会生活。但是,在渐进性的融入背后,我们仍能体察出一系列的障碍和问题。

（一）经济融入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经济层面的融入除了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消费模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测量面向就是居住问题。一处相对固定的住所不仅可以提供一种稳定和舒适的居住生活,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虽然 A 高校和 B 高校均为台籍青年教师提供了相应的教师公寓,使得台籍青年教师并没有紧迫的购房的实际需要,但是购买一套属于自己房产仍然是衡量经济融入的重要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只有少数台籍青年教师在 Z 市购买了房产(见图表九),而且其购置房产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安居,而是用于投资,即感觉大陆的地产有增值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随后的访谈中,虽然有个别教师因结婚生子的原因,有了购房的意愿,但是绝大多数台籍青年教师的购买意愿并不强。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另外,在经济收入方面,虽然前面已经论述,能够获得比移出地相对较高,与移入地社会相一致或略高水平的经济收入是实现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的重要条件。但是,在同一所院校,在大陆教师和台籍青年教师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仅不能加快台籍青年教师的社会融入,反而构成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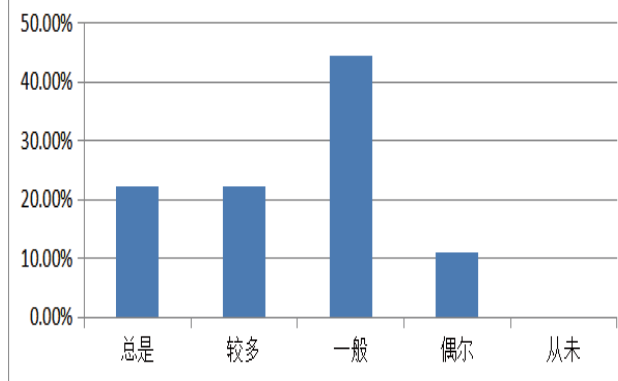
社会融入的障碍。例如，B高校台籍青年教师的薪酬收入明显高于同校的大陆青年教师。这一现象使得大陆青年教师群体心生不满，而这样的差距和分野也使台籍青年教师明显产生了不同于大陆青年教师的“我者”意识，人为地制造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对于台籍青年教师的社会融入非常不利。A高校的台籍青年教师虽然其薪酬待遇似乎不如B高校，但正是由于同工同酬的政策，这种经济关系是可持续的，从长远来看反而有利于台籍教师的社会融入。

（二）社会融入的主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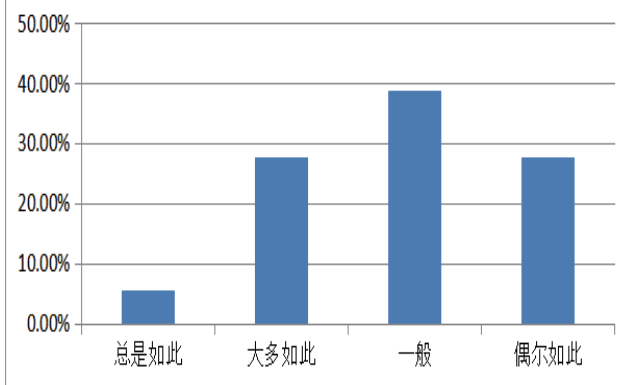
台籍青年教师在进入大陆后，一般会失去其原有的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如朋友关系、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等。而要在新的居住地建构起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积累新的社会资本又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台籍青年教师由于社会支持网络或社会资本的缺乏，他们很难实现与大陆当地社会的直接、良性的交往互动。特别是当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没有有效的社会资本可以动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校协助台籍青年教师群体组织或参加各类“老乡群体”，对于他们最初融入大陆生活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由于老乡群体内部彼此之间过于频繁的互动而使得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被强化，从而形成一个与当地社会相互隔离的‘亚社会’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一种亚社会环境中，网络内部的成员就会与当地社会相脱节”。^[4]一旦台籍青年教师沉溺于这种原乡情感，会进一步创造一种所谓的“台湾人”的身分想象，从而将他们和大陆居民隔离开来，进而隔绝了他们进一步“在地化”的可能性，对于台籍教师的社会融入反而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问卷调查显示，台籍青年教师群体对参与由学校/居住区组织的娱乐、文体、社会服务等活动不甚积极（见图表十）。在访谈中，台籍青年教师B和J均表示，“来到学校快两年了，基本上就是呆在学校里，很少到外面去”。台籍青年教师嵌入到自己族群的社会网络越深，就越限制了他与外在社会的互动和融合。

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他们与大陆居民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化待遇（见图表十一）。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诸

图表十：在大陆您是否经常参加学校/居住区组织的娱乐、文体、社会服务等活动？



图表十一：在工作过程中，您是否曾因台湾人身份而受到过区别待遇？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
（20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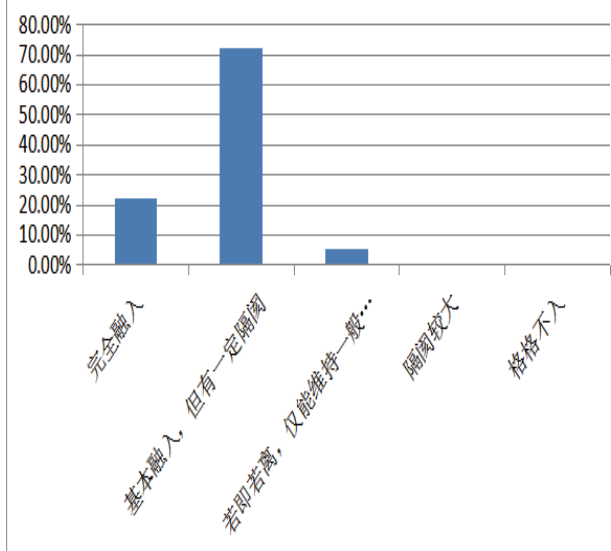
多政策，如大陆铁路和民航部门宣布改造自助服务设备，实现台胞自助购、取票和值机；教育部等部门开放在大陆工作的台湾研究人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住建部正会同相关部门调研，总结各地推出的在大陆工作台湾民众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政策等等。但是这些技术性的制度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台胞与大陆居民之间的差别性待遇：一方面，台籍青年教师因台胞的身份而在某些领域享受“超居民”的特殊化待遇；另一方面，台籍青年教师因台胞身份仍然在大陆面临各种制度障碍。如在访谈中，台籍青年教师D、F、B、N等，分别反映在教育、医疗卫生保障、社会保险、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职称评审等方面，与大陆居民并未享有同等的

权益保障和便利。这种差异性的待遇很容易使台籍青年教师在与大陆民众比较的过程中产生“我者”和“他者”意识。

（三）心理融入的主要问题

当台籍青年教师在内心深处认为他们自己已经属于在地社会的一份子时，他们才能真正融入到大陆的社会生活中。问卷调查显示，虽然多数台籍青年教师基本融入了大陆同事圈子，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隔阂（见图表十二）。在随后的访谈中，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台籍青年教师相互之间谈笑风生，但对自己的大陆同事却很少提及。教师B就表示，“快两年了，最不适应的就是太想家了，想妈妈”，“想家的时候就去跑步，去运动”。另外，由于受岛内政治社会化教育的影响，个别台籍青年教师对中国的历史记忆、生活体验和集体意识缺乏认知，导致其国家认同产生混乱。因此在谈论身份认同之类的敏感话题时，台籍青年教师往往会在心理层面呈现出一定的警惕、防卫以及回避的态度。

图表十二：在您看来，您是否融入了大陆同事圈子？



资料来源：《在陆台湾青年教师调查问卷》（2019.06）

三. 在陆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尽管台籍青年教师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或曲折或坎坷，但只要我们能够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制定并实施恰当的融合发展的政策，台籍青年教师就能够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与周围的环境保持持续性的互动，那么台籍青年教师就会实现既维持自身的发展，又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并最终获得成就感、自信和尊严，那么台籍青年教师也就真正实现了社会融入。

（一）创造更多的经济融入的就业机会

Z市两所高校的经验表明，工作是促进台籍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的首要路径，甚至是“唯一”、“最重要”的路径。而据岛内教育部门的统计，台湾各大专院校每年有5,000位博士毕业生，其中有1,500位幸运地找到工作（含台北市政府清洁队员），有3,500位待业中。另有统计，岛内“博士生毕业后到产业就业情况，工程、管理、人文社会、教育艺术、医学、农、生医七大领域中，只有三成工程领域博士生毕业可投入产业，其他科系几乎都是担任教职”。^[5]由于无法获得固定教职，这些博士只能到4、5所大学奔波兼课，被称为“流浪博士”，以致形成社会问题。而大陆民办大学发展十多年，仍缺乏骨干的中青年副教授和讲师，同时大陆国有大学采终身制，教师因为退休金考量而不愿意到民办大学。大陆博士教师往往将民办大学当作跳板，跳槽率较高，致使教师队伍不稳定。另外，台湾地区还有一项宝贵的人才资源，值得大陆挖掘。台湾多年来注重技术职业教育，其毕业生在台湾经济奇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技术职业教育师资尤其强，但因“少子化”影响，很多技术院校将面临“退场”的命运，大量师资将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大陆要提升经济层次，正好需要很多这方面的人才。

（二）创造更适宜的社会融入的制度环境

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帮助台籍青年教师在传统的地缘、乡缘之外开拓更广阔的社会网络，帮助台籍青年教师建构新的支持网络与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对台籍青年教师的管理不能继续采取“准外国人”的安排，要不断完善涉台政策法律体系，更主动地调整与作为。虽然一些技术性的制度改变已经发生，如台胞证可以自助取票等，但这些远远

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台湾身份证件의“公民化”和内地条件下的“平权化”,使之有平等的“融入感”。

(三) 创造更友善的心理融入的转换机制

随着大陆不断进步和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入开展,陶醉于“天然独”下的台湾青年与接受“中国梦”教育的大陆青年因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不同,难免会有小摩擦、小冲突,但只要两岸青年多交流、多交心,台湾青年也终将体认到中华文化的同根性,两岸同属一家的事实,并最终融入到“中国梦”的建设中。在这种心理转化中,台籍青年教师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仍然存在种种疑虑和彷徨,但是两岸青年深层次交流的大门已然打开,大陆广阔的市场为包括台籍青年教师在内的广大台湾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只要我们能够持续推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两岸青年一定会携手实现深度的社会融合和心灵的契合,为两岸的最终统一奠定最牢固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参考文献:

- [1] 林志成.冷门班退场,台湾产生不了伟大思想家[EB/OL].2017-08-07.<https://tw.news.yahoo.com/%E5%86%B7%E9%96%80%E7%8F%AD%E9%80%80%E5%A0%B4-%E5%8F%B0%E7%81%A3%E7%94%A2%E7%94%9F%E4%B8%8D%E4%BA%86%E5%81%89%E5%A4%A7%E6%80%9D%E6%83%B3%E5%AE%B6-215006830.html>.
- [2] 孙烨.外籍人士的社会融入状况[J].华东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7页.
- [3] 孙烨.外籍人士的社会融入状况[J].华东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23页.
- [4] 万仁奎.陆重金挖师资锁定台湾三高[EB/OL].2015-09-12.<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12000385-260108?Chdtv>.
- [5] 博士班擬減千名額 盼量少質精[EB/OL].2015-06-11 13:22:48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2752487>.

【责任编辑：杜联藩】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及其对 香港政治发展的影响

覃辉银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 中央政府毅然行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主导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完善。“爱国者治港”为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立了指导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 并制定了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配合, 修订本地配套法例, 并成功地进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人选举。以“爱国者治港”原则正本清源, 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强了公务员队伍整肃和爱国爱港力量建设, 对行政长官提出了新要求, 同时引起泛民主派阵营发生分化。香港新型民主选举制度奠定了香港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制度保障, 带动了香港政治体系的深刻调整, 重新塑造了香港的政治文化, 发展出一条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发展道路, 实现了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推动香港政治发展进入到“爱国者治港”的新阶段, 展现了良政善治的前景。

关键词: 香港; 选举制度; 爱国者治港;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52-06

香港回归 25 年来,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民主循序发展, 港人真正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和自由。然而, 随着形势的发展, 尤其是近十年来香港社会发生的种种乱象表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有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香港“反修例”风波演变为社会动乱, 充分证明香港近年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 是涉及夺权与反夺权、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新一轮立法建制是一场反颠覆斗争, 是一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及香港特区管治权、民生、经济的保卫战。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与实施香港国安法是一套组合拳, 旨在从根本上治理挑战香港宪制秩序的乱象, 校正香港政治发展的航向。

一、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立法进程

面对一段时期以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上正本清源、完善选举法制成为当务之急。

(一) 国家层面的立法

2021 年 1 月 27 日, 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强调: “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1] 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 为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立了指导原则。中央有关部

收稿日期: 2022-11-10

基金项目: 2022 年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招标课题“从两场选举看‘爱国者治港’不是搞‘清一色’”(TZKT2221)

作者简介: 覃辉银, (1969-), 男, 湖北利川人, 土家族, 政治学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门2月底和3月中旬举办了两轮系列座谈会、听证会、访谈活动，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完善“爱国者治港”有关制度的意见和建议。2021年2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指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包括五大原则：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2021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阐述了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基本思路和推进方式以及基本内容。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共9条内容。2021年3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全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75、7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重新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并增加赋权；二是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采用“双提名”机制；三是立法会议员总数由70人增至90人，通过选委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等三种方式选举产生；四是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是一次“进行总体制度设计”的改革，其中贯穿一条清晰的主线——爱国者治港。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跟进立法

2021年3月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表示，她本人和特区政府完全尊重中央对完善选举制度的主导权，并认同王晨副委员长阐述的五大基本原则；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通过本地立法贯彻执行。2021年3月8日，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开展配合工作：一是全面推展有关解说的工作，二是修订本地选举法例，三是在未来12个月举办三场选举。

香港多位政界人士、多个建制派政党和团体先后发表声明支持全国人大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随即以本地立法方式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上述决定和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涵盖8项主体法例和24项附属法例的有关本地法律修订法案。”^[2]2021年5月27日，立法会通过了《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并于5月31日刊登宪报生效。

二、新选举制度下的三场重要选举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决定，选委会选举定于2021年9月19日进行投票，立法会选举定于12月19日进行投票，行政长官选举定于2022年3月27日进行投票。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

2021年7月6日，林郑月娥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七人名单，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担任主席。2021年8月6日至12日，香港选委会选举接受提名。8月26日，李家超公布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共收到1498人登记申请，裁定1496人的参选资格有效，包括325名当然委员、156名提名产生的委员和1015名界别分组候选人，被裁定资格无效的有两人。^[3]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于9月19日下午6时结束，投票人数4380人，整体投票率近九成。20日清晨选举揭晓，412名候选人竞逐的13个界别分组中364席全部顺利产生。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由1448名委员构成。以政党计算，民建联取得150多个席位，当选人遍布五大界别；工联会取得76席。至于非建制派阵营，泛民主派政党均没派人参选，仅有独立民主派、西贡区议会主席周贤明及“新思维”主席狄志远通过资格审查，参选社会福利界，结果只有狄志远当选。此次选举立下了“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政治规矩，使香港政治选举回到正轨上来，对香港未来发展影响深远。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根据新选举制度，香港第七届立法会共有90个议席，分为选举委员会界别40席、功能组别30

席及地区直选选区 20 席。地区直选选区为 10 个,采取双议席单票制,各自选出两名议员。提名期为 2021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2 日。实政圆桌、工联会、民建联、新民党都推出了自己的选举部署,反映建制派内部的竞争比以往更激烈。主流建制党派纷纷高调主攻民生议题,推出新口号、新纲领。民主党、公民党、民协早前已宣布“缺席”本届选举。“根据参选人报称的政治立场,至少 13 人(8%)自认非建制派”^[4]。截止 11 月 12 日结束提名,共接收 154 份提名表格。据统计,90 个议席全部出现竞争。李家超 11 月 19 日公布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审查结果,153 人资格有效。

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从 202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8 时 30 分正式开始。最终统计结果,建制派获得 82 席,非建制派获得一席,另有七席由无政治背景的参选人摘下。在地区直选方面,建制派赢得全部 20 个席位,在 10 个地区一共获得 123 万票。民建联囊括了地区直选一半席位。非建制派在 10 区中无一胜出。20 日凌晨,冯骅向媒体公布,地区直选累积投票率约 30.2%,共有约 135 万人投票。功能组别方面,狄志远在社会福利界胜出,是唯一当选的非建制派参选人。选委会界别大多是新人。^[5]五大传统建制派政党,约占 90 个议席的一半。同时,本届立法会涌现出至少三十多位无政党联系的独立人士。本届立法会没有多数党,呈多元、分散的“碎片化”格局。12 月 26 日,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新制度下选出的立法会议员都爱国爱港,再如过去区分“建制”与“非建制”意义不大。^[6]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于 2022 年 1 月 3 日上午举行。香港特区政府 1 月 4 日发布新闻公报,梁君彦当选第七届立法会主席。1 月 12 日,香港第七届立法会举行了首次会议。

(三)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

新选举制度规定,行政长官须经选举委员会提名及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将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举行。2022 年 1 月 27 日,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召开记者会公布行政长官选举活动指引,冯骅宣布了选举程序、竞选开支及广告等相关规定。2022 年 2 月 18 日,林郑月娥宣布,因应疫

情急剧恶化,行政会议引用《紧急法》将行政长官选举押后至 5 月 8 日举行,提名期改为 4 月 3 日至 16 日。

4 月 9 日,李家超正式宣布参选第六届香港行政长官。提名期内,选举主任只收到一份提名表格。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4 月 18 日宣布,裁定李家超提名有效,以 786 名有效提名成为唯一候选人。4 月 29 日上午,李家超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正式公布竞选政纲,包括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团结一致为民解困;精简程序多管齐下,提供更多安居之所;全面提升竞争实力,创造持续发展空间;同建关爱共融社会,增加青年上流机会。5 月 8 日,选举事务处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设立一个主投票站,并在竹篙湾社区隔离区设立受防疫措施影响的投票站。从上午 9 时至 11 时 30 分,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陆续来到会展中心,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李家超获得 1416 张支持票,以 99.16% 的得票率高票当选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本次行政长官选举是有香港特色民主的又一次重要成功实践。“此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的全过程,展现了香港社会团结一心、奋发进取的良好风貌。这是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也是港人‘狮子山精神’的生动展现。”^[7]5 月 20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就职。5 月 30 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李家超,颁发任职的国务院第 754 号令。5 月 30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李家超,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期望。

三、新选举制度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 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队伍整肃

香港公务员是高薪厚职,但其政务官的表现观感与“稳定高效、廉洁奉公、专业细致”的定位似乎有所出入。相对于纪律部队以注重效率、执行力强见长,公众对政务官的印象是廉洁、谨慎、注重程序,但在政治判断力和政治执行力上表现不足,在积极推行改革、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回应西

方势力压制等方面缺乏胆识和魄力。香港文职公务员长期奉行“政治中立”，立场模糊。有不少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内地体制仍然心存抵触。多年来的官僚主义、懒政怠政、管治不善问题受到诟病。国家认同、政治忠诚、对大陆缺乏基本认识，都是香港文职公务员亟待弥补的课题。于是，中央立法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参选、任职和就职宣誓等规矩。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香港《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于2021年5月21日刊宪生效。该条例规定，公职人员需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特区政府还修订了《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条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截至2021年8月底，共有129名公务员不理睬，或拒签和交回声明。有149全职非公务员及约380名兼职非公务员的政府雇员，不理睬或拒签和交回声明。9月15日，公务员事务局指出，其中绝大部分人已经离开政府，余下数宗个案预计会于短期内陆续终止聘用。^[8]特区政府2021年9月10日、9月24日、10月4日、10月8日分区举行了四场区议员宣誓仪式，共有198名区议员受邀宣誓，最终49人被认定宣誓无效，取消区议员资格。他们须即时离任，五年内也不能参加香港任何选举。

2021年5月10日林郑月娥表示，将与广东省、深圳市签订协议，让两地公务员交换“挂职”，一则让更多香港公务员接受锻炼，二则为共建大湾区激发制度和政策创新。香港公务员学院2021年12月9日正式成立，强调加强公务员对“一国两制”方针、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培训。2022年2月9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立法会咨询会上表示，未来公务员培训包括四大方向——特区宪制秩序和国家发展、公务员领导能力、在服务中应用创新科技、国际视野。2022年5月，新一届清华大学高级公共管理硕士（EMPA）香港政务人才项目已经完成招生。李家超提出为各部门设定“关键绩效指标（KPI）”，强调人才选用的三个条件——有能力、有经验、有服务市民的热诚。

（二）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国爱港者队伍和能力建设

2022年5月13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强调，要深刻认识提升爱国爱港爱澳力量能力建设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坚持“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聚焦骨干力量、夯实基础力量、培育新生力量，努力提升政治把握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团结协作能力、联系群众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助推特区实现良政善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9]夏宝龙2021年2月22日、7月16日和12月6日的三次讲话，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政治含义、具体要求、划分标准、实施保障等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今日香港，尤其需要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打破过去的用人思维和格局，让德才兼备的治理者来推动结构性改革，解决深层次问题，促进民生福祉和社会公平，让香港走出困局，重拾信心和民心。学者田飞龙指出，对建制派而言，爱国者治港不是仅仅提供了更多席位和职位，而是提出了服务香港与国家的更高能力要求，尤其是对领导岗位提出了“坚定的爱国者”的升级要求。中央决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而是贤能的爱国者。建制派更应反思不足，积极迎接改制后的挑战，充分展现其治港能力，赢得广泛的认可。^[10]立法与行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已经出现，立法会积极履行宪制责任，监督并配合政府施政，努力解决难题，改善民生。加强香港社团建设也是重建香港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新要求

新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当然应该爱国爱港，应该真心尊重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坚定地拥护和贯彻“一国两制”、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香港选举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坚持“爱国者治港”原则，符合夏宝龙为香港“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提出的四大条件、“五个善于”和“五有”的要求。不仅要想干事还要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行政长官既要向中央政府负责，又要向香港社会负责。中央政府指出，目前香港首要的是要解决积累多年的深层次问题。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单一和畸形、贫富分化严重、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保障不足、阶层固化、贫民生活艰辛、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等，已经是积重难返，

严重妨碍香港发展。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社会政治生活的正本清源和由乱转治只是初见成效。治港者还面临弥合社会撕裂的创伤,还有眼前的抗疫和恢复通关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呼唤一位坚持“一国两制”、“爱国爱港”的有魄力、重实干的改革家,抓住新一轮立法建制带来的契机,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大乱走向大治走向发展繁荣,以实实在在的政绩交出答卷、取信于民。

5月30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李家超说:“你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不同岗位上都履职尽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作出了贡献。中央对你充分肯定,也充分信任。”“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11]李家超先生领衔组建了“一支爱国爱港、担当作为、精诚团结、为民服务的管治团队”^[12],应当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国安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开拓精神和斗争精神,展现新气象新希望,并带领新一届政府和团结各界人士,恪尽职守,奋发进取,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做到“四个必须”,“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做好关心关爱青年人的工作,^[13]“充分发挥香港传统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加快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高综合竞争力,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努力破解民生难点痛点,不断提升治理效能”^[14],发挥协同效应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拓展国际市场以消解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限制,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社会和谐同心,“同建充满活力、希望、发展机遇和关爱共融的香港”^[15]。

(四) 香港特别行政区泛民主派阵营的分化及走向

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包括“香港众志”、“民间人权阵线”、“教协”、“支联会”等在内的反中乱港组织纷纷溃散;一批长期反中乱港的违法犯罪分子,被依法拘押并判刑入狱,或逃往国外继续作乱。自从中央划出“爱国者治港”底线后,中央和香港本地一项又一项的措施出台,对泛民主派的政治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2019年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违反《基本法》第104条为由,剥夺了四名泛民主派议员的资格,继而引发泛民主派“总辞”。然而,“总辞”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面临严重问题——失去了主要的政治参与平台,难以维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且断绝了大部分政党财源。泛民主派的政治活动空间急剧缩减,结果陷入内讧分化、人员流失、资金枯竭、前路茫茫的局面。

爱国者治港不是搞“清一色”。香港已翻开新的一页,民主派应该反思,重新确定政治路线和纲领,回归“和理非”,与港独、暴力、“揽炒”等划清界线,参与重大香港政治进程,方能重获一线生机。事实上,泛民政党的政治空间在于“一国两制”。人们看到,原来的泛民主派阵营开始分化,出现了媒体所谓“旧泛民”与“新泛民”之分。“新泛民”是指,自我认定为民主派,但接受新选举制度,宣称爱国爱港,主动站出来积极参加选举的原泛民主派政团及人士。总之,“爱国者治港”就是要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广泛选拔政治精英。

结 语

2021年成为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水岭。新选举制度从提名程序到资格审核全流程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选举结果体现了“反中乱港者出局”的社会共识,遴选出一股坚定的爱国爱港力量,奠定了香港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制度保障和结构布局。新选举制度催发出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和实践,生动地显示了优质民主、实质民主的形态和过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优化提升和与时俱进,成功地迈出了香港政治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步。新选举制度带来新的政治规矩和政治行为,激发新的政治伦理和政治议题,培育新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生态,吸引香港市民产生新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认知,带动香港社会逐步走出偏激的氛围和“泛政治化”的泥沼,让政治生活聚焦民生和发展议题,校正了香港政治发展的航向,宣告香港旧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模式成为历史。新选举制度奠基性地重新塑造了香港的政治文化,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巩固了行政与立法之间良性互动的行政主导体制,凝聚和激励各方面德才兼备的

优秀人才积极参政议政，展现了爱国贤能者治港、提升治理效能的前景。随着新型民主选举制度带动香港政治体系的深刻调整及其优势和效能的充分彰显，香港政治发展进入到“一国两制”下“爱国者治港”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 香港中联办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EB/OL]. http://big5.locpg.gov.cn/jsdt/2021-04/16/c_1211113328.htm, 2021-04-16.
- [2]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 [EB/OL]. http://www.news.cn/gangao/2021-12/20/c_1128179674.htm, 2021-12-20.
- [3] 龚学鸣. 假爱国者休想过关！李家超：郑松泰丧失立法会议席 [EB/OL].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1/0827/624892.html>, 2021-08-27.
- [4] 立会选举将重塑香港政治文化 [EB/OL]. <https://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al/story20211118-1214623>, 2021-11-18.
- [5] 港立会选举建制派大胜 非建制派仅得一席 [EB/OL].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11220-1224842>, 2021-12-20.
- [6] 李慧琼. 新议员都爱国爱港 不用再分建制非建制 [EB/OL].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11226-1226523>, 2021-12-26.
- [7] 2022年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ipc.fmprc.gov.cn/chn/fyrth/202205/t20220513_10685849.htm, 2022-05-13.
- [8] 129名香港公务员拒签宣誓声明 港府：大部分已离职 [EB/OL]. <https://news.ifeng.com/c/89YxzOY1nsg>, 2021-09-15.
- [9]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进一步提升爱国爱港爱澳力量能力建设”协商议政 汪洋主持 [N]. 光明日报, 2022-05-14 (03).
- [10] 田飞龙. 爱国者治港：香港民主的新生 [EB/OL]. <https://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210303-1128447>, 2021-03-03.
- [11] 习近平会见李家超 [EB/OL].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30/c_1128697596.htm, 2022-05-30.
- [12] 张烁. 国务院港澳办：祝贺李家超获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N]. 人民日报, 2022-05-21 (02).
- [13]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701/c1024-32463862.html>, 2022-07-01.
- [14] 李克强会见李家超 颁发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 韩正出席 [EB/OL].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30/c_1128697214.htm, 2022-05-30.
- [15] 陈然. 李家超感谢中央政府任命 [N]. 人民日报, 2022-05-21 (02).

【责任编辑：杜联藩】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进路研究

常庆林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摘 要: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社会阶层是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共同治理的新生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中优势明显、作用特殊。深入分析和研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大有裨益。当前,新的社会阶层已经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既具有独特优势也存在主体性问题,应通过政治引领,夯实其政治基础;制度为先,强化其组织保障;强化培训,提升其整体能力;注重发掘,扩大其潜在功能;协同共治,提高其实践效能。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社会治理;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58-06

新的社会阶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阶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20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二个必须”精辟诠释了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十二个必须”其中之一。2020 年底,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其中新增加了一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的范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 and 外商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等。”^[1]在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对

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经成为促进中国阶层关系和谐稳定的关键群体,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动力和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深入分析和研究新的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优势,特别是探究其主体特质,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优势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现代化维度将是全景性、深层次的。作为改革开放孕育的新生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高知、高薪、高能、高素质、高责任感等特点,在促进经济转型、推动双循环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优势明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收稿日期: 2022-12-10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社会治理视域下黑龙江省统一战线工作创新路径研究”(22ZZH081)

作者简介: 常庆林,男,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副教授、黑龙江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新的社会阶层。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

新的社会阶层是专业报国、积极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支同盟军。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要有“3个30万”，即30万注册会计师、30万税务师、30万律师。据2021年调查统计，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数量约为9100万人，2016年调查数据为7200万，5年之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量增加了约1900万，增幅更是达到26.3%。他们奋斗在经济社会第一线，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促进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健康运行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近1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优势和意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身份灵活，是新的发展阶段推动社会创业创新发展的活力群体。他们投身各行各业，不断发挥自身优势，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企业发展方面作用明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拉动消费、就业、内需，协同稳定经济增长。同时，他们争取自我发展所需的社会支持和成长空间，有助于形成高效、高质量的发展，这也使其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相对纯粹的“社会人”，其思维更加活跃、观念更加多元、人格更加独立、社会参与意识更加强烈，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近年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救灾济困、慈善公益等公共事务，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参与塑造舆论生态，与其他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共同推动社会治理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新的社会阶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政基础之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根据“两阶级一阶层”的传统政治分层，他们与我国的工人、农民、体制内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独特优势

1. 建言献策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建言献策来是一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从成员构成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建言献策的先天优势。一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人士多数担任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等职务，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愿望。长期以来，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等方面献计出力。他们在各级会议上提出的提案、议案涉及社会治理，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二是新的社会阶层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等特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优势和特征明显，特别是在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和继承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社会公益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

社会治理离不开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通过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促进社会治理效果明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热心慈善、社会服务、关心公益、回报社会的特质，他们在社会服务、社会公益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一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的意识由偶发变为常态、由个人变为群体，越发自觉，社会服务效果明显。二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和高效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服务团、公益行、民营企业基金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社会公益，各种组织的社会服务日趋成熟，成效日渐显著，解决了很多社会治理方面的棘手问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

3. 化解矛盾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

化解社会矛盾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在积极发挥这一功能。例如，中介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士中的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需要中介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参与，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参与可以压缩和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中介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进一步提高小康社会

的成色,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和谐氛围。

4. 弘扬文化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突出优势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与文化紧密相关,特别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巨大,他们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参与社会治理、推进文化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一是新的社会阶层中的自由职业人员特别是网络作家、网络歌手、自由撰稿人、自由演员等新群体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新的社会阶层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通过积极正确的发声,“把握社会化的方向,抓住网络这个重要途径”^[2],在网络媒体中弘扬主旋律、宣传正能量,通过表达公众意见诉求、引导社会舆论等参与社会治理,效果明显。三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提高文化产品层次和质量,助力社会治理。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以黑龙江为例

本研究对黑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制约因素进行了调研。调研数据显示,黑龙江省现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 105.6 万人,其中第一类群体即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占比最大,约占总人数的 50% 以上;第二类群体即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占总人数的 16.9%;第三类群体自由职业人员和第四类群体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人数占比都在 10% 左右。其中,已被全面了解和掌握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有 3000 多人。2018 年 8 月,哈尔滨率先成立市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哈尔滨 9 区 9 县(市)此前已经全部成立了新联会,共有会员 2240 名。哈尔滨市新联会有会员 402 名,下设政治共识、参政议政、社会公益、公员工作、监事工作 5 个部,并把区县(市)新联会作为市新联会分会进行指导和管理。2019 年 12 月,黑龙江省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在各级新联会积极引导下,黑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改革发展,促进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本研究课题组先后深入哈尔滨、大庆、牡丹江等地调研,依托各地新联会针对黑龙江省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开展调研。调研中共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回收问卷 385 份,回收率为 96.2%。从调研结果看,黑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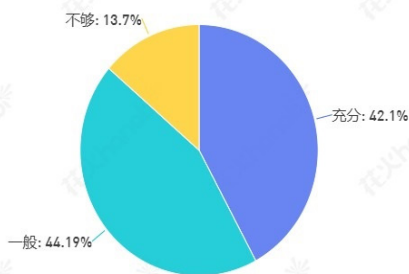
(一)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动性不够优势发挥不显著

调研结果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效果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要求还存在差距。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治理的意愿不强,主体能动性不够。尽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不断扩大,但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为社会治理是政府的事,和自己没有关系,还有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社会治理的合适身份,不便参与。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优势发挥不显著,各群体优势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构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四大群体特点和优势有所不同。调研显示,中介和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较好,能够较好地运用自身专业优势参与社会治理;自由职业者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效不明显,还应进一步强化和引导。(见图 1、图 2)

(二)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和相关制度不完善

您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作用如何?

单位: %



数据来源: 课题组调查问卷

制作: 黑龙江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课题组

图 1

您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过社会治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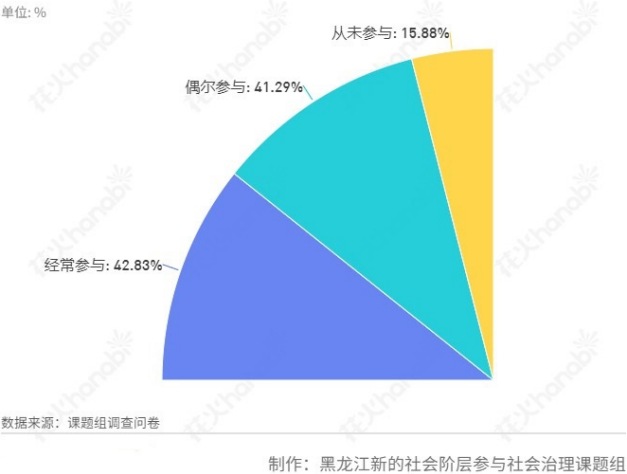


图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需要顺畅的参与平台、高效的参与机制，及完善的制度保障。从调研结果来看，平台和制度建设还有提升空间。一方面，目前尚未搭建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参与平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多是个体零散性参与，效果不明显，亟须搭建多层次的参与平台，畅通参与渠道，解决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效果评估等均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实效性。（见图 3、图 4）

您认为黑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如何？



图3

您认为黑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完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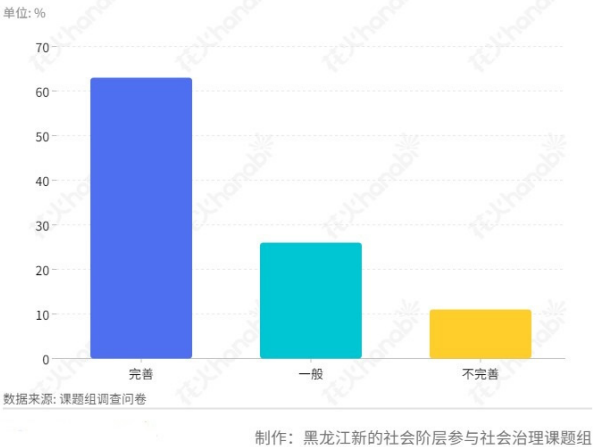


图4

（三）引导和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方式和内容较单一

调研中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认识存在误区，对如何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工作还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关部门对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主动服务意识不高。二是引导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需求不一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成长起来的，其主体具有时代性，与传统行业存在很大区别，对其仅使用传统统战工作方式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统战干部要学会用新理念、新思维和新的工作方式方法，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有效沟通。（见图 5、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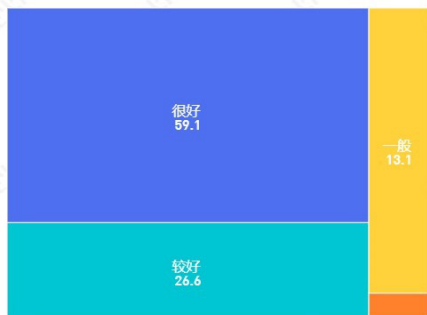
三、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关键在于“组织起来”。进入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充分调研以及学习借鉴四川、浙江、广东等地成熟经验和先进

做法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五个方面提出加强和改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建议。

您认为本地相关部门对推动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如何?

单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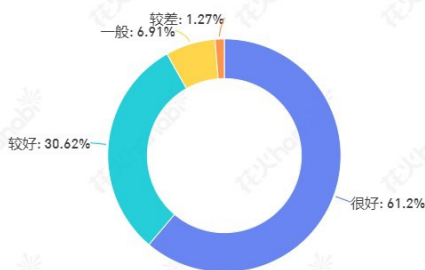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课题组调查问卷

制作: 黑龙江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课题组

图5

您认为本地相关部门对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引导如何?

单位: %



数据来源: 课题组调查问卷

制作: 黑龙江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课题组

图6

（一）政治引领、示范带动，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成员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责任重大。首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哈尔滨为例，哈

尔滨市所属 18 个区、县（市）新联会全部建立了中共党组织，通过党建工作，提升新联会党支部的凝聚力、引领力和战斗力，加强党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导。其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是政治引领和政治认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网络是重要阵地，要用足用好网络平台，通过有效沟通增进共识，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面发声。要主动融入新的社会阶层掌握网络传播与宣传规律，适应新的信息输出方式，用他们易于接受的方式，增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认同，引导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参与社会治理。例如，哈尔滨市打造网络宣传型实践创新基地，推出统战宣传融媒体产品，政治引导作用发挥明显。最后，要坚持多方发力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要整合网络统战资源，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优势。同时要增强管网治网能力，加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舆论引导，凝聚网络共识，不断提升统战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二）制度为先、渠道多元，强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

首先，建立和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制度，为其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组织保障。要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将社区、社团、网络融为一体。在发挥社区作用方面，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倪家桥社区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武侯区建立“倪来我往”文化创意聚落，倪家桥社区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激活社区资源，发挥辖区新文艺群体和自由职业人士人才优势，构建社区统战新格局，共建“玉林小酒馆、同心大舞台”。其次，畅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搭建参政平台，提供载体保障。新的社会阶层中以律师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政治参与意愿较为强烈。要利用政协、统战和群团等组织，充分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吸纳和团结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发挥其专业优势，观察社情民意、解答疑难困惑、调解纠纷矛盾。同时，选拔优秀人士进入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行列，安排代表人士参加民主协商会、情况通报会等活动，通过建立综合评价制度，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三）更新理念、强化培训，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能力

首先，重点发挥社会主义学院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中的教培主阵地作用。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院校，是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全体成员的教育培养主阵地。社会主义学院在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要优化培训内容，针对不同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其次，以实践为重点，不断创新教育培训的形式和内容。要坚持问题导向努力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参政能力。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活力。最后，搭建教育培训平台，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参与政策宣传和社会治理。浙江省杭州市委统战部“一中心两团”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一中心两团”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中心、智库（宣讲团）和服务团。杭州市委统战部与杭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挂牌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中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智库（宣讲团）积极宣传党的历史和理论方针政策，并定期组织智库论坛；服务团带头开展社会服务与公益活动，规范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四）发掘储备、因地制宜，扩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潜在功能

首先，要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中代表性人士的发现和储备。要发掘和培养新的社会阶层中具有较强代表性、旗帜性和领军特质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现和储备新的社会阶层中，在新联会中发挥突出作用，在新联会成员中具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代表人士。其次，要注重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挂职锻炼和培养使用。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选拔重点人物，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锻炼，能更好地发挥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例如，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创新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兼职锻炼工作成效显著。天河区委统战部会同天河区委组织部选拔3名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分别进入3个群团组织担任副职领导，进行为期一年的兼职锻炼。通过“培养锻炼一个人，影响带动一大片”的辐射作用，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党委、政府的良好互动氛

围。最后，要突出个性服务，扩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政治参与。第一，要积极搭建新的社会阶层个性化人才服务平台、政策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合作共赢服务平台，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及时了解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第二，要把握定位、创新方式、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专业优势，对社会治理建言献策。第三，要优化培养模式，提升队伍素养。通过常态化培养、制度化管理，推动新的社会阶层队伍建设更加专业化、组织化，为参与治理助力。

（五）开拓创新、协同共治，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效能

首先，加强社团活动。黑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法律服务团已于2020年11月成立，此后，为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还将成立会计师、评估师、企业管理顾问等分类服务团，由统战部引导服务团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其次，强化组织起来。以自组织为平台载体，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有序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这既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协同治理、民主治理，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再次，搭建对接平台。探索召开社会组织交流对接会。统战部可牵头社会组织代表和政府部门、社区参加交流对接会，现场发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搭建政府和社会组织供需对接平台，使社会组织找到“供血方”，政府部门找到“左膀右臂”，合理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
- [2]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N].人民日报，2017-02-25（1）.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4.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

【责任编辑：余伟】

新时代地方政协践行群众路线的路径研究

徐 军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十八大以来, 各地政协积极践行群众路线, 在实践中创造了以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为核心, 辅之以加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建设、直接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设立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政协开放日活动、建立分层走访联系制度的路径体系。

关键词:新时代; 地方政协; 群众路线;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64-05

2014 年 9 月,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明确提出“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 “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 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这就将政协与党的群众路线鲜明联系起来。那么, 各地政协在十八大以后是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的呢? 有哪些做法和经验? 还存在哪些须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解决好这些问题, 对于进一步推进政协领域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019 年, 以笔者为负责人的课题组承接了武汉市政协智库 2021 年度重大理论研究课题“关于地方政协系统党的建设研究”, 对相关文件、文献、实践做法进行了系统搜集和分析研究, 发现各地政协在践行群众路线方面主要形成了以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为核心, 辅之以加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建设、直接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设立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政协开放日活动、建立分层走访联系制度的路径体系。

第一种路径, 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

在这次调研中, 我们发现各地政协中践行群众路线中都会不约而同将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作为首选路径, 这是因为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 在长期政治协商的民主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协商组织经验, 能够直接为基层所学习和借鉴。

那么这些平台建在哪儿? 既然是基层协商议事平台, 肯定是建立在基层, 但具体做法又有所不同, 从我们这次调研的情况来看, 大多是在乡镇街道和社区村两级建立, 也有在民主党派等统一战线组织或依托政协委员所在单位建立, 不管是建在哪儿, 都能够直接面向基层群众, 区别只是在是综合性或单一性群众。

具体又是如何建呢? 从各地做法来看, 绝大多数是建设协商议事室(厅), 这些协商议事室多数是依托党员活动室、各类服务中心等现有场所和资源, 也有的是依托政协委员联络站或工作室, 或者两者同步建设。在建设过程中, 一些地方不拘一格, 注重实效, 如某市政协统筹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 坚持“不求所有求所用、不设门槛讲共享、不建机构建机制、不拘一格创特色、不图

收稿日期: 2022-11-10

基金项目: 武汉市政协智库 2021 年度重大理论研究课题“关于地方政协系统党的建设研究”(WHZXZK202110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军(1968-), 男, 湖北武汉人,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副校长、武汉市行政学院副院长,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理论研究湖北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合作导师、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统战理论与实践。

形式重效果”的原则，在开放中拓展空间、在融入中强化功能、在衔接中完善机制，在创新中塑造特色、在求实中彰显质效，为政协委员沉到基层、下到一线创造了良好履职条件。某区政协积极探索，率先成立社区建设委员会，作为推进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的指导机构，同时争取区委办转发了区政协党组关于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发挥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重要作用的指导意见，在全区所有14个街道统一搭设“协商议事厅”平台，坚持“是有效衔接，而不是代替包办”“是共享平台，而不是协商主体”。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一些地方政协专委会也在基层建立了协商平台，如某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在具有代表性的9个县市区设立“三农”工作联系点，创设“三农共商”协商平台，每年与基层在农村现场召开联动协商会，达到政治学习、业务提升与履职建言“三促进”效果。同时各地在建设过程中，结合自身情况，有的是采取普遍建的做法，如某市政协已建成“好商量”协商议事室3007个，乡镇街道覆盖率达100%；有的则是采取示范建，先选择基础好的建设一批，在形成较为成熟的做法后再逐步推广。

建设起来做什么？主要是开展协商议事，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确定协商议事流程，如某区政协规范协商议事程序，实行协商议事“六步工作法”，即由党员委员小组牵头，组织开展协商议题收集、确定协商议题、组织协商前调研、围绕议题协商、落实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反馈。每个月固定1天为“协商议事日”，组织开展一次“微协商”活动。其二是确定协商议事组织和参与主体，如某区政协建立“3+N”协商议事机制，实行区政协党组、街道党委、社区党组织三级党组织为议事召集人，强化党的领导，通过党员委员带头参与，引导辖区内三级政协委员、利益相关方、职能部门负责人、“五老”代表、新时代“乡贤”代表等“N”个涉及协商事项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有效扩大基层协商民主“参与面”。

建起来如何保障协商效果？各地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如某区政协建立“预协商”筛选机制，把基层难以解决的议题纳入区级协商选题范畴，让一线协商不再“议而难决”；有的地方注重发挥政协党组织和党员委员作用，把支部建在协商

议事室上，发挥党组织和党委员“召集人”作用；还有的地方依托党委“一组一会”（“一组”就是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设置党小组，“一会”就是配套组建村民理事会）议事平台嵌入政协协商，创新打造“党委领导、政协组织、百姓参与”的“一组一会一协商”的村（居）协商品牌；有的创新开展“委派式”民主监督，委派民主监督员坚持党组研究确定，成立以党员委员牵头、具有较强专业性和代表性的委员监督小组，向有关部门印发《民主监督意见书》，开出“政协药方”，有力推动了一些问题整改；还有的创造性地将“有事来协商”工作纳入纪委监委巡察内容，推动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建设落地见效。

通过上述措施，不仅是将基层协商议事平台搭建起来，而且真正实现了协商与民，协商为民的效果，如某市政协持续打造“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畅通政协委员、职能部门和市民群众面对面协商渠道，平台2018年获评该市城市治理十改革创新奖，2019年入选中组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某市政协创建“服务大局好帮手”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围绕市委大局，大事“当助手”，难事“伸援手”，凡事“搭把手”，成立协商议事室1063个，开展协商议事活动3800多场，协调解决问题1506个，真正帮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问题，群众感觉政协很近、委员很亲。

由此可见，政协通过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有力推进基层协商，实现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机衔接，开辟了新时代政协践行群众路线的现实路径，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领域。目前，这项工作已在全国比较普遍开展起来，需要深入全面总结。

第二种路径，加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建设。

伴随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的搭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建设也呼之欲出。本来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章程，政协只设到区县这一级，这点与人大还不一样，人大在乡镇是有的，而按我国一般认知，区县以下，也就是街道乡镇、企事业单位等才是基层。政协应不应该向街道乡镇乃至社区和村延伸，如何延伸？一直是个颇受争议的问题。过去我国曾经在街道乡镇设立过政协联络委员会，其

主任享受街道乡镇正职待遇，后来在机构改革中基本上都被撤销，从这个意义上，政协在基层一度并没有机构。但是十八大以来，各地在推进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建设过程中，通过建立政协委员工作站或委员工作室方式，实际将政协机构向基层延伸，尽管这些机构与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在形式上有很大区别。

从这次我们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政协加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建设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乡镇街道建立委员工作站，如某市政协在全市 76 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政协委员工作站，在建政协委员工作站同时，建设协商议事室，也就是将委员工作站作为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的支撑。这个市逐步将乡镇街道党组织副书记增补为县（市、区）政协委员，兼任本级政协委员工作站站长。按照“籍贯回乡、住所就近、方便参与、广泛协商”的原则，将驻该市的省政协委员和市、县政协委员 1209 人全部编入基层协商议事平台。一种是委员所在单位或社区建立委员工作室（委员之家），如某市政协在全市推动建设 1340 个“委员工作室”。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使政协工作在基层有了落脚点。

这些基层政协机构建起来做什么？从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发挥委员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的优势，团结带领界别群众、社会贤达、行业专家等参与经常性协商议事活动，还有就是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如某市政协创新设立“委员之家”，研究确立“标准建家、制度管家、服务兴家”的创建原则，紧紧围绕四项目标（学习培训新载体、协商议政新渠道、联系群众新桥梁、展示风采新窗口）、“五大”功能（政治功能引领方向、协商功能助推发展、服务功能增添动力、文化功能激发活力、人文精神彰显品位）、“六有”标准（有组织、有场所、有设施、有制度、有计划、有档案），开展建设工作。

从调研情况来看，应该说这些基层政协机构建起来后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从各地材料中看到最多的就是打通委员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有效履职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真切感受“政协离得很近、委员就在身边”。

各地在实践中还创造了一些好的做法：如加强党对这些基层政协工作机构的领导，发挥政协党组

织和党员委员的作用，如某市政协要求党员委员在委员工作室中带头值班，带头反映社情民意，带头协调基层矛盾；某县政协实施“专委会党支部+乡镇政协委员召集人”制度，明确由 1 名县政协党组领导班子成员、1-2 个专委会党支部，分别对接 2 个乡镇政协委员召集人的联建制度，实行党建引领，工作信息、资源、推进、成效共建共享，专委会党支部把开展“微协商”作为办实事的突破口，将“微协商”打造成“党委政府好帮手、人民群众连心桥、委员履职新平台”；某区政协推进各站实现政协党组和属地党委“双线”领导，为政协在基层开展履职活动加上“双保险”；某市政协创新设立“结对共建”，组织站室所在基层广大党员、委员共过主题党日、共学党史、共听优秀党课，形成推动党建工作的协同效应。

相比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的普遍搭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建设还只是在全国部分地区探索推进，这些机构一般没有编制、多数也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的工作经费，日常运行主要是依托所在基层党组织和相关政协委员来进行，由于政协委员一般都是兼职，只是在筹备和开展活动才会到站室来，因此它们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机构，但是这些站室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推动了基层协调议事平台的建设，而且使政协工作深入到基层，便利了政协委员了解民情、汇集民智，也方便了基层群众认识政协、参与协商，构成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支点。应该鼓励一些地方积极试点，及时总结，出台政协基层委员站室建设的指导意见，使这一路径走上规范化发展轨道。

第三种路径，发挥政协委员的专业、智力和联系优势，直接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

过去，政协主要是围绕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开展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也对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民主监督，但很少去直接做服务群众的工作。十八大以来，不少地方政协在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加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的同时，也开始尝试发挥政协委员的专业、智力和联系优势，直接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这的确是政协难得一见的新现象。

政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恐怕一个直接原因是：在新时代，政协在推进基层协商过程中，仅仅

只是起一个平台提供者的作用是不够的，更希望能够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党和政府做点事、帮基层群众解点难，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形象，让基层群众知道政协、理解政协，也就是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直接服务基层群众，进一步了解民情、汇集民智，使政协的各项履职工作深深扎根在中国广阔的土壤里。

从这次调研情况来看，各地政协在直接服务基层群众中，主要是采取了以下方式：

一是组建服务队。如某市政协组建6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团队，采取群众点单评单，政协接单派单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2021年上半年受益群众1200余人，有的则是与政协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如某市政协把全市27名专业型党员委员、8名科技特派员党员委员和22名乡镇（街道）政协联络组组长组织起来，根据他们所在工作领域和专业特长，成立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回归经济、医疗下乡、法律服务等5支“党旗服务队”，既让党旗在基层高高飘扬，又为委员提供个性化履职平台，彰显功能型党支部的“个性”特色。

二是开展下基层的主题活动。某如市政协按照“双岗双责双作为”要求，组织委员深入开展以进社区实施人民调解、进村屯助力脱贫攻坚、进企业问诊法律体检、进学校开展法制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四进”主题活动，把委员所能和群众所需有机结合起来。

三是开展联系共建。如某市政协组织开展“双联共建”活动，即：党支部联系村（社区）党组织、党员委员联系群众，共建美丽乡村、和谐社区，以乡镇（街道）“政协委员联系点”为支撑，搭建“双联”桥梁，与村（社区）党组织建立紧密互动关系，构建资源共享、联动互促的“党建联合体”。某区政协积极组织以“辖区企业认亲、困难群众认亲、文明创建认领”为主要内容的“三认”专项行动，党组成员带、中共党员引、政协委员跟，牢记双责任、奉献双岗位，与辖区36家重点企业、169名城镇贫困群众结亲结对，着力筑同心、增信心、聚人心。相比前两种路径主要是面上展开，这种路径联系基层确定，服务更经常化，效果也更长效化。

四是联合媒体打造服务品牌。某市连续12年与市广播电视台建好《政协民心桥》，邀请政协委

员走进直播间与群众直接对话交流。

五是建立政协委员履职实践基地。如某县政协按照“有场地、有设备、有标识、有氛围、有制度、有活动、有成果”七有标准在省定贫困村高石坎村建立首个委员履职实践基地，组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与121户贫困户结对子，开展“户户见面”行动。打造了多种类型示范园助农民增收致富体。

可以看出，在这些服务中，一是注意发挥政协委员自身的专业、智力和联系优势，因此开展各项服务起来得心应手。二是注意深入到真正的基层，主要是城市的社区、农村的村组、企业、学校，直接服务一线群众。三是注意发挥政协党员委员和党组织的作用，不少结对共建是以政协党组织来承担，具体活动中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就与政协党建紧密结合起来。四是开始注重常态化、长效化，通过结对共建、建立政协委员履职实践基地等使服务基层群众长期稳定、持续有效地开展。尽管目前这些方式还只是在全国部分政协开始尝试，但已开始收到效果，不仅是帮助基层群众解决了一批实际问题，更重要是使基层干部群众对于政协有了全新的认识，政协不仅是坐而论道，还能干而有效，这对于扩大和提升政协在中国社会的认知度和影响力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第四种路径，设立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政协开放日活动。

过去政协在普通群众看来，有些神秘感，这是因为各级政协主要由各界代表性人士组成，在我国基层单位一般没有机构，尽管政协每年都围绕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开展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但大多是在一定层级范围内进行，社会上普通群众了解不多，这固然有宣传不够的原因，也与政协缺乏集中面得公众展示的活动有关。

十八大以来，一些地方政协开始探索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政协开放日活动，如2020年某省政协决定，统一将每年的9月21日确定为全省政协系统的委员活动日，并以“双走进——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为主题，成功举办首个“9.21委员活动日”，在党员委员的带领下，全省政协系统2.2万多名委员踊跃深入基层一线，开展2600多场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地方政协之选择9月21日，

是因为 1949 年 9 月 21 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日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通常被认为是人民政协的誕生日，很具有纪念意义。

设立开放日活动，其实并不是政协首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许多部门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设立了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开放日活动，最广为人知的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澳部队搞的开放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社会公众直观了解政协的组织性质、运行特点和工作效果，真正实现双走进，即让政协走进群众，群众走进政协，不失为新时代政协践行群众路线的一个标志性做法。目前开展这种活动的地方政协还不多，可以在深入总结一些地方政协的做法后，加以规范提升，在全国进行推广。

第五种路径，建立走访联系制度。

政协建立走访联系制度，是中央明确要求，《意见》就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走访看望委员制度以及接待和处理委员来信来访制度”，中央之所以这样要求，很大可能主要是针对绝大多数政协委员人事和工资关系都不在政协机关，这就给人政协委员是在兼职做政协工作的感觉，因此政协不同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政协委员的这种非专职性，政协委员只是在参加政协的各种会议和考察调研才与政协联系起来，这就带来政协对于政协委员了解并不全面，政协委员所在组织对于政协委员是如何履职的也不是很清楚，并进而影响政协委员所在组织的群众对于政协的认识，而这种不全面、不清楚肯定会对政协履职产生影响，因此政协需要建立对政协委员的走访联系制度，让政协、政协委员、政协委员所在组织联系密切起来。

从一些地方政协实际做法来看，最大特点就是分层联系，其基本做法是主席会议成员走访联系常委、常委走访联系委员、党员委员走访联系党外委员、委员走访联系界别群众，之所以采取这种分层联系办法，主要是将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起来，保证每个联系层级的联系都切实可行，做到联系全覆

盖。有的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各个层级的中共党员联系非中共党员，使之成为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委员团结非中共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一种重要的统战工作方式。除了这种逐级联系，有的地方政协实施了跨层联系，即政协主席、副主席一年要走访若干名政协委员，直接深入到委员所在组织，看望委员，了解委员在单位工作情况，介绍委员在政协履职情况。除了人对人联系外，还有的另外规定了组织对组织，如规定党组成员和专委会分工联系界别。除了上对下的联系，有的地方政协还采取了请进来的做法，把每月 10 日定为“政协委员来访接待日”。

从这次调研了解的情况看，通过建立及落实走访联系制度，能够有效克服政协委员与政协组织的松散性，有助于政协组织更加全面了解政协委员情况，更好地开展政协履职工作，加深了政协委员对政协的感情，有效地改进了基层单位对政协的认知，为政协践行群众路线搭建了一张网。

综上，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各地政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在政协工作中努力践行群众路线，实际已形成了多种路径，本篇介绍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五种，这五种中，第一种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第二种加强基层政协工作机构建设、第三种开展直接服务群众工作、第五种建立并落实走访联系政协委员制度都属于走下去，而第四种政协开放日活动属于请进来，第一、二、三、四种属于对外的，第五种属于对内，也就是上下内外全面发力，基本形成了政协践行群众路线的路径体系，其中最普遍也最有效是第一种“发挥政协在组织协商方面的独特优势，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其它几种都只是在全国部分甚至少量政协探索开展，而且多半是由第一种路径配套或延伸拓展而来。相信随着全国各地政协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理论上深化认识，一定能开创出政协作风建设的一个新局面，为创新和完善人民政协工作理论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支撑。

【责任编辑：余伟】

以程序民主推动实质民主

——《蕉岭议事规则》创制、价值与成效

莫岳云¹, 许国燕²

(1.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60640; 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30)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又有完整的参与实践, 体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蕉岭议事规则》作为程序民主的典型范例, 在依托蕉岭村务监事会、村民理事会和村级协商议事会的内生制度创新过程中应运而生, 形成了民主公正、开放包容和广泛协商的内容体系, 为民主在基层农村的落地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南, 实现了基层自治从组织建设到程序规则的跃升, 是推动基层民主向纵深发展、创新基层治理的优秀样本。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协商民主; 议事规程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69-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他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团结全国人民在民主政治道路上成功探索的经验总结, 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又有完整的参与实践, 是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与生动实践, 是其广泛多层次的重要一环。议事规程作为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制度程序, 是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实质, 提升基层协商民主实效的程序保障, 也是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 在回应基层民主需求、落实基层良好自治中发挥巨大效用。

近年来, 蕉岭坚持问题导向, 本着“先试先行”的原则, 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模式。围绕乡村治理体系由外部性制度安排向内生性需要推动转变的大变革, 将协商机制引入乡村治理, 将协商民主理念融入乡村议事, 开启从村务监事会到村级协商议事会的三轮“创制”改革, 形成了民主有序的

《蕉岭议事规则》, 探索出“规则型治理”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形式, 使民主能够真正有效地在基层治理的大地生根开花。基层民主自治活力充分释放, 乡村社会治理与民主发展协同推进优势充分展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彰显。

一、基层协商: 《蕉岭议事规则》的产生缘起

2007 年, 蕉岭县乘着乡村治理体系改革的东风, 开启了以内生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实践探索之路。《蕉岭议事规则》随着蕉岭乡村治理体系改革实践的深入应运而生。依托村务监事会、村民理事会以及村级协商议事会的相继创建, 从监督过程到议事过程再到决策过程的制度改革, 《蕉岭议事规则》由此诞生, 为民主在基层农村的落地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南, 实现了基层自治从组织建设到程序规则的跃升。

(一) 村务监事会拉开创制改革序幕

收稿日期: 2022-10-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党协商的中国经验研究”(18BDJ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莫岳云(1955-), 男, 广西南宁人,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党史党建研究; 许国燕(1996-), 女, 广西贵港人,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协商民主。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公共事务的民主监督,2007年,蕉岭县纪委出台了广东省首个村级“村务监事会”制度,这一制度首先以三圳镇的芳心村作为试点,其中以5名老党员、老干部组成了蕉岭县第一支监事会。随着芳心村监事会试点工作成效显著,村务监事会进入试点推进阶段,但是推广的过程并不顺利,遭到了部分村干部的抵触。直到2009年底,全县仅有20多个村成立了村务监事会。为了能够推动监事会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蕉岭县纪委一方面不断做各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根据试点推广的实践不断完善村务监督制度。2010年6月,广东省纪委常委姜斌到蕉岭考察时对蕉岭创建的村务监事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总结推广”。^[2]为了尽快推广这一有益经验,蕉岭县颁布相关文件,要求县域内97个行政村推广实施这一制度。由此,村务监事会制度进入全县铺开阶段,一直到7月底,除了3个“问题村”,其余94个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务监事会。随着2010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充分吸收了蕉岭村务监事会的探索实践,蕉岭县村务监事会制度上升为全国经验。

(二) 村民理事会深化创制改革进程

伴随着第一次创制的成功,蕉岭县围绕着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基层服务管理创新,拓宽群众参与渠道等要求,针对解决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模式中,公共服务半径过大、服务成效甚微以及群众意见难以表达等难题,鉴于传统宗族理事会管理的经验,创建了村民理事会,即村民参与村务服务管理的议事机构。

“为什么成立村民理事会呢?就是鉴于我们客家文化中的比较好的优良传统——宗族内部的管理有序。提升到我们政府层面来说,就是服务群众服务得比较到位,所以我们可以借用宗祠文化,成立一个村民理事会。”^①村民理事会的成员范围囊括党员干部、离退休职工、外出乡贤以及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成员,广泛吸收妇女、青年等代表,成员数量主要在5-11人间,以单数为宜,其中设理事会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1-2名。村民理事会的职责主要是围绕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项开展有组织的协商,达成决策共识。2013年,蕉岭成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单位”,由此开启了引领传统

治理资源的转型期,先后出台了《农村村民理事会设立指引》《村民理事会章程》,对村民理事会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成员的构成和推选程序,以及议事的基本规程等内容做了制度性的说明。自此,蕉岭县村民理事会制度化建设完成,并上升成为蕉岭县“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多层共治”的村级治理体系重要内容。

(三) 村级协商议事会优化创制改革设计

村务监事会的建立保障了村民参与民主监督的权利,使村务更加公开透明;村民理事会的成立,将村级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延伸到村民层级。“理事会成立之后,我们也是怕会出现理事会做出错误决策这样的情况,涉及到理事会以内的事情,他们按照规定开好会商量没关系,后来引申到全村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成立村级协商议事会制度。”^②因此,基于对村民理事会协商监督的要求,以及面对涉及到不同理事会之间利益协调的需要,2014年,蕉岭县以强化民主监督和拓宽协商范围为核心,开启了第三轮创制之路,村级协商议事会就此诞生。

2014年10月17日,三圳镇芳心村作为村级协商议事会的试点,围绕着村级垃圾卫生收费等问题召开了蕉岭县的首次村级协商议事会,这次会议在村民代表会议基础上,将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村民理事会理事长、“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党员代表以及离退休干部等乡贤纳入协商范围之中,由此开始了蕉岭村级协商议事会的探索历程。此后,村级协商议事会在蕉岭各村镇广泛推广,为了进一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当时的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卢尧生提出了“各镇村要不断探索完善协商议事制度,提高村民议事、决策、管理能力,使民智民意更好地贯穿决策始终,全力推进基层民主治理建设”^[3]的要求。村级议事协商会的实行,对协商议事规程的需要愈发强烈,这为《蕉岭议事规则》的诞生提供了现实条件。伴随着村级协商议事制度在蕉岭实践的深入,蕉岭县总结了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并逐渐认识议事程序的重要性,为《蕉岭议事规则》的创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程序民主:《蕉岭议事规则》的内容体系

程序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体现。《蕉岭议事规则》以“保障民主权利,提升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为目标,针对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公共事务和问题,坚持协商于民的原则,围绕着“民主公正、开放包容、广泛协商”的协商理念,创制了涵盖议事代表产生、议事会议召开、议题产生、会议流程、主持和发言、会议表决和监督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议事规程,为村民民主有序地进行协商议事提供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标准和准则。

(一) 定人员,明确协商议事主体

中立的主持人员。会议主持人由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投票选定,在没有相关票选机制时,通常由村第一书记或支部书记担任,若出现需要回避的情况,其他村干部可接替村书记担任会议主持人一职。

多元的协商代表。协商代表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依法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关心集体和公共事务,公平公正;身体健康,具有协商议事的能力和精力。协商代表的遴选范围包括村两委成员、村代表、监委会成员、共建企业、社区志愿组织、积极分子即所议议题利益相关者。协商代表的遴选在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经村两委及村民代表大会研究产生,代表依法产生自5日内,由村民委员会向村民公告,并登记造册。参与协商的成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的行为,可以由村两委终止其参与资格。

(二) 选议题,构成协商议事内容

广泛的协商议事范围。村级协商议事会协商内容类型包括:公共事务类:党的方针政策、重点工作、改革试点等具体措施;村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村级财务预算决算、资金安排使用;村(社区)重点工程建设的资金安排及承包方案和土地征收方案及管理运行等。基础设施类:道路、桥梁及村庄美化等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村庄基础农田水利建设和改造;村部大楼、活动场所、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重大灾情灾后重建。乡风文明类:文明积分制活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农村电影、农家书屋、体育活动、文体设施建设;协调邻里纠纷,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会等乡风文明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开展。条权益保护类:

养老事业发展、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事宜;低保、五保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和优抚安置的评议过程中要协商的事项;留守人员的关爱服务;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推进工作;农业保险的实施;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的收益保障及风险保障金工作;农村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土地占用工作等。

灵活的议题产生方式。协商议题产生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村党组织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之后提出相关议事内容;二是如果存在三分之一以上的协商代表提议相关内容,则该内容就可以纳入到协商议题遴选范围,每次协商会议议题的数量为3-4个,最终协商议题选定后进行公布公示并按照相关要求提前告知协商代表。

(三) 强规范,保障协商议事质量

客观中立的主持规则。协商议事会由主持人负责召集、主持,会议主持人在代表协商过程中必须保持中立客观的主持原则,主持发言内容不能表现明显的主观色彩和选择倾向,以免干扰协商代表作出选择。在协商过程中,会议主持人既不参与议题的讨论,也不参与相关表决,只承担主持会议和协调秩序的职责。

严谨有序的发言规则。首先,协商代表按照先后顺序进行依次发言。协商代表若需要发言,需要先举手示意,待会议主持人分配好发言权限和顺序之后,代表们有序进行发言。其次,关于发言的时长规则。协商代表在针对协商议题进行发言时,时间一般要求不超过5分钟,不能过多占用其他协商代表的发言时间。此外,发言过程要遵守相应的礼节规范,不能言语攻击辱骂其他代表,也不能打断其他代表发言,除此之外,协商代表在发言过程中不能与其他代表直接对话,需要面向会议主持人进行观点阐述。最后,协商代表针对协商过程存在的问题以及协商决策的形成保有批评、建议和质询的权利,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必须对协商代表提出的相关内容予以充分解释。

(四) 表决议,达成协商议事决策

协商决议以表决结果为基础。相关协商决议的最终形成需要基于协商代表们经过表决产生的结果,而表决的形式并不局限,可以根据具体议题多元化,通常情况下,表决方式采取票决制,根据议题的实际需要,无需票决的可采用手决制。其次,

参与表决的成员由列席代表组成,表决之后确定表决结果,表决结果以超过三分之二成员同意即可视会议议题为通过。最后,现场确定表决结果并形成相关决议,设置一定的公示期,待决议正式通过之后由村委会执行。

协商决议由民主监督来保障。首先是协商过程的监督。要求协商会议保证全程公开透明,协商过程向全体村民开放,村民可通过现场观摩或实况转播的形式参与其中。表决结果由村民委员会向村民公示,村民如有异议可向村两委提出质疑,协商结果实施过程及成效接受村民监督和评议。此外,会议记录作为民主监督的重要载体,《蕉岭议事规则》规定协商议事会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会议记录,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和规范。记录内容须包括: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主持人、记录人、参与会议人数、缺席人员、讨论协商的议题、参会人员的意见、表决情况以及决定等。会议记录、决定文本、签到名册和表决结果等资料应整理立卷存档,妥善保管,以便查阅。其次是决议执行的监督。村“两委”在执行决议过程中,要求将具体的执行进度和情况定期向村务监事会报告,并接受村务监事会的全程监督。村监事会要求积极征集社群众意见,进行集体例会审查,待决议执行完毕之后,监事会对相关结果进行测评,提出存在问题并督促整改。

三、实质民主:《蕉岭议事规则》的特征价值

(一) 保障民主权利是协商议事的核心要素

“保障民权,集中民智,为民办事”是《蕉岭议事规则》的闪光点,它以民主为核心,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交由人民协商,由人民决定,坚持民主决策。“做不做”、“做什么”、“怎么做”由村民说了算,充分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和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深刻回应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4]的民主要求。

首先,协商议题充分反映人民群众需求。议题产生规则要求议题在充分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议事内容,村民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向协

商议事会提议,从而保证协商的内容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而非领导意志。如芳心村第一次协商议事会讨论的“卫生垃圾收费标准”、“村庄环境整改”等议题均是开会前向村民征求。议题产生之后对信息及时准确地公开,避免“被动公开”和“信息失真”,有效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

其次,协商主体是人民群众自己。《蕉岭议事规则》规定了参与协商的代表包括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理事会会长、监事会以及其他乡贤侨胞、退休干部等多元人员。同时通过对蕉岭县部分镇村协商代表的产生机制调研发现,协商代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普遍基于自愿原则。“有事协商的时候,愿意出来协商的村民就可以参与协商议事会。”^③从而有力保障了人民参与协商的主体地位。如芳心村召开的第一次村民协商议事会,在出席协商议事会的67名代表中,村民代表就达51人,而村干部仅有7人,其他包括监委会成员、村民理事会理事长和退休干部以及交叉人员有9人。^④在这次会议中,村民代表占到了协商议事代表的77%。其次,通过对三圳镇招福村两次村民协商议事会议记录的抽样调查,其中出席会议的村民代表分别有25/30、18/28,^⑤占比均达60%以上。村民代表占议事代表的绝大多数使协商的主体不再只是“听话的人”,而是与利益诉求相关的人民群众。

最后,民主决策的形成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5]。芳心村第一次村级协商议事会议就“垃圾费用征收”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当时我们村干部的想法是一年一户100块,但是经过大家协商议事之后,大家都拿不准,有些人认为应该一个月5块、有些人认为一年50块,也有人认为太少了,一年应该100块。后来大家经过票决,将你认为应该收的钱数写在票上,公开唱票之后,60%的代表认为一个月收5块,后来我们尊重参会人的意见,按照议事的结果定下来了,每个农户每个月收5块,不足部分由村里面进行补贴。”^①即使当时大家协商表决出来的结果与村委的方案有出入,但是芳心村村委仍然尊重并执行协商结果,没有进行重新表决或其他方式篡改民意,真正将民意反映到决策中。正如谢建祥书记所说的:“这个

60元的标准是大家协商最后形成的结果,即使我们资金补贴不足,也必须要遵守的。”^①

(二) 保证公正平等是协商议事的基本前提

《蕉岭议事规则》以公正为基础,保障不同利益诉求和偏好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协商过程中来,即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和在平等的条件下行使这些权利。蕉岭县召开的村级协商议事会积极鼓励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以及异地务工人员等积极参与与议事会议,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素养的主体提供了平等参与协商机会。发言规则保障了各方意见的公平表达。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代表在同一议题的讨论中有平等的发言次数与发言时长,也都必须遵守相应的礼节规范,哪怕你是“多数的一方”,也要让“少数的一方”能够有自由完整地表达自身意愿的机会。会议主持人中立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结果公正。会议主持人作为会议的重要角色,拥有一定的权利,其任何一个价值偏向都可能会对协商结果的公正产生影响。主持人中立规则规定其只行使主持会议和维护会议秩序的权利,无权针对议题发表个人意见、参与辩论与表决,很好地对主持人的权利进行约束,以防止会议主持人通过个人的意志影响会议判断,从而保证协商结果的民主公正。

此外,蕉岭县村级协商议事会议室布局也充分体现了公平协商的理念。在召开村民协商议事会的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室均采用圆桌式的布置,这种圆桌式相比较于舞台式、课桌式或者指挥式的协商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平等原则和协商精神,参与协商的代表不分尊卑地在一张桌子上讨论,更有利于营造平等和谐协商的氛围。

(三) 注重民主监督是协商议事的重要保障

在基层协商民主议事规程的实践运用中,包括发展较为成熟的《南塘议事规则十五条》和社区治理典范的《文华十条》等,在文本内容上都缺少了对监督惩戒机制的设置。它们虽然在礼节规范上有诸多的约束性规则,但是对违反规则后的行为惩戒却没有给出相应的说明。受广泛推广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以单独一章的内容来阐述监督惩戒的内容,可见,在议事规程中创制监督惩戒机制以保障协商的顺利进行的重要性。《蕉岭议事规则》虽然没有在文本内容上设置对违规违法行为的相关惩戒规

则,但是却有着对强化民主监督的重视。

首先村务监事会的设立,完善了民主监督的组织架构。村务监事会作为全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地方经验,蕉岭县在强化村民监督这一方面的先行先试毋庸置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曾称蕉岭县监事会的最早试点村芳心村为:“中国村务监督第一村”。虽然蕉岭没有将监事会纳入协商过程中,对协商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在协商结果执行情况的监督方面,监事会发挥了巨大作用。据芳心村第一批成立的监事会成员徐远振介绍:“我们每个月都会到村里面收集村民对两委干部的意见,到年末的时候我们会开展村委干部的测评大会,让村民去投票。”^②也有村民反映:“有了这个监事会,如果干部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去反映,他们会向上级纪委去反映的。”^③

其次文本规则的设置,健全了民主监督的内容体系。“协商会议保证全程公开透明,协商过程向全体村民开放,村民可通过现场观摩或实况转播的形式参与其中。表决结果由村民委员会向村民公示,村民如有异议可向村两委提出质疑,协商结果实施过程及成效接受村民监督和评议。”相比较于众多议事规程在监督内容方面的空白,《蕉岭议事规则》对民主监督的重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四、协商共治:《蕉岭议事规则》的显著成效

蕉岭经过前后相继的创制探索,所建立起的《蕉岭议事规则》为基层协商议事会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化的流程和程序性的规则,让民主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让治理具有程序化规则化的手段。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毛寿龙教授称其创新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样本,同时也是县治良好的基础。”^④

(一) 充分激发了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

“把权利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重要内容。”^⑤保障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权利,保障他们在民主管理和基层自治中的主人翁地位,促进村民广泛有效参与民主实践,参与到关乎利益问题的协商决策当中,充分保障村民决策权,

从而推动乡村基层民主建设是《蕉岭议事规则》的核心内容。

《蕉岭议事规则》规定了凡是涉及村里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村民协商决定,要求涉及相关利益的成员都可参加村级协商议事会。在发言中规定了议事代表针对协商议题依次轮流发言,每个议事代表的发言和表决的权利都是公正平等的。《蕉岭议事规则》以程序性的规范与制度保障了村民真实有效地参与基层民主与自治的实践中,保证人民的事由人民协商决定,使村民的民主权利真正落到实处,一改传统社会政府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的局面。对于村委会而言,由公共事务的“独断者”和“包揽者”转变为发挥制度设计、平台搭建和共同协商的角色。对于人民群众而言,也由“旁观者”、“附和者”转变为决策的“主人翁”与“敲定者”。在对公共事务的建言献策与表决达成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与责任感被激发,芳心村村民理事会的徐远振理事长感慨:“村民协商议事给了村民参与决策的机会,他们的激情得到很大激发。”^⑧

议事规程建立以来,芳心村各小组协商会议中,由村民提出的议题共计150多个,所有的决议都是通过村民协商表决形成,构建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8],形成了良好的自治氛围。芳心村谢建祥书记表示:“以前村里面很多事情都是村干部去做,不仅任务负担重不说,很多时候村民还不理解你。现在让他们去讨论去决策,他们的热情也提高了,很多事情也不用村干部来插手,他们自己可以做好。”^⑨

(二)有效培育了协商主体的规则意识

《蕉岭议事规则》作为程序性的民主与法则,是协商民主规范性的要求,它使协商的过程必须符合规则程序,使协商代表必须遵循协商规则,它将无序的秩序与感性的人置于有序和理性的枷锁中,从而使代表在反复参与协商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催生和培育规则意识,主动地按照规则进行对话交流。基于元规则的协商议事会就成为了理性对话的平台,协商代表就协商议题表达自己的意志,在与其他代表在对话交流的过程中秉持理性原则,通过辩论不断“妥协”,最终达成偏好转化和决策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蕉岭议事规则》之所以有助

于培养协商主体的规则意识,一方面是得益于长期以来蕉岭客家文化中的宗族管理传统。早在宋元时期,华南农村就逐渐形成宗族组织,一直到现代,逐渐转型成为宗族理事会,“当时我们有一个说法是,看农村漂亮不漂亮,首先看我们的宗祠好不好。”^⑩可见,宗族对于蕉岭、对于村民俨然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伴随着宗族理事会逐渐延伸发展成为村民理事会,基于长期以来对传统宗族议事规程的遵循,在现代协商议事会中也会不自觉的遵守议事规程。另一方面还得益于其严格的监督机制。村务监事会的建立,强化了对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监督,在严格监督审查机制下,为村民协商议事营造严肃审慎的风气,也为协商主体规则意识的激发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极大提升了决策的效率与水平

《蕉岭议事规则》将民主目标与价值用程序化的手段确定下来,这个手段为基层协商就议题形成、协商、辩论、表决到最后形成决策这一系列过程提供了一套层层递进、相互衔接的协商法则,这个程序化的法则大大提高了基层协商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也提升了协商的效率水平。

首先,它以关键程序为抓手,以通过具体的规则对协商的程序进行规定,为协商议事会议提供了有据可寻、有律可探的操作指南,以此达到规范公共事务民主决策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最佳效果。如议事代表发言前先举手,发言时长不能超过5分钟,且次数须控制在3次以内,发言次数用尽之后没有人再发言了,主持人提请表决等,改变了村庄以往重形式、轻操作、纷繁杂乱的议事局面。其次,它以程序衔接为重点,从协商议题的产生到协商主体的确定,再到协商过程礼节规范的规定,以及表决形成,到最后决议的产生和执行,构建出了一套合理有序、紧密相连、无缝衔接的议事流程,极大地提升了协商效率水平。协商效率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决策的形成落地,在这样的议事规程下,蕉岭县把一件件难事办妥,急事办稳,好事办实,改变了以往“议而不决”、“议而无果”的局面,正如三圳镇芳心村干部所言:“以前村里面的干部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有存在意见分歧,议而不绝的情况,后来有了这个村级协商议事会和议事规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简单轻松很多了,效率也

明显高了很多。”^⑩

(四) 创新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它能够最大限度和最广泛地保障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提供管理决策平台。同时,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平台进行理性表达,形成公共事务的决策共识,在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而实现有效治理。

而科学合理的议事规程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化运行的重要保障,为基层自治提供了一套指导协商主体理性表达诉求、化解矛盾纠纷的制度逻辑。人民群众是基层自治的主体性力量,在以往缺少民主公正议事规程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很难保证人民群众治理主体力量的发挥,一方面人民群众很难真实有效地参与到基层治理的环节中,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意志心声难以得到汇聚并上升为决策,从而使基层治理的“由民做主”变成了“为民做主”。

《蕉岭议事规则》的创制和产生创新了基层治理的方式和手段,规则牵引式的民主成为了基层治理模式的重大突破。它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参与民主政治和基层治理的权利与地位,协商会议的召开从“一言堂”变成了“百家论”,从“领导班子座谈会”变成人民民主协商会,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基层治理主体效能。除此之外,它推动了基层治理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和稳定化。它使基层协商变得有据可循,有律可探,人民群众在理性规则的框架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决策,协商不再是“乱哄哄”的争论会,而是井然有序的讨论会,解决了基层治理“决议难”的重要问题,实现了治理主体的扩充、治理内容的拓展以及治理手段的升级,实现了基层自治从组织建设到程序规则的跃升,这种规则牵引协商的方式填补了基层治理空白,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毛寿龙教授认为“蕉岭的村级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样本。如果蕉岭能把这个创新经验坚持下去,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⑨

规则是民主实践与治理方式的生动体现,同时

也是进一步深化民主、优化治理的重要载体。《蕉岭议事规则》的诞生,实现了“协商一小步,民主一大步”的伟大跨越,规则牵引治理实现了基层治理从组织建设到制度规则的跃升,开启了基层治理模式的新篇章,迈出了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大步。站在新的百年历史征程上,深刻总结《蕉岭议事规则》运行的经验成效,是探求“程序民主推动实质民主”,以程序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⑩的有益尝试。

注释:

- ① 基于2022年3月17日对三圳镇芳心村前村支书的访谈。
- ② 基于2022年3月17日对三圳镇芳心村前某理事会理事长的访谈。
- ③ 基于2022年3月16日对蕉城镇龙安村村支书的访谈。
- ④ 基于三圳镇芳心村第一次村民协商议事会会议议程。
- ⑤ 基于三圳镇招福村两次村民协商议事会会议记录。
- ⑥ 基于2022年3月17日对三圳镇芳心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访谈。
- ⑦ 基于2022年3月17日对三圳镇芳心村村村民的访谈。
- ⑧ 基于2022年3月17日对三圳镇芳心村村民理事会理事长的访谈。
- ⑨ 基于2022年3月17日对三圳镇芳心村谢建祥书记的访谈。
- ⑩ 基于2022年3月17日对三圳镇芳心村村干部的访谈。

参考文献:

- [1][4][8][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8.55.10.
- [2][3][6][9] 徐勇,邓大才.蕉岭创制“四权同步”的基层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7.30.271.
-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8-69.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责任编辑:陈童敏】

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张师平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8)

摘要: 民主党派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天然的联系, 其生存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紧密相关。从历史维度看, 民主党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的组织基础; 从理论维度看, 民主党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的关键要素; 从实践维度看, 民主党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选准着力点, 做到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高度重视政党协商能力建设, 切实增强利益代表和表达功能, 着力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建设, 以期更好促进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更大作用。探究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提升路径, 不仅助益民主党派准确把握自身定位、更好发挥职能作用, 也助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党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作用;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76-06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高频词汇, 报告在阐述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都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重要成就纳入其中, 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 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九项本质要求之一, 尤其报告第六部分专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 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有着特殊地位、发挥着独特作用, 它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天然的联系, 其生存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密切相关。但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中, 民主党派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起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以及如何促进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更大作用? 凡此种种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正因此, 深入研究探讨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及提升路径问题, 不仅助益民主党派准确把握

自身定位、更好发挥参政党职能作用, 也必将助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 并在总结民主政治实践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2019 年 11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 首次提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 正式将“全

收稿日期: 2022-11-13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山西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成果 (sxszybkt2022096)

作者简介: 张师平, 男, 江西临川人,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

过程民主”与“人民”二字连接在一起。尔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成就郑重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中。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全过程、全时段参与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具体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具有全阶段、全时态、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和优势。正因如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概括和提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也由此开辟出了一条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民主道路。

（一）坚定党的全面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之义

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中国式民主的历史进程。正因为如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中国式民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毅前行。在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重要经验，即是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因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绝无可能的。党的坚强领导有力地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举措得以贯彻执行，为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也正因此，必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服务民主决策施策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5]，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协商民主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价值。可以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服务于党委政府的民主决策与施策，其实践指向很大程度也体现在这个方面。科学民主决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治国理政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上，能否做到民主施策，

是将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决策前在建言献策方面，决策中在参与制定和民主投票表决方面，以及决策后在参与执行和开展民主监督方面都应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推进。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有效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项决策都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注重充分发扬民主，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反复讨论后方形成决策，以此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能最大限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旨归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制度安排，重在实践中真正坚守民心、坚持人民至上这个最大的政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实现人民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身使命。革命年代，打倒列强、除军阀，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为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奠定坚实基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我们党不断践行民主实践、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设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从全过程人民民主追求的价值旨归来，其本质特征也主要体现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上，并且要将这一理念具体地落实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环节与各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致力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利益诉求，有更畅通的渠道保障最广大人民充分表达意愿，有更完备的机制确保最广大人民合理诉求得到实现。

二、民主党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6]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民主党派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问题指明了三个基本维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基于此，在探讨民主党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等问题时,可以尝试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三个维度去展开。

(一)从历史维度看,民主党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的组织基础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具体样态,是在我国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中逐步孕育而出的一种内生型民主政治形态,它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相生相伴。正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全过程民主的进程中就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政党政治话语体系——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平衡”^[7]。应该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革命时期,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各民主党派,志在追求民主,在认清现时形势和历史大势后,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同心同行,共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政治形态,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奋斗。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8]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增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大关系”和谐发展,广大民主党派成员为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代表性不断增强,紧密围绕国家中心任务,全链条全过程参与政策决策与施策的各个环节,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全方位参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政策过程。

(二)从理论维度看,民主党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的关键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9]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融合进根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能够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从理论层面剖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常运行,需要很多制度要素的支撑,民主党派是其中的关键要素之一。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应在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体现,民主党派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有诸多贡献之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贡献者。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参与主体“全”,希冀各党派、各阶层等的代表尽可能参与到民主实践之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从基本政治制度层面保障了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管理、建设和发展中享有的权利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地位,更是赋予了各民主党派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每个民主党派都各自联系着一部分特定的社会成员,都代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有各自的政治影响范围,能够助力最大限度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代表一定阶层和界别的各民主党派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中国共产党则根据扎根于基层和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意见,来领导与协调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从而将社会各方意见包容统一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也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坚持“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有着共同的政治价值追求,视人民民主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更不是利益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关系,而是亲密友好的挚友关系。

(三)从实践维度看,民主党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政治生活实践中,民主党派有力地推动

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进程。中国民主政治实践已然证明，民主党派通过推动政策过程和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坚定维护和捍卫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民主党派助益政策过程民主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10]，这无不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很大程度体现在政策过程的人民性上。在新型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架构下，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政治上密切合作的关系，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全链条参与我国政策过程各个环节，在利益输入、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及政策监督等各环节发挥作用，不断丰富和拓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另外，借助人民政协这一主要制度平台，民主党派可以很顺畅地以党派名义开展协商讨论、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等履职活动。这一方面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避免了西方竞争型政党之间相互缠斗、恶性竞争等弊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畅通人民的利益诉求，从而保障党和政府决策与施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其次，民主党派助力国家治理民主化。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全“过程”民主的“过程”是一个寻求合作治理的过程，旨在达成利益最大化，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强调共治共建共享，追求的是共识，形成的是最大公约数，画出的是最大同心圆。各民主党派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通过各自对应的界别，广泛倾听民声、吸纳民意，并将这些声音意见归纳整合后有序表达出来，在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全过程、全方位地贡献智慧和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民主化进程，这与西方式民主中各政治力量之间的零和博弈形成鲜明比照。

三、民主党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实现路径

现实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多方协同共进。在这方面，对于作为重要力量的民主党派而言，应该着重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升党际协商民主水平、增强利益代表和表达功能、完善内部监

督等方面发力，以期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毫无疑问，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逐步确立起的民主形态，换言之，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依此逻辑，各民主党派要想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做出更多作为、有更大的贡献，前提和基础当然也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一致的选择，各民主党派必须始终如一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在广泛深入的协商议政中，自觉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内化为各民主党派的行动共识，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应秉承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切实肩负起领导之责，大力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持续助力民主党派提升协商能力和水平，以期高质量发展党际协商。

（二）高度重视政党协商能力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1]。民主党派要想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更大作用，离不开党际协商民主的有序发展，而这有赖于民主党派切实提升自身的协商能力和水平。首先，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成员要切实增强协商意识，积极谋划和思考政治协商工作，这是做好协商议政工作的前提。同时，中共各级党委也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工作。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12]其次，民主党派要加强协商能力建设，注重提升协商质量，真正做到有事会商量。民主党派的建言献策，是中共党委和政府倾听民意、广集民智，开展民主协商，进行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民主党派要围绕中共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形成调研报告、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向中共党委、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通过中共党委开展的政党协商,围绕中共党委有关重要文件、宪法法律、重要的地方性法规、有关重要领导建议人选以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重大问题等进行议政建言。最后,民主党派要积极促成真协商。民主党派如果能使协商的结果符合所代表群众的利益,便可在群众中取得良好的反响,并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协商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协商主体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强,协商制度也会越来越深入人心,群众对于协商行为也会越来越支持。

(三) 切实增强利益代表和表达功能

当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应特别重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渠道。基于此,各民主党派就应切实增强自身利益代表和表达功能,以期更好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作用。首先,扩大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范围,进一步增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包容性。比如,时代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众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据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在以年均5%的增长率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数量已达9100多万人。为此,各民主党派要想增强其利益代表功能,就必须注重吸纳符合条件的新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人士,加强联系与沟通,倾听这些人士的心声,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其次,建立健全民主党派与其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的顺畅联系机制。民主党派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应与本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保持密切的沟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所思所想,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愿望、呼声和利益诉求,并通过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制度安排,畅通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广集民智、广求良策,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前发展。最后,建立健全利益聚合和表达机制。一方面,民主党派要对各自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利益诉求进行认真分析、综合和提炼,确保本党派内部广大群众的意愿得以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民主党派要通过全社会的大调研,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并向中共党委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思路办法,帮助中共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举措,从而与

中国共产党一道,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成果,扎实推进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行稳致远。

(四) 着力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建设

不言而喻,民主党派要想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展现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这就要求民主党派必须具备健康的组织肌体,要强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以此彻底解决“民主党派不民主”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民主党派应着力发展内部民主,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因为民主与监督相辅相成,民主的完善离不开监督机制建设的有力推进。首先,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民主党派应切实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要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制度、重大事项征求意见制度、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等,着力营造有利于实施监督的浓厚氛围”^[13]。其次,注重加强与国家监察法的衔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已经生效实施,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所有公权力的行使者纳入国家监察范围,这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民主党派在推进内部监督机制建设方面就应主动做好与国家监察法的衔接工作,制定完善实施细则,确保内部监督见实效。最后,学习借鉴中共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奥秘就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在这方面,各民主党派应当以党为师为鉴,学习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内监督方面的有益经验,也应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进自身内部监督,在净化政治生态、完善内部民主等方面更有作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的现实样态,内蕴“合作”“协商”特质,这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维度考察,民主党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的组织基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的关键要素、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履行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三大职能生动诠释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

念和行动追求。质言之，民主党派要真诚协助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政党协商能力和水平、增强利益代表和表达功能、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建设，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稳妥、有序有效地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 [1][1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7，38.
- [2]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03.
-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
- [4]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88.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2.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5.
- [7] 阙天舒，方彪.国家治理场域中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基于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21（04）：80-87.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5.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59.
- [10]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N].人民日报，2021-10-15（01）.
- [12]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7-01-23（01）.
- [13] 张师平，宫捷.国家监察法实施背景下民主党派内部监督问题研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1）：133-140.

【责任编辑：温开照】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杨竞业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 要: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南方革命文化、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和港澳侨文化复合生成的地方文化形态。浸润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斗争意识强、革命成果丰、历史价值高是其丰富内涵。文化信仰的坚定性、文化行动的奉献精神、文化本质的人民性、文化构成的复合性是其鲜明特征。这种文化贯穿了敢于斗争和善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 彰显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继承了理论先行和干部先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诠释了解放人和发展人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 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82-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弘扬红色革命文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广东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长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 东江地区融合会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南方革命文化、岭南传统文化和港澳侨文化,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复合的地方文化形态。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当下, 深入审视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丰富内涵、鲜明特征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正确理解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复合

的地方文化形态。从多学科视野审视这个文化形态, 能够更全面、深入把握其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 呈现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依据。

(一)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地方文化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方革命这个伟大实践所造就的文化。实践生成性是这个文化成型的基本机理。从实践哲学视野审视, 可以发现东江红色革命文化会通、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南方革命文化、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港澳侨文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指导中国革命, 这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 “统一战线问题,

收稿日期: 2022-12-28

基金项目: 广东东江干部学院年度项目“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2022DJGBXY017)成果

作者简介: 杨竞业(1970-), 男, 汉族, 广东揭阳人,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哲学、中国统战理论研究。

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的忠诚继承者,也是善于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者。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应当指出,中国南方革命是在党中央和南方局领导下开展的革命,活跃在华南地区的包括东江纵队在内的多支革命队伍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组建发展起来的,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主动开展对敌斗争和建设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南方革命文化是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形成的实践基础。南方革命具有革命力量薄弱、战力资源匮乏和队伍生存艰难等特点。在粤湘赣三省,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资源贫乏,伪军、国民党军、侵华日军、地主、恶霸、流氓、土匪交相作恶、祸害人民,华南地区革命队伍远离党中央、主力部队,缺乏资金和枪炮支持,又受到敌、伪、顽和地方割据势力的侵扰、围堵,筹集粮款、开展斗争尤其艰难。另一方面,华南地区也存在有利斗争的条件。从大革命以来,粤湘赣三省人民经受了斗争锻炼,革命基础较好。毛泽东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农运干部,刘少奇在江西组织和发动了工人多次罢工斗争,这些工作为推动南方农民和工人相结合的革命斗争创造了历史条件。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东江建设革命军队,开展对敌斗争,营救文化名人,积累了丰富经验,提升了革命行动的坚定性、自觉性。应当说,南方革命行动及其经验积累为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是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形成的文化基础。“传统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3]近代以降,岭南地区承继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献章等人的“兼收、包容和开放”思想,承接了

明清以来“经世致用”的观念。岭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与交往中,这些思想观念逐步融入其行为日用,成为其思维方式。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东江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是东江革命队伍开展游击战及其他斗争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本地成长或来自外省的干部与战士,或来自香港、澳门地区的爱国青年,或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青年,无不受岭南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岭南传统文化精神深渗东江革命队伍,成为长期范导和深层影响东江革命行动的文化元素。

港澳侨文化是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形成的精神基础。东江地区毗邻港澳地区,与东南亚各国也存在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近代百年历程中,中国居民以契约劳工、探亲、婚嫁、营商、求学等方式,先后在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大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70-80年代集中出境或出国,成为港澳地区居民或东南亚、美洲、欧洲、澳洲等地的华侨,东江大部分地区因而成为侨乡。从孙中山组织发动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以司徒美堂、陈嘉庚、黄仲涵、庄西言等为代表的侨领捐资捐物,引导华侨青年归国参加革命,服务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华侨青年爱国救国热情高涨。“到1940年底,参加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就有近千人。”^[4]应当说,粤籍、闽籍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作出正义行动的深层力量正是来自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港澳侨文化,而这种文化对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发挥了促导作用。

(二)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意蕴丰富的红色文化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革命斗争实践形成的地方文化形态。其始源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指导推动的中国革命实践。从历史哲学审视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可以发现其植根于毛泽东思想的丰富意蕴。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浸润时间长的文化。文化是主体际交往实践的产物,又是长时间积累经验而逐步生成的产物。东江地区的红色革命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发育,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创办刊物、“研究社”^[5]。刘尔崧、彭湃、李春涛、郑重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学说,

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为创建地方党组织奠定了基础。东江红色革命发挥了党领导革命、发动群众、凝聚民心、占领阵地、建设经济、抢救文化、联络海外等作用,推动了东江红色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推进了东江红色革命与广东革命战争的相互配合,实现了地方武装力量和全国武装力量的整体联合。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影响范围广的文化。文化是特定空间中的精神存在。东江红色革命是一个历经 20 余年的非凡历程,东江革命队伍活动范围遍及惠州、东莞、深圳、兴宁、梅州、汕尾、韶关、广州等地。整编后的队伍还北上山东,参加解放战争。就东江纵队发挥的现实作用而言,诚如朱德指出:“八年来,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6]。就东江革命的世界影响而言,由于东江红色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由于在东江纵队中有较多港澳同胞、爱国华侨、知识分子、女战士参与,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高,受地方群众认同程度高,因而其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影响。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斗争意识强的文化。党领导中国革命 28 年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伴随着这个历史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7]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东江地区革命力量在对敌斗争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东江革命力量开展对敌战斗 1400 余次,付出了很大牺牲,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8]正是在长期频繁的对敌斗争中,东江地区积蓄了自己的革命力量,锻炼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掌握了对敌斗争的正确策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革命成果丰硕的文化。东江革命取得了系列丰硕文化成果,使“可见的成果”“潜形的成果”“物化的成果”和“内化的成果”以不同方式积淀、传承下来。比如:巩固了革命根

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开辟了解放区,这是由奋斗牺牲取得的“可见成果”。加强了地下交通站建设,办好了纵队机关报《前进报》,提高了党指挥军队、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凝聚民心的能力,这是由深层发力形成的“潜形成果”。锻炼了党的基层组织,培养了地方军事干部,建立了一支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的革命队伍,这是由先进思想铸造的“物化成果”。懂得向农民公平筹粮,抓好了“米袋子”;懂得发行地方“建设券”,创建税务站,抓好了“红色金融”;懂得“保护中华文脉”,构建统一战线;懂得抓“枪杆子”,运用武力抗击日寇侵略,打击伪顽反动势力,保护人民根本福祉,等等。这些都是由革命实践铸炼形成的文化成果。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历史价值高的文化。在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斗争中铸炼了东江革命精神,在复合文化、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东江红色文化,在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建设中赓续了红色革命基因,在与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的共同战斗、同心奋斗中巩固了爱国统一战线。这种既有东江革命精神的缔造,又有东江红色文化的生成,既有红色革命基因的赓续,又有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这样一种红色革命文化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革命文化,是历久弥新、鉴故知今、昭示真理的红色文化,因而是具有颇高历史价值的红色革命文化。

(三)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特征鲜明的革命文化

从文化哲学视野审视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文化信仰的坚定性、文化行动的奉献性、文化本质的人民性、文化构成的复合性是其鲜明特征。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强信仰的革命文化。革命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物质斗争和精神斗争过程。为应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完成好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革命队伍做到政治上坚定、清醒,作风上清廉、优良,文化上先进、优秀,就成为一个必然的严格要求。列宁指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9]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可以赋予东江红色革命文化以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们对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走向胜利形成坚定信念,对由毛泽东思想指导、地方党委领导

的东江革命必然走向胜利也形成坚定信念。这就说明，多元文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积极作用是一个不争现实，而东江革命队伍坚定对先进思想文化的信仰，为把革命引向胜利奠定了精神基础。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重奉献的革命文化。敢于牺牲、勇于奉献是造就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精神条件。鸦片战争以降，东江地区生产力落后，物产并不丰富；受封建地主、买办、资本主义多重剥削，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日子不好过，能够提供给游击队和纵队的生活物资十分稀缺。要使革命进行下去，取得最后胜利，就得依靠统一战线，争取不同阶层人士的支持。中共南方局组织东江纵队抢救在港遇险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前后历时近两年，奔忙在东西两条营救路线上的干部、群众、港澳同胞做出了巨大奉献，战斗在各地的交通站、接待站、中转站的干部也付出巨大心血，才换来了文化与民主人士的安全撤离，赢得了中国作家茅盾的高度评价：“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10]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为人民的革命文化。东江革命实践的起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接下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得以在全党武装，正是这些先进的革命理论引起了中国新式革命和地方武装斗争。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决定性的文化本质是解放人民、发展人民和服务人民。诚如美国哲学家塔克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在解放区根据地不仅探索构筑军事堡垒，而且也探索构筑一种新社会的飞地和政策。”^[11]比如：建立民主政府，创办报纸、学校、群众组织和其他社会机构，把闹革命、谋解放和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统一起来。在实现人民解放的历程中，其所使用的武器、工具，其所运用的策略、方法，其所开辟的道路、阵地，其所形成的经验、理论，等等，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铸精华的革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那里，它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鲜活的方法论，是需要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加以具体运用

的行动指南，它提供给东江革命的滋益是基本原理和历史思想。在南方革命文化那里，它不是共产国际指示、上级命令和战斗经验的集成，而是经验和教训的多重提炼，它提供给东江革命的滋益是经验反思和策略指导。在岭南优秀传统文化那里，它不是死的“故纸堆”，而是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迁的明证，它提供给东江革命的滋益是坚守传统中的革新意识，为合理性的思维清除障碍。在港澳侨文化那里，它不是外来的“舶来品”，而是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的重要来源，它提供给东江革命的滋益是开放视野和比较信息。可见，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构成是复杂多元的，而为其所是的文化生成机制，在于东江革命干部和群众汲取多元文化精华，做到活学活用，会通熔铸，择优鼎新。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化、南方革命文化、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港澳侨文化分别对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发挥了指导作用、主导作用、范导作用和促导作用，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地方文化，是意蕴丰富的红色文化，是特色鲜明的革命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全面把握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主要包括实践维度、理论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东江红色革命文化贯穿了敢于斗争和善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彰显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继承了理论先行和干部先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诠释了解放人和发展人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从文化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弘扬了敢于斗争和善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主题之一。建立革命的人民武装，取得革命领导权，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去争取不同战线的胜利，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意志和必然追求，它体现了敢于斗争的思想意识

和善于胜利的策略方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核心要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上的马克思主义。”^[12]换言之,能够完全、彻底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中国共产党领导东江人民迅速组织抗日武装,英勇抗击敌寇。东江纵队“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3]。1940年,党中央和南方局在香港建立文化委员会,为后来成功营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国际友人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营救队伍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守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信念,营救行动取得了彻底成功。因此,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敢于斗争和善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一面旗帜。

(二)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彰显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宽度和厚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矛盾论》和《实践论》集中表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及怎样使之走向胜利的重大问题。如果说《矛盾论》正确地解释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核心命题,那么《实践论》就理论地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路径,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改变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光明道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东江革命用战斗、牺牲和奉献解释了新中国来之不易,用挫折与代价换来了成功与胜利,进而改变了广东地方社会面貌,形成了责任担当、甘于奉献,善于战斗、不怕牺牲,以人为本、同心戮力,慎终追远、保卫文脉的精神。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4]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东江人民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文化表达。当人们重温那一段光荣历史的时候,必将穿透时间屏蔽阻障,澄明红色革命思想光辉;而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必然明晰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的独特意义,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既能解释旧世界、又能开创新世界的强大力量。

(三)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继承了理论先行和干部先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掌握群众。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5]这就说明,先进理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引导作用。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他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建设,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等,都是着眼于理论先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体现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以此认识来看,领导东江革命的主要干部都是接受了党的政治培养与理论指导的高级干部。这些干部坚持理论和革命实际相结合,践行知行合一的精神,建立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开班办学办报、培养专业干部,领导经济建设、做出显著业绩。另一方面,这些干部注重恢复、发展文化事业,创办了《人民报》《粤赣报》《大众报》《红星报》,成立了文工团、文工队、政工队、宣传队等文艺团体,创作、改编、演出了许多革命的话剧、歌剧、舞蹈、歌曲、曲艺等。这些党报的创办,推动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文艺团体的创作和演出,把敢于深入斗争、打败凶恶敌人、保护革命政权、拯救广大民众等思想融汇于文化艺术形式之中,鼓舞了军民斗志,提高了斗争意识,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体现了文化的历史正当性。因此,东江革命实现了“理论先行”和“干部先干”的辩证统一,体现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正当性的内在统一,其所造就的革命文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思想精髓。

(四) 东江红色革命文化诠释了解放人和发展人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是解放人和发展人的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或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6]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状况中,解放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为紧迫的使命与任务。而解放人民最为有效的路径,

就是发动农民、工人、城市中小工商业阶层联合起来革命，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政权，建立服务人民发展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17]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和革命民主派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优势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组成南路军扫清了东江残敌，解放了惠州全境。以此观之，东江革命解放了东江人民，中国革命解放了中国人民，其所生成的红色文化为发展人民、幸福人民创造了历史前提。东江红色革命文化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既解放人又发展人的价值观。

总之，东江红色革命文化是具有广东特色的内涵丰富的革命文化形态，它具有浸润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斗争意识强、革命成果丰、历史价值高等内涵，也具有坚定执着的文化信仰、牺牲奉献的文化行动、人民至上的文化本质、多元复合的文化构成等鲜明特征。这种文化贯穿了敢于斗争和善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彰显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继承了理论先行和干部先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诠释了解放人和发展人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人要珍视这些历史贡献，赓续红色基因，永葆革命精神，推动文化工程建设出精彩，文化人才培养出精英，文化宣传成果出精品，

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团结奋进、接续奋斗。

参考文献：

- [1] [2] [7]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5-606、707、694、634.
- [3] [美] 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91.
- [4] [5]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88、16-18.
- [6] 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6.
- [9]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 [10] 茅盾.脱险杂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96.
- [11] [美] 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M].高岸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9.
-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8.
- [13] 廖承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89.
- [1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9.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
-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5.

【责任编辑：余伟】

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崔晓敏, 施言志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注重“和”思想,“和”的内涵丰富,包括“和平”、“和睦”、“和谐”等内容,涵盖家庭、社会、世界各方面,挖掘“和”思想丰富内涵和积极一面对建设今天美好中国的建设,对推动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当代价值;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88-0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命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

“和”思想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2]“和”的内涵丰富,可以理解为和气、和睦、和谐、和平、温和、平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和平、和睦、和谐”正是其中优秀思想的代表。本文选择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层面来论析“和平、和睦、和谐”其中包涵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家和万事兴

中国古代历来讲究家庭关系的和睦,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由此上至父母关系,下至兄弟姐妹关系、亲子关系,其他家庭关系则是这基础之上的延展和延伸。中国古代的家庭和睦思想深受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影响,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它既要求在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又十分重视家族的情感联系,要“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

(一) 家庭和睦思想的历史根源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家庭和睦是有其根源的。从经济层面来说,我国很早就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人们普遍追求安定平稳的生活。农业文明孕育出“和睦”思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需要男耕女织、各自分工,夫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农业生产离不开丰富的农事经验,对经验丰富的长者的敬重就演化

收稿日期: 2022-11-13

基金项目: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研究”(20BKS088)、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2019 年思政课支持计划项目、2022 年中央民族大学党建研究项目“全面增强和有效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研究”(DJ2022YB07)、2022 年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术团队引领计划“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世界意义与深远影响研究”(2022QNYL15)、2021 年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崔晓敏(1998-),女,山东潍坊人,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施言志(1998-),男,安徽铜陵人,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为孝道;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丰厚的收获离不开家庭成员间的互帮互助,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社会层面来说,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巩固家族之间的凝聚力。家国同构依靠的是宗法血亲关系,爱国首先要爱家,“家”和“国”是分不开的,也因此古人十分追求这个家族和睦。

(二) 家庭和睦思想的具体表现

对家庭和睦的追求,在《尚书》中就早有记载,《尚书》中讲到的“五教”之说,讲的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也深深地影响后世人们对于家庭和睦的观念。家庭和睦需要有序的家庭秩序,那么就需要“敬”与“孝”的精神支撑。

父慈子孝。父女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父母要养育子女,另一方面子女孝敬自己的父母。父母对子女的照顾不仅体现在生活上养育子女长大,同时也要培养子女成才。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也不仅仅体现在对父母生活上的照料,更强调心理的安慰和情感的陪伴。

夫义妇顺。《周礼·小司徒》注中讲到:“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夫妻构成家庭最基本的成员。夫妻关系和睦是家庭和睦的关键因素。夫妻之间讲究男女分工、相爱相亲、相互激励。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教养子女。夫妻之间要有爱有敬,丈夫不得随意打骂妻子,特别是抛妻弃子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兄友弟恭。中国古代的家庭是大家庭,兄弟姐妹之间要互帮互助共同从事农业活动。长兄要尽到照顾、爱护弟弟的责任。弟弟也要敬重兄长,“入则孝,出则悌”中的“悌”讲的就是要敬重兄长。

二、天下大同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由自然、人、社会三部分构成的,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当前我们讲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正是古代的和谐思想。

(一) 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

中国古代不同的流派对和谐社会提出不同的设想。

道家学派的老子设想和谐社会是小国寡民的,

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人民安居乐业、自然无为的和谐社会。这是一种自然纯朴的和谐构想。

法家思想中的和谐社会是“富国强兵”、“依法治国”的状态,以“法”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法是明确的,以法的形式规定一国之人的行动;是威严的,通过严法约束行为,则民众“安其所乐”;是现实的,随着社会需要进行变更,以期维护社会秩序达到社会和谐。

佛家也有对“和谐社会”理想状态的追求,这种状态分为“世间”和“出世间”两种状态,在“世间”的状态有“正法治世”一说,正法即五戒、十善的德化,通过德化的政治,使人得到和乐的善。在“出世间”则是自内心扩大到器世间的净化,使一切达到充满生意的和谐。

儒家提出“大同”社会,在这种大同社会里,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人民互敬互爱、互相照顾,能够和睦相处,达到真正的和谐状态。

(二) 社会和谐思想的具体表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讲求“天人合一”。孟子勾画了儒家的生态社会蓝图,他提出要尊重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才能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道家强调人要与自然融为一体,尊崇自然。纵观不同流派虽然对“天人合一”有不同的看法,但其共同内涵都指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与人的关系同样讲求和谐。社会和谐离不开人的建设。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的状态,需要每个人提高自身修养,理解他人。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讲人要推己及人,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强加于别人之身。同样在《管子·小问》中也有类似的表达,“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和”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为可操作的“礼”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道家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提到冲突问题,老子提出“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等主张就是要通过减少人与人之

间的冲突来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总之,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其一是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其二是遵守人与人相处的规范。

人与社会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和谐、君民和谐、经济和谐。政治方面,外儒内法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治国之法,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仁政。法家通过用法来规范人们生活,用法实现国家治理,通过伦理的教化使百姓更加认同法律,从而达到政治和谐。君民和谐方面,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能从不同侧面认识到“民”的重要性,民本思想不断发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民关系的和谐状态需要统治者体察民情、了解民心。在经济和谐方面,充裕的物质生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孟子讲“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经济不足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百姓只有拥有固定的收入社会才会变得和谐稳定。由此,我们必须正视古代社会的和谐思想本质上还是在维护封建统治,新时代我们学习和运用和谐思想,必须去其糟粕。

三、自古知兵非好战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3]对和平的追求流淌在中国人血液基因中。不论是民族间还是国家间和平共处都是重要原则。

(一) 反对战争

稳定为主的农业生活造就中国人追求和平、向往稳定的思想基础,这与古希腊的尚武精神截然不同。《诗经》记录周人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周人的军事观念。军事力量首先是为了威慑敌人,《诗经》有云:“整我六师,以愐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这是对西周时期,徐国叛乱,宣王征讨过程的描写,中原军队往往以整齐的军列、庄严的仪态体现出“天朝”的威严从而使处于落后文明的蛮族在士气上低落,最后不战而屈兵之师。军队并不追求嗜杀、暴力的征服,而是以恫吓求和平。其二不恋战,“渐渐之石,维卜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武人东征,不立朝矣。”农民出征,远离家乡,远离农事,在

战场上思念家乡,期盼和平的早日到来,能够回归平静安宁的生活,体现士兵对稳定农耕生活的想念。如此思想在《诗经》中还有种种表现,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对战争的厌恶是根深蒂固的。

道家对于战争持反对及厌恶的态度。“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战争不仅会带来伤亡也会破坏农业生产活动。老子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庄子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包括“为义偃兵”。修养其本心,顺应自然,世界则自然,无战争。

儒家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例如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但儒家并不逃避战争,它重视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如不能解决则以正义之师击败不义之师。在战争中儒家反对伤害无辜百姓。

墨家十分批判战争。它主张兼爱、非攻。墨子主张的是积极的防御,在实践中,墨子及其弟子积极研究防御对策,创造发明了一些列武器,并积极奔走各国,阻止战争。

因此,中国向来坚持内向防御的和平文化,对于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十分反对的。

(二) 向往和平

中国的和平思想是包容的,面对不同的文化,中国并不排他也不企图覆盖,中国的思想是多元性的。中国面对外来文化向来是包容的,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

中国的和平思想不仅关注自身的发展也在关心他国的发展。和平并不是排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侵占和破坏他国的利益。墨子提出“兼爱”。主张视人之国如己之国。正如墨子所言,各国在乎自身利益,无视他国利益,只会带来冲突,强调博爱,加强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则可以消除战争,通过“交相利、兼相爱”达到和平。

四、“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和”思想经过千年的积累,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实践的力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

研究“和”思想的应有之义。在新时代“和”思想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和睦相处：为家庭相处提供价值引领

古代的和睦思想中的关系是相互的，子女对父母并不是愚孝、愚从，妻子对丈夫不是盲听、盲从。和睦思想对维系家庭秩序、维护家庭关系有重要作用。

新时代倡导家庭美德建设，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在当今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亲情观念日益淡薄。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使得个人突破家庭的束缚，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这也影响到了婚姻的健康发展。以和为贵的家庭观念有助于加强对个人道德的修养，担负起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有助于理解亲人，缓和与长辈、子女、兄妹之间的矛盾；有助于和睦家庭的构建，积极地应对社会环境变化给家庭稳定所带来的挑战，传承“敬”与“孝”的精神。

（二）兼爱和谐：为社会建设提供思想来源

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弘扬和谐文化、培养和谐精神都是为更好建设现代社会，创造美好中国。

从个人来讲，强调提高内心修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思想十分重视个人内心的修养和道德的坚守，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提出“反求诸己”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和谐，就要引导人们提高自己的境界，修养自我、塑造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质，使人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帮助达到和谐的状态。从社会来讲，强调“群体本位”，坚持大局意识，维护社会和谐。人在社会，言行举止顾及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严复说：“能群者存，不群者灭。”个人与群体是息息相关的，个人只有把自己置于群体之中，才能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当代，政府与人民之间并不是君臣关系，而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为人民而服务，而人民也要有主人公意识，承担责任、履行义务。

坚持“天人合一”思想，走绿色发展道路。西方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也经历过弯路，最终找到绿色发展之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发展模式是发展的关键。“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于生态和谐的追求。自然是客观的，人要遵循自然之道，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的合理行为也会对自然产生积极作用。尊重规律、发挥能动作用的思想充分影响当代中国坚持自己的绿色发展之路，并与其他国家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智慧。

在古代，不同流派对“和谐社会”的设想有其历史原因，古代的社会基础决定古代社会的“和谐”构想无论多么宏伟都是无法实现的，通过挖掘背后的原因为当代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提供启示。其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有高生产力水平。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并不丰富，自然也支撑不起“和谐”的上层建筑。因此，在当代，我们首先要把蛋糕做大，使社会保障覆盖全面，实现人人皆有所养。其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古代的和谐社会更注重家庭、宗族关系，重人情，经济交往少，超出这个范围，容易产生冲突和矛盾。在当代，社会交往范围扩大，经济往来增多，公平公正的市场关系是丰富人际关系的保障。其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传统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德治、法治思想十分丰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古代“和”思想从根本上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强调的是人人平等。其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社会。古代所谓的“和谐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清明的君主。民众的诉求很难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社会，在政治权利上人人是平等的。只有民主得到充分的尊重，公平正义的和谐状态才能最终达成。

（三）和而不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持久和平”是放在第一位的，可见中国对于“和平”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坚持和平思想，体现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历史使命感，也为世界提供了

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和”为主导的。持久和平的世界离不开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始终坚持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提倡各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中国始终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而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4]充分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历史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政治上，以对话超越差异，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安全上，安全是各国共同的追求，搁置差异，共同合作。在经济上，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尊重他国文化，借鉴他国文化，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在生态上，与他国积极合作，共同推进生态保护。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并不代表无原则让步。中国人不是一味求和的，中国的“和”思想带有辩证色彩，墨家倡导积极的防御，追求和平并不是顺服，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不让一寸，绝不做侵犯自己权益的事情。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古代的“和”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中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和”思想适应了中西文化价值冲突融合与传统现代化转换升级的需要，在解决家庭矛盾、社会冲突、国际问题中发挥着强大的调节作用，在新时代，我们要警惕“和”思想封建性的糟粕面，发扬其优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 2022-10-17(2).
-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 [3]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20-10-23(01).
- [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1-04-21(01).

【责任编辑：温开照】

红色资源的“五个认同”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 ——以茂名市为例

莫飞燕

(中共茂名市委党校 茂名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具有独特的资政育人功能。红色资源与统战工作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发挥红色资源蕴含的精神力量, 对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 增强统战工作对象“五个认同”, 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红色资源; “五个认同”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93-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 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这充分肯定了红色资源的重要价值。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积淀的先进文化资源, 包括革命遗址、纪念场馆、革命烈士陵园等, 也包括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和信仰, 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等, 是印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资料库,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今天,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 红色资源依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对于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而言, 红色资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 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统战工作作为我们党的重要法宝。当前我国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们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迎接新的挑战, 就要继续发挥法宝的作用, 发挥红色资源在

统战工作中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长期受到西方的文化观、价值观等不同程度的冲击, 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如果我们不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敌人就会见缝插针占领。因此, 要站牢意识形态阵地, 就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独特的育人功能, 不断增进共识, 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核心在于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核心内容, 只有深刻把握“五个认同”的重要内涵, 才能深刻把握当代统战主题。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意识便是“五个认同”, 因此, 红色资源在当代统战工作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笔者将以茂名红色资源为例, 阐述红色资源在当代统战工作中的“五个认同”价值。

收稿日期: 2022-10-20

作者简介: 莫飞燕(1986.06-), 女, 中国近现代史硕士, 中共茂名市委党校(茂名市社会主义学院)决策咨询中心副主任, 讲师。

一、利用红色资源能有效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英雄史诗。”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把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书写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的精神力量。红色资源作为形成于革命、建设、改革中独特物质和精神财富,与爱国主义有着水乳相融的共生关系。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就是要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茂名儿女用自己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生于电白县麻岗仙桃园村一个富有家庭的邵贞昌,从小就立志为中华民族崛起读书。通过自己努力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就读期间,邵贞昌积极参加了阮啸仙创办的“新学生社”,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于 1924 年 12 月由团员转为党员。1925 年 12 月,邵贞昌考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但邵贞昌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留在家乡继续搞农民运动。邵贞昌放弃了难得的出国留学机会,选择继续在家乡坚持革命,因为心里装着早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爱国梦。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在关系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面对强大而残暴的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反而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英雄气概迎难而上。在茂名、电白、信宜、化县县委领导下,四县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四县分会”,掀起了捐款捐武器抗美援朝的热潮,并有 24 名积极分子踊跃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踏上了朝鲜战场。为了治理鉴江流域中下游地区频繁旱涝,解决茂名市建设的生活和工业用水,从 1958 年 5 月起,在高州县境内的大井河、曹江河上游,先后有近 10 万茂名人民在缺机械、缺物质情况下,靠自带干粮、肩挑手推,仅用 2 年 2 个月完成良德等两座大型水库的建设,为茂名的工业、农业及城

市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在茂名的实践证明,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一位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红色资源赋予统战工作最好的礼物。新时代我们要做好民主党派成员、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统战工作对象的统战工作,发挥红色资源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统战工作对象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二、利用红色资源能有效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作为一部中国史的生动展现——红色资源,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资源,充分体现了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情基础上的民族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全国如此,茂名亦如此。1953 年,我国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中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相适应发展农业、运输业。当时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原油年产量只有几十万吨,怎能解决工农业、运输业的需要呢?为了寻找能源,国家派出勘探队到处寻找,最后在茂名发现油页岩。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指出:“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页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4 月 28 日,周恩来批示:经中央同意,在广东茂名建设规模为年产 100 万吨原油的油页岩炼油厂。为了使油页岩炼油厂尽快建成投产,来自于祖国五湖四海、各民族的建设者远赴千里来到茂名,响应油公司党委“苦干三个月、打开施工局面”的号召,在这“地上不长草、地下藏着宝”的地方安营扎寨,打响了开发茂名页岩油的大会战,开始“开挖火水山,建设石油城”。1960 年,苏联撕毁合同停止设备供应和技术指导,又逢上三年自然灾害,从当年起国家逐年削减对茂名建设的资金

和力量。油公司党委冷静研判形势，学习和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作出“顾全大局，自力更生，又让又上”的决策，调整规模，集中资金，为缓解国家石油困难作出了特殊贡献。茂名建市的奋斗史正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加强红色资源对统战工作对象的宣传与教育，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共同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夯实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

三、利用红色资源能有效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有着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3]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就要从红色资源中汲取奋进力量，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尊重、肯定和继承。

冼夫人是茂名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曾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本名冼英，在统治岭南地区期间，历经了南梁、陈、隋三朝，但始终以“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告诫后人，意在不分政治地缘，不分宗教信仰，旨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这份“好心精神”得到后人的传承和发扬，形成了“好心文化”。“好心文化”的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今天，“好心文化”是茂名的“根”和“魂”，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每一位茂名人血液里携带的基因，是做好统战工作，凝聚统战力量最好的音符。例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一线，总能看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慷慨解囊的身影；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总听到党外人士捐资捐物、出人出力的感人事迹。由此可见，加强红色资源对统战工作对象的宣传教

育，避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被遗忘被抛弃，避免盲目地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追捧，消除西方文化带来的文化殖民心理和文化奴性意识的影响，增强统战工作对象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四、利用红色资源能有效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1947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领导权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根本保证。红色资源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与统一战线的领导主体存在一致性。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要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的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 56 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鲜明特点，是红色资源最亮的底色。

“民国初年，茂名、电白、信宜、化县四县人民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4]当时四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军阀割据，捐税徭役繁重，土匪出没频繁，自然灾害严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时刻渴望改变黑暗社会现状和艰难困苦生活。四县一批在外求学的进步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接受先进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受到党组织委派，回到四县发动农民运动并建立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四县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县先后发动了怀乡起义、沙田暴动、化县五区暴动、夏收暴动等。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击日军，四县纷纷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队伍。解放战争

时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四县老百姓纷纷出钱出人出力予以支援,为解放粤桂边全境、解放海南岛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充分体现了老百姓发自内心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茂名遗存的革命遗址不少于30处,丰富的红色资源无处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时代要做好统战工作,就要充分利用革命旧址等红色资源,继续擦亮红色资源最亮的底色,增进统战工作对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的认同,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做好统战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更多各民主党派成员、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统战工作对象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

五、利用红色资源能有效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决定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必由之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主题,未来要迎接各种困难与挑战,需要通过整合各种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拓展和深化提供动力。红色资源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宝贵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就要增强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华侨等统战工作对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着丰富红色资源的茂名先后产生了时代楷模罗传经,弥留之际交代亲属:“我是共产党员,后事从简。在我的积蓄中拿出1000元交党费,其余的捐给村里建小学”;产生了被中央军委授予“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荣誉称号、劳动模范、人民好公仆的活雷锋朱伯儒;产生了32年如一日,在讲台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茂名好人刘海等等,茂名一批批时代先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新时代要做好统战工作,就要发挥红色资源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增强统战工作对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守正创新、接续奋斗,共同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辉煌的崭新篇章。

六、红色资源的“五个认同”价值的实现路径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基础在于用好红色资源。茂名是一个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立足于茂名红色资源,发挥茂名红色资源在统战工作中的时代价值,就要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创新传播方式,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资政育人功能,让红色基因融入统战工作对象血脉。

(一) 搭建红色资源网络学习平台

促进统战工作对象加深对红色资源的了解和学习,平台很重要。借助互联网,由统战相关部门牵头搭建红色资源网络学习平台,做好“互联网+红色资源”的大文章。如可按照茂名发展的时间顺序,通过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将茂名丰富的革命斗争史、建设和改革时期的艰苦奋斗史等撰写成小文章,拍摄成经典纪录片或者小视频,在红色资源网络学习平台上进行推送。了解是认同的前提,通过让统战工作对象随时随地能了解茂名当地红色资源、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了解,提升统战工作对象的红色情怀和思想觉悟,推动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二) 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活动

茂名红色资源丰富，既有战争遗址，也有革命展览馆等。通过不定期或者选择在“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特定节日组织统战工作对象到茂名市博物馆、高州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电白高圳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进行学习培训。对于相对年轻的统战工作对象，可以组织他们到化州荔枝垌战壕遗址进行学习教育。化州荔枝垌战壕遗址位于化州市林尘镇荔枝垌村周围的山顶上，通过现场教学，让统战工作对象感受毛泽东主席的用兵如神，感受我们茂名的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上下一心艰苦奋斗获得的，相当不容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培训，让统战工作对象在学习培训中受到震撼和启迪，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打造红色文化资源学习长廊

茂名红色资源丰富，这不应仅仅是停留在书本、博物馆、遗址上，而是应该“走进寻常百姓家”。可以通过墙体彩绘壁画等形式把当地红色资源展示在大家生活区域的显眼处，不定期邀请本地红军和老革命家的后代讲述红色故事，让统战成员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感悟家国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增进统战工作对象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认知和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英雄史诗。

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5]统一战线之所以一直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根本原因在于它解决了人心和力量问题。凝聚人心和力量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在社会阶层多样、思想观念多变、利益格局调整的形势之下，做好这项工作更需要久久为功、绵绵发力，而这动力可从红色资源中汲取。通过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把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注入到统战工作中，增强统战工作对象“五个认同”，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
- [2] 习近平于2019年9月27日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 [3] 习近平于2014年6月6日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发表的重要讲话.
- [4] 中共茂名市委党史研究室、茂名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茂名地方史（第一卷）（1924—1949）[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6月.
- [5] 习近平于2021年10月9日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责任编辑：陈童敏】

新时代背景下江门非遗保护与统筹发展研究

余文星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民主建国会江门市委员会, 广东 江门 529000)

摘要: 江门是一个非遗大市, 市级以上非遗项目126项, 项目种类覆盖10个大类。当前, 江门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已取得一系列成就, 同时也存在多种问题, 技艺传承、宣传推广、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尚有不足, 非遗与旅游产业、互联网信息技术、高校研究等的融合还有更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非遗+”的新业态仍需培育。新时代江门非遗的保护传承需要提高传承人收入, 提升非遗产业化水平, 打造地方非遗品牌, 增多非遗展演机会, 提升民众参与度, 以真正实现江门非遗的活态化发展。

关键词: 江门; 非遗; 保护; 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098-04

作为“中国侨都”、岭南历史文化名城, 江门千年来塑造、传承了独具特色的五邑文化、华侨文化, 非遗资源十分丰富。目前, 江门市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 126 项, 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传统戏剧等 10 种 (图 1)。^[1] 为进一步实施

江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广东省“十四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实施方案》《江门市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方案》等多个政策文件, 明确了工作路径, 划出了工作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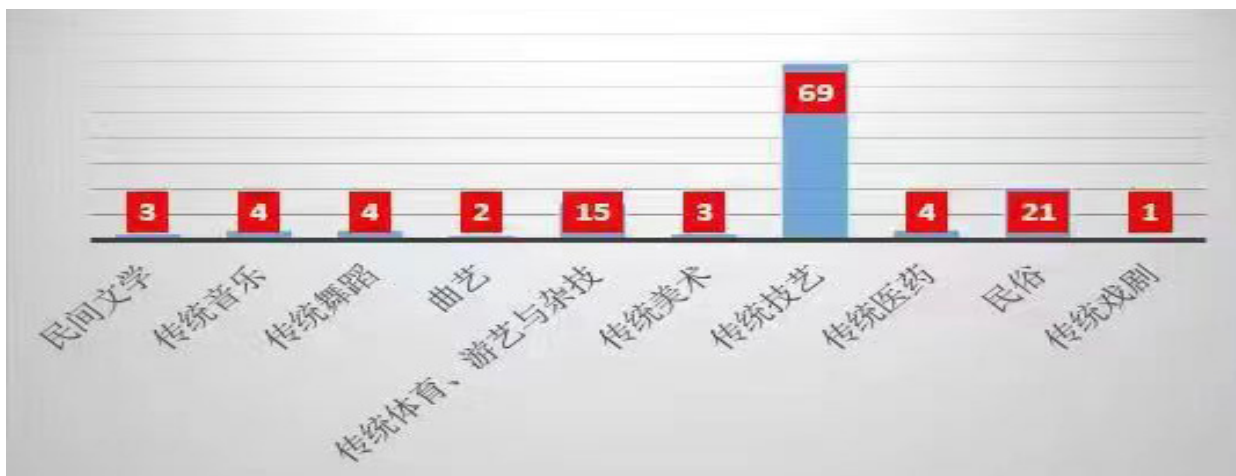


图1 江门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收稿日期: 2022-11-02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项目 (pdjh2021b0970)、广东省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项目 (2022B01)

作者简介: 余文星 (1975-), 男, 博士,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民主建国会江门市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江门市委员会文化艺术院院长。

一、当前保护传承中的问题

在各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江门在非遗资源发掘、非遗项目体系建设、传承人筛选与培养、非遗综合展示馆建设、非遗活动开展、文化产品开发、新媒体宣传等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江门非遗的保护、开发、宣传既注重经济效益,又关注非遗中蕴藏着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方位、立体式的结构。江门政府及社会组织基于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推行了一系列的非遗保护与开发措施,打造了葵制品、陈皮等非遗产业链条,推动了江门非遗的活化,引导本地民众和外地游客消费非遗产品、追溯华侨历史、体验非遗文化,展示了江门的地域文化特色,为创建国家级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为建设文化强市提供了强大支撑。但是,需要注意

遗传传承人的最大群体并不包含在内。特别是对一些民间文学类、传统体育类等很难获得直接经济效益或市场化发展落后的非遗项目而言,补助对传承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2. 在“2020 广东非遗创新发展峰会”上,宋俊华提出非遗保护管理的大数据平台是非遗保护精准管理和精准施策的重要依据,广东需要建设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非遗公共数据平台。目前,江门市对区域内的非遗已经做了系统的普查、挖掘,获得了大量文字、图片、录音、录像资料,建立了基本的非遗项目数据库,打造了公开的“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推出了非遗文化可视广播节目——《非遗江门行》。但是,江门非遗的数据资料大都缺少系统的梳理,未能在非遗网站或公共图书馆平台上公布,不利于非遗的研究、推广、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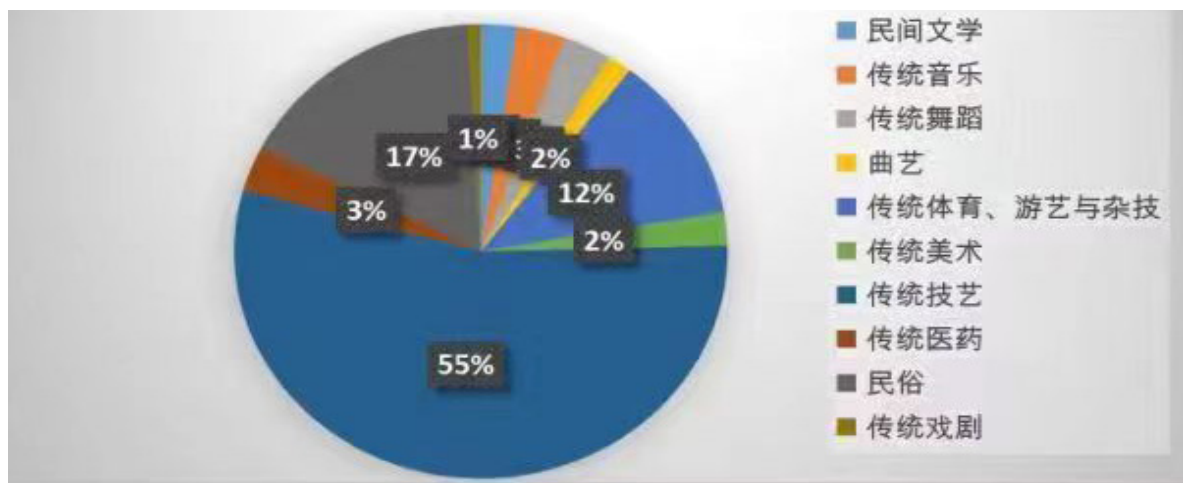


图2 江门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特征

的是,江门目前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在技艺传承、宣传推广、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尚有不足,非遗与旅游产业、互联网信息技术、高校研究等的融合还有更进一步深入的空间,“非遗+”的新业态仍需培育。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 2020年起,江门市开始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予以每人每年1万元的市级补助。补助资金对于提高传承人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关心传承人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传承人的技艺传承提供了切实保障。但是,江门市级补助对象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覆盖的传承人群规模小,省市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一非

3. 在江门的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非遗数量最多,占126项非遗项目的56%(图2)。这些传统技艺生产的陶瓷、布艺、食品、编织品等在生活中应用广泛,接受门槛低,易于运输推广,极具开发价值。^[2]例如,利用国家级非遗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生产出的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产业发展十分迅猛。2019年,新会陈皮行业年产值已近70亿元,带动新会全区农民直接收益超12亿元,成为江门市兴业富农的重要支撑。^[3]但是,与产业化成功的新会陈皮相比,江门的非遗项目大都由于潜在市场规模小、消费者少的不利条件,产业集群处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大规模的“马赛克经济”

版图。这就使得江门的非遗技艺产品很难真正进入现代百姓生活,不利于江门非遗的真正活化。

4. 非遗的品牌化可以让非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从而有效地进行非遗传承和发展。根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第一批)价值评估榜单,新会陈皮的品牌价值高达98.21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达75.160。^[4]与非遗产业化发展现状相似,江门的非遗项目大都不像新会陈皮那样,未经过市场的充分洗礼,品牌化意识不足,在品牌建构、品牌文化塑造、品牌推广等方面更加欠缺,有待培育。

5. 每个地区的非遗都是该地区历史文化的标识,是该地流传已久的活的记忆。为提升江门非遗的影响力,江门市建有多个非遗手信馆、专题展示馆、传习所等,组织搭建了多种非遗展示平台,举办各种主题宣传、文化节庆活动,筹划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展演活动。在线上,非遗节目、媒体报道、平台直播等组成的非遗文化媒体宣传矩阵是江门非遗“出圈”的另一种途径。不过,江门的非遗宣传仍存在力度不够,没有充分借助新媒介技术、数字技术等问题。

6. 非遗传承进高校,高校开发非遗文创是当下非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底,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教育局已完成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进校园的任务。江门长期依托五邑大学、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两个省级非遗研究基地,开展非遗的研究和文创开发工作。但是,综观近年来江门的非遗人才培养建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毕业生对口就业难、职业取向不明确、研究人员缺乏身份认同等这样那样的问题。

二、统筹应对的措施

政府的主持、投入引领非遗工作的方向、原则,是非遗保护与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角度看,行业协会、企业、民众的支持、参与是非遗政策落实、非遗真正活化的要点,这样才能实现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在之后江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需要提高传承人的收入,提升非遗的产业化水平,打造地方非遗品牌,增多非遗展演的机会,

提升民众的参与度,真正实现江门非遗的活态化发展。

1. 扩大传承人补助的覆盖范围,建立详细的考评机制。2019年起,东莞市给予市级以上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1万元的补助。参考东莞市政府政策,江门市可在2022年至2027年的五年内陆续将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的范围由国家级扩大至市级。补助的金额也可从每人每年1万元提升至1.5万或2万元。在监管、落实补助的同时,也要将代表性传承人传承的能力考评纳入补助的条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能力考评体系。对于不作为、传习工作不到位的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实施“退出机制”,将考核评估结果作为其是否继续享有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及相关权益的主要依据。

2. 建立江门非遗数字资源库。江门非遗数字资源库的建设立足于现有资料,在全面调查发掘的基础上,按照数字化、多媒体格式的要求进行加工、整理、分类、编码后,再系统化分类存入数据库。江门非遗数字资源库建成之后,可在江门市文化馆、公共图书馆等机构网站上推出,设置用户中心管理模块,面向全社会免费服务。

3. 成立鼓励非遗产业化的引导性扶持发展基金。在江门非遗中,一些经济潜在价值较好,市场化可能性较高的非遗项目,应当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5]针对当前江门非遗产业化、市场化普遍不高的问题,建议成立相关鼓励非遗产业化的引导性扶持发展基金,专注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市场活化,给予项目传承人、非遗企业一定资金扶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调动各方社会资本投入推动非遗产业化的积极性。

4. 非遗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不等同于非遗项目的品牌价值。为引导非遗企业、传承人树立品牌意识,江门政府可组织筹办区域内及周边地区非遗品牌之间的交流活动。通过对成功非遗品牌案例的展示、教学,让非遗人充分认识品牌的重要性,鼓励他们采取适当的战略打造自身品牌,借助品牌合作、跨界联名等方式,将品牌推进、融入到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生活中。这些独一无二的江门非遗与侨乡历史文化内涵相契合,亦是江门城市品牌建设的一张强有力的文化名片。置身江门,游览于

江门非遗展演场所之间,民众通过非遗体会到江门当地的文化特色,形成对江门的“品牌记忆”。

5. 处在网络媒体时代,各种新媒体平台上不断制造江门非遗的流量、话题,将传统技艺直观展示到民众面前,博取民众的注意力。传统遇到新的媒介技术、数字技术,非遗被技术赋能,注入了新的活力。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見》,提出非遗宣传“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鼓励各类新媒体平台做好相关传播工作”。^[6]故此,江门非遗的传播应加强与网络技术的融合,深化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合作。具体操作上,江门市文化馆可以负责推出专门计划,开通“江门非遗”抖音号、快手号,支持和鼓励126个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开通各自的抖音号、快手号,为江门非遗的宣传推广插上数字的翅膀。在账号维护上,江门各类非遗账号的负责人应与平台合作,向专业人士学习,提高非遗视频的制作水平,增强视频获取流量能力,协力打造非遗开放平台,进而挖掘江门非遗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6. 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不只是一个体验的工作,更肩负着一个帮助青年学生追溯乡土文化、民俗传统,重建自身文化植被的使命任务。这对于非遗在全社会的推广也有着重要意义,需要借助各种方式、方法进一步将省级、市级非遗推进到校园中去。而在非遗的人才培养上,政府与高校应该充分思考非遗相关专业定位和特色塑造,处理好专业教育、非遗创新开发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学生打通资源整合渠道,提供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的

机会,让毕业生能够对口就业,保障毕业生从事非遗保护的相关工作。

三、结语

江门是一个非遗大市,其126项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该地曾经发生过的一段历史、一则故事、一个篇章,值得去不断回味、挖掘,反复体验其中的精神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的一系列相关工作,对于江门本土文化的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需要政府、行业、企业、传承人与民众多方努力,携手共进。

参考文献:

- [1] 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名录项目[EB/OL].<https://www.jmswhg.cn/fy/mlxm/mjwx/>.
- [2] 殷亚丽.活化视域下传统技艺类非遗发展研究[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22(3):57-63.
- [3] 新会陈皮产业迎来全面丰收[N].江门日报,2019-12-23.
- [4] 农业农村部网站.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EB/OL].(2019-11-1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18/content_5453027.htm.
- [5] 王松华,廖嵘.产业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7-112.
-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見》[EB/OL].(2021-08-12).http://news.cnr.cn/native/gd/20210812/t20210812_525561550.shtml.

【责任编辑:余伟】

南越国食官考

乐新珍

(南越王博物院, 广东 广州 525000)

摘要: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不少文字资料, 其中部分涉及到南越国的食官, 本文拟对相关的文字资料进行初步的整理研究, 从中管窥南越国的食官制度及饮食生活。

关键词:南越国; 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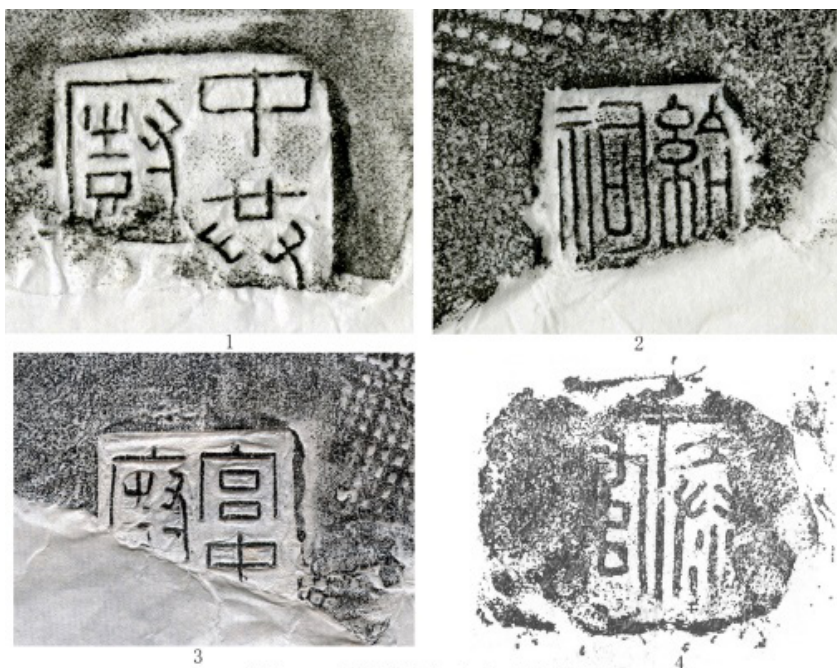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102-06

南越国是公元前 203 年由秦末南海尉赵佗建立的地方政权, 定都番禺(今广州), 后归附西汉, 历时 93 年传五主, 公元前 111 年, 被汉武帝所灭。南越国疆域大体上与秦设的三郡(桂林、南海、象郡)相当, 包括今广东、广西, 及越南北部等地区。近年来南越国宫署遗址^[1]、南越王墓^[2]、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3]和广州汉墓^[4]等一批南越国时期的遗存, 出土不少文字资料, 其中部分陶器、漆器、银器、木简等器物上记载了南越国的职官属官—食官, 笔者拟结合出土材料与文献对这些文字资料进行初步的探讨。

近盖钮的弦纹处戳印“中共厨”三字, 篆体阳文, 印文面为方形, 边长 2.2 厘米, 无界栏。“西共”银洗出土于南越王墓后藏室, 后藏室为庖厨之室, 随葬器物以烹饪器、储盛器和盥洗器为主。银洗造型古朴, 素面, 直口, 平折沿, 折腹, 圜底, 底部



图一 南越国出土文字资料

1. “中共厨” 2. “给祠” 3. “宫中厨” 4. “泰官”

一、南越国出土文字资料

1. 共厨

包括 1 件“中共厨”陶提筒器盖(残片)^[5](见图一, 1)和 1 件“西共”银洗^[6]。“中共厨”陶提筒盖(残片)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越国遗迹中, 灰黄陶, 盖顶饰三组双弦纹,

收稿日期: 2022-10-10

作者简介: 乐新珍, 女, 湖北大悟人, 南越王博物院文博馆员, 主要从事岭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

划5道波线。洗上捶打的痕迹尚隐约可见，平折沿的正背面都有铭刻：正面刻“三”字；背面刻“六升西共左今三斤二两乘舆”。口径20.4、高4.5厘米。

“共厨”即“供厨”，指供应祭祀用的食品机构或官吏，有学者认为“供厨”是“遇有巡幸时，供给厨食所用”^[7]，表明共厨是太宰令属下掌管鼎俎饌具之物的官吏，是专为秦汉皇帝祭祀天帝、郊祠五時提供膳食器具的机构，是奉常的属官^[8]。“共厨”传统应该是承袭秦制。《汉金文录》辑录相关的铭文有“长安共厨金鼎”“好時共厨金鼎”“雍械共厨铜鼎”等，从这些铜器铭文中的“共厨”看，绝大多数在铜鼎之上，个别铜鎛、甗、匱上铭文也有，这证明“共厨”主要是提供祭祀食品，凡设“共厨”之地也大多与祭祀活动有关。“中共厨”应该是在南越国宫中设立的为祭祀服务的共厨。“西共”是秦西县共厨之省文，即设在西县供应西時牲厨用具的机构或官吏。西县为秦所置，在陇西郡，考古证实其治所今甘肃天水西南的礼县、西和县一带^[9]，汉代因之不改。既然“西”是秦之故都所在，在此设共厨也是必要的^[10]。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西共”、“西共丞印”^[11]、“西共食室”^[12]，汉代亦有“西共”铭文铜器，《汉金文录》中“杜鼎”铭：“一斗十斤。西共左。”“左”为左般的省称，是共厨的属官。南越国的这件“西共左”银洗应该是秦平岭南之物，后被用到南越国宫中。南越国设“共厨”，表明其保留了秦制。

2. 给祠

罐或瓮类陶器（残片）（见图一，2），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越国遗迹中，灰陶，器外饰有方格纹，陶片口部残高4.5厘米，肩部戳印“给祠”二字，篆体阳文，印面为方形，边长1.8厘米，无界栏。

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的“祠官”分两种，一是奉常下有“太祝”。《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皿。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祝”为官名，负责宗庙祭祀祷告之赞词。殷商甲骨文中有关于“祝”的记载，西周初期金文也见“大祝”，《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

西安相家巷出土秦“祝印”封泥^[13]，“祝印”当为“祝官”之印。二是詹事下有“祠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云：“大祝……长信詹事丞、家马、长信祠祀……长信尚浴、长信谒者、祠祀……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14]从这条简文可知，既有属于詹事的“长信祠祀”，也有“祠祀”，二者为并列关系，故推测“祠祀”可能是西汉初期奉常的属官。《后汉书·百官志二》记载“太常”条下本注：“有祠祀令一人，后转属少府。”西安相家巷出土秦“祠祀”印封泥^[15]，汉初承秦制，“奉常”下设“祠祀”。有研究者认为“太祝”和“祠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国家祭祀中“读祝”和“迎送神”，后者则主持中小祭祀^[16]。“给祠”负责供给祭祀物品，自然少不了食物，应是祠祀的属官。秦汉时期的简牍有不少律令记载“给祠”。《岳麓书院藏秦简》（伍）记载“令曰：县官所给祠，吏、黔首、徒隶给事祠所，斋者，祠未阙而敢奸，若与其妻、婢并□，皆弃市，其□□。”^[17]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墓出土简牍《腊律》记载“若斋而与妻婢姘及奸，皆弃市。当给祠具而乏之，及鬼神置不具进，若当斋给祠而诈避者，其宗庙、上帝祠也，耐为隶臣妾；它祠，罚金十二两；它不如令者，皆罚金。”^[18]可见汉“给祠”沿袭秦制，且管理极为严格，南越国的“给祠”理应如是。西汉诸侯王国也发现有祠官，如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有“楚祠祀印”^[19]，满城汉墓出土“中山祠祀”封泥^[20]等。

3. 泰官

包括15枚“泰官”封泥^[21]（见图一，3）和1枚“泰官”木简^[22]。其中13枚“泰官”封泥为南越王墓后藏室出土。后藏室是储藏食物和放置炊器与储容器的重要库藏，共有铜器、陶器130多件，其中30多件器内还装有家禽、家畜和海产品，推测这些随葬器物应该是经由泰官检封的。封泥底部有木痕和绳痕，有的还见穿绳的槽沟。“泰官”二字为篆体阳文，字体端庄，有边栏及竖界，印面为方形，长宽各2.2厘米。细审印文字体及边栏尺寸，证明是同一方印章钤印出来的。另外2枚“泰官”封泥出土于西侧室，形制大小同前，其中一枚背面有木匣

及双绳痕迹。西侧室还出土不少铜器、陶器等,以及成堆的动物遗骸,如猪、牛、鸡、鱼、龟等,室内有 7 个殉人,推测这些殉人是庖厨食官或其属役。

“泰官”简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越国渗水井中。

“泰官”为职官,古时大、太、泰同音通用假借,因此“泰官”或又作“大官”和“太官”。战国时期已有“大官”,郑韩故城出土韩国兵器铭文有“大官冢子”^[23],秦国铜孟铭为“谬大四斤大官四升”^[24],秦简中亦书“大官”^[25]。秦统一全国后改“大”为“泰”,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泰官丞印”、“泰官府印”^[26]。汉代继续沿用这一职官,但又将“泰”改为“太”,如“齐大官”^[27]、“楚大官”^[28]、“吕大官”^[29]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秦官。……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十二官令丞。”颜师古注:“太官主膳食。”《汉旧仪》云:“太官令一人,职六百石,掌鼎俎饔具。”可见“太官”是用来掌管皇帝饮食和朝廷设宴之官吏。其官长称令或长,下设丞和监^[30]。西汉南越国一直使用“泰子”、“泰官”,说明南越国保留了秦制,也反映了其制度的滞后性。

4. 食官

包括 1 件“食官第一”陶鼎^[31]和 1 枚“食官”木简^[32]。“食官第一”陶鼎出土于广州梓元岗汉墓,鼎高 21.7、腹径 19.5 厘米,腹部刻写隶书“食官第一”。墓中随葬器物主要有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钫、罐、瓮,以及铜熏炉、铜镜和玉印等。“食官”简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越国渗水井中。

食官制度在周代已有明确记载。据《周礼·天官·膳夫》:“膳夫,掌王之饮食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郑玄注曰:膳夫,“食官之长也。”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都证明秦代已有“丽山食官”^[33],汉之食官,应是沿袭秦制而来。《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属官有……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另外“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属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又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汉初“食官长,

秩六百石,丞一人”^[34]。南越国为西汉诸侯国之一,墓中所出陶鼎上铭刻“食官”,应是南越国仿袭中央而设的一种主管饮食的官吏,墓主的身份与“食官”有关,“第一”有可能是表示器物的编号。“食官第一”未冠以庙寝园的称谓,从随葬品看,墓主生前属于詹事的食官,负责皇后和太子的膳食^[35]。汉代其他诸侯国也设有相应的食官,如“代食官”^[36]、“齐食官”^[37]、“常山食官”^[38],楚“食官监印”、“食官第二”^[39]、“御食官”^[40],海昏侯“昌邑食官”^[41],长沙国“食官中般”^[42]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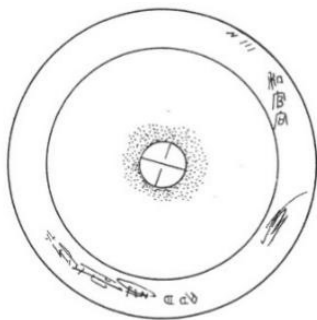
5. 中官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越国渗水井中出土了 2 枚“中官”木简,其中简 73 记载“野雄鸡七其六雌一雄以四月辛丑属中官租纵”,简 75 记载“四月辛丑属中官租纵”^[43]。

“中官”一职先秦已设,《国语·晋语四》:“掌其中官”,韦昭注:“中官,内官。”《汉书·外戚传》:“中官史曹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应邵《汉官仪》:“皇后称中官。”《汉旧仪》云:“太官尚食用黄金釭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釭器。”洛阳出土战国“中官”陶罐^[44],西安出土秦“中官丞印”封泥^[45]。汉承秦制,山东出土“菑川西官中官”铜盆^[46],江苏出土“中官”漆盘漆案^[47],《汉金文录》中有“王后中官二斗五升少半升”鼎。从“中官”铭刻的器物均为食器看,“中官”可能也是食官的属官。南越国木简上的“中官”涉及到了“野雄鸡”和“租”,推测“中官”也参与了租赋,只是租赋仍处于以物易物阶段,考古发现也证实南越国时期的货币极少。也有学者认为中官是宦官的别称,《汉书·高后纪》记载,高后八年“诸中官、宦者令丞,借赐爵关内侯,食邑。”注引如淳曰:“诸官加中者,即阉人也。”

6. 私官

“私官”银盒出土于南越王墓主棺室^[48],通高 12.1、腹径 14.8、器重 572.6 克。盖面两处刻有铭文,一处刻写“名曰百廿一”,另一处刻写“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器底刻铭“私官容□”、“□名曰”(见图二)。银盒出土时内装有许多药丸。



图二 “私官”银盒

其造型风格与西亚波斯帝国银器相同，其来源路径学者多有探讨。

“私官”之名，战国时就已经有了。陕西咸阳出土秦国“私官鼎”^[49]、陕西武功出土魏国信安君“私官”鼎^[50]。秦统一后仍沿用，西安相家巷出土有秦“私官丞印”封泥^[51]、“私官左般”封泥^[52]。陕西汉长安城出土有“长信私官”^[53]，河南三门峡秦汉墓出土“私官”鼎^[54]，江苏龟山出土有“楚私官”量^[55]。《汉书·张汤传》记载“太官私官并供其第”，服虔注曰：“私官，皇后之官也。”《汉旧仪》云：“太官尚食用黄金釭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釭器。”陈直在《汉书新证》中注明：“私官供用具。”^[56]南越王墓出土的“私官”银盒，与记载相符，应为南越王宫中主管皇后宫饮食之官吏，也包括公主、太子家^[57]。“私官”也可称“中私官”、“中私”，汉武帝茂陵陵区出土有“中私官铜锤”^[58]，“中”指皇后。一般认为，食官掌整个后宫，私官则掌王后饮食。

7. 厨

包括3枚“厨丞之印”封泥^[59]、5件“大厨”陶瓮或陶罐^[60]、1件“宫中厨”陶器（残片）^[61]（见图一，4）、1件“厨”漆耳杯^[62]。

“厨丞之印”均出土于南越王墓西侧室，小篆阳文，印面方形，长宽都是2.2厘米，有田字格。“大厨”陶瓮，出土于广州北郊福建山汉墓。5件“大厨”陶器大小形制相似，口径18.2、底径16.7、高29厘

米。器物肩部戳印“大厨”二字，小篆阳文，无界栏。其中3件同出于一墓，随葬器物还有陶鼎、盒、罐、三足罐、三足小盒、碗、甑、熏炉，铜盆、勺、鎏金铜牌、铜镜，银镯、铁削、玉珠饰等；另2件同出的还有铜鼎、釜、勺、鎏金铜牌、铜镜、铜灯形器，铁削、石砚，陶鼎、盒、壶、钫、瓮、罐、甑等。“宫中厨”陶器（残片）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越国遗迹中，

陶片胎体厚重，外壁施方格纹，内壁素面，推测可能是瓮或罐一类器物，篆体阳文，印面残长2.5—2.8厘米，无界栏。“厨”漆耳杯出土于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耳杯底部刻划“厨”字，字是在髹漆后再刻划上去的。

秦代已设有厨官，陕西秦始皇陵食官遗址出土“丽邑二升半八厨”陶盘、“□□六厨”陶片^[63]。汉承秦制，厨官之设更多，《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詹事、内史、主爵中尉均设有厨官。出土材料可见“永巷令厨”^[64]、“长安厨长”、“长安厨丞”^[65]、“楚大官厨……好时共厨”^[66]、“庙厨畜夫”^[67]等。《金石索·金索》中记载汉建昭雁足灯原刻铭文曰：“建昭三年考工辅为内者造……中宫内者”，其补刻铭文：“故家。设大厨。今阳平家一至三，阳朔元年赐。”可见列侯家有“大厨”。出土的“大厨”的广州汉墓，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看，墓主应为南越国的厨官，生前地位较高。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耳杯铭刻“厨”字，表明该器为厨官所有。厨官还有“中厨”。西安出土的汉代铜器钮上有“中厨”铭文^[68]，另有“中厨印信”封泥^[69]，有学者认为是“中厨”是“中宫之厨”，中宫即皇后。但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宫中厨”来看，“中厨”应该不是中宫之厨，是相对于“外厨”而言，“宫”应该是指宫中。江苏仪征汉墓出土有“中厨”、“外厨”漆杯可为一证^[70]。“厨丞”则是厨官之长，为皇后太子服务，“中厨”、“大厨”和“厨”都是厨丞的属官。

二、南越国的食官制度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奉常是掌宗庙社稷祭祀的职官,祭祀自然少不了食物,所属食官有“太宰”、“诸庙陵园食官令长丞”、“雍太宰”;少府是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以给共养,所属食官有“太官”、“汤官”、“导官”、“胞人”等;詹事是掌管皇后和太子家事的职官,所属食官有“食官令长”、“厨”等。根据南越国出土文字资料,可将其食官属官分为三类,其中“中共厨”、“给祠”、“西共”应该是奉常下掌管祭祀的机构或官吏,主要负责提供祭祀的物品,包括食物;“泰官”是少府的食官属官,负责皇帝的饮食;“食官”、“中官”、“私官”、“厨丞之印”、“大厨”和“宫中厨”应该是詹事食官的属官,负责整个后宫的食物,为生人服务。汉代内史、主爵中尉下也有厨官,但南越国出土的文字资料与此无关。从发现的文字资料看,南越国的食官一部分承袭秦制,如“共厨”、“给祠”、“泰官”等,这与赵佗身为秦将不无关系,但更多是与汉代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另外,南越国遗存中还发现较多戳印“常御”铭文的器物,多在瓮、罐、甗等饮食器的口肩腹部,故有学者推测“常御”也是负责膳食的机构或官吏^[71],该铭款不见于其他地区,可能为南越国自创。

食官在周代始称“天官”,战国铜器铭文有不少“私官”、“中官”、“上官”、“下官”,研究者认为他们都属于食官^[72]。秦代正式称为“食官”,汉承秦制,汉诸侯国“同制京师”,因此食官在西汉诸侯王国屡有发现,如前所述,楚王有“楚祠祀印”、“楚大官”、“楚食官印”、“楚私官”,齐王有“齐祠祀印”、“祠官”、“大官”、“食官”,中山国有“长乐食官”,海昏侯有“昌邑食官”,长沙国有“食官中般”,广陵国有“服食官”、“中官”,代王有“清河食官”、“代食官”,常山国有“常山食官”等。相比之下,南越国的食官分工更为细致,也表现出南越国更为丰富的饮食生活。

南越王墓随葬饮食器多达 500 多件,包括烹煮

器、煎烤器、盛食器、酒器、饮器、温器、储容器、盥洗器及庖厨用具等,不少器内还发现有禽畜的骨头、粮食和果核,这些器类和器内食物多数与中原内地同期的出土物相同,烹饪方法也一致,表明岭南对中原饮食文化的认同,仍遵循着商周以来的“钟鸣鼎食”的饮食礼仪制度,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其他南越国时期遗存中出土器物及动植物情况与南越王墓情况一致。同时南越国“和集百越”,保留了一些越人的生活特色,如喜食禾花雀和鱼类等。这也从侧面说明,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尽管地处南海之滨,仍采用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第一次得到全面发展,饮食生活也变得丰富多样,在“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影响下,岭南地区快速融入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圈中,作为“开发岭南第一人”的南越王赵佗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1]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M].文物出版,2008.
- [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M].文物出版社,1991.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文物出版社,1988.
- [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M].文物出版社,1981.
- [5] 全洪.番禺“盐官厨”释读.广州文博(拾肆)[M].文物出版社,2021:88.
- [6]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M].文物出版社,1991:298.
- [7] 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122.
- [8] 全洪.南越王墓出土秦代“西共”银洗及相关问题[J].文物,2012(12).
- [9]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8(11).
- [10]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J].考古学报,2001(04).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

- 遗址秦封泥的发掘[J].考古学报,2001(04).
- [12] 刘瑞编著.秦封泥集存(下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683.
- [13] 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J].文史,2002(03).
- [14] 彭浩,陈伟,工藤元南.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70.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J].考古学报,2001(04).
- [16] 李炳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条疏证[J].潍坊学院学报,2011(05):130.
- [17]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M].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83.
- [18] 李志芳,李天虹.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M].文物出版社,2021.陈伟.胡家草场汉简律典与汉文帝刑制改革[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 [19]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08).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0:335.
- [2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M].文物出版社,1991:272、298.
- [22] 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M].科学出版社,2008:448.
- [23] 黄盛璋.新出信安君鼎、平安君鼎的国别年代与有关制度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2(02).
- [24] 刘晓华.咸阳市出土秦代铜壶[J].考古与文物,1989(06).
- [2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文物出版社,1978:138.
- [26]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J].考古学报,2001(04).
- [27] 贾振国.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J].考古,1985(02).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0:43.
- [29]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济南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08).
- [30] 李光军.两广出土西汉器物铭文官名考[J].文博,1987(03).
- [3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M].文物出版社,1981:92.
- [32] 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M].科学出版社,2008:447.
- [33] 袁仲一,刘钰.秦陶文新编[M].文物出版社,2009:31.
- [34] 《汉官旧仪》补遗卷一、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M].中华书局,1991:47、48.
- [35]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34.
- [36] 解希.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铜器[J].文物,1962:Z1.
- [37] 贾振国.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J].考古学报,1985(02).
- [38] 郑绍宗.河北行唐发现的两件汉代容器[J].文物,1976(12).
- [39]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08):11、12.
- [40] 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J].文物,1973(04).
- [41] 海昏侯博物馆官方网站[EB/OL].
- [42] 陈建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六辑)[M].岳麓书社,2010:351.
- [43] 黄展岳.南越木简选释.先秦两汉论丛[M].科学出版社,2008:447.
- [44] 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6(02).
- [45]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J].考古学报,2001(04).
- [46] 潍坊市博物馆,五莲县图书馆.山东五莲张家仲岗汉墓[J].文物,1987(09).
- [47]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J].文物,1991(10).
- [48]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111.
- [49] 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铜器[J].文物,1975(06).
- [50] 罗昊.武功出土平安君鼎[J].考古与文物,1981(02).
- [51]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J].考古学报,2001(04).
- [52] 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J].考古与文物,2005(05).
- [53]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M].中华书局,2006:96.
- [54]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河南三门峡市火电厂西汉墓[J].考

- 古,1996(06).
- [55] 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J].文物,1973(04).
- [56] 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333.
- [57] 朱德锡、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J].文物,1973(12).
- [58] 刘最长,朱捷元.汉茂陵出土的西汉“中私官”铜钟[J].文物,1980(07).
- [5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M].文物出版社,1991:272.
- [6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M].文物出版社,1981:92.
- [61] 南越王宫博物馆.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90.
-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文物出版社,1988:71.
- [63] 袁仲一,刘钰.秦陶文新编[M].文物出版社,2009:33—36.
- [6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8(03).
- [6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M].文物出版社,2006.
- [66] 王长启.西安市文物中心藏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1994(04).
- [67] 长沙简牍博物馆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J].考古,2021(03).
- [6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06).
- [69]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M].文物出版社,1987:38.
- [70] 南京博物院等.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J].考古学报,1992(04).
- [71]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淘金坑的两汉墓[J].考古学报,1974(01).
- [72]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J].文物,1973(12).

【责任编辑:陈童敏】

乡村振兴视域下失地农民转型的 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以增城区社区教育学院为例

李霞

(广州市增城区社区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城镇化发展不断推进,失地农民群体大幅上升,失地农民的转型与就业成为较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社区教育学院作为区域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专门机构,肩负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为此,本文以增城社区教育学院为例,阐述了社区教育学院针对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失地农民群体,主动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需求,加强社区教育学院的创新能力与服务能力,构建了“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社区教育模式”,强化失地农民人才培养,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关键词:乡村振兴;失地农民转型;社区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 G7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3)01-0109-04

“失地农民”转型就业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使命,如果“失地农民”不能及时转型就业,更多人没有田地耕种,农村剩余人口必然会急剧下降,农民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少,闲置的农村劳动力也会增多,“三农”问题就会越发严峻,从而阻碍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进程。随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的推进,“失地农民”群体转型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对“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的就业转型问题进行研究,从“社区教育”的角度,探索“失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社区教育模式与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通过拓展“失地农民”转型就业的路径和策略,探寻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路,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实现共同

富裕。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失地农民的一般特点与基本现状

(一) 失地农民一般特征

失地农民这一称呼具有一定的时代意蕴,失地农民是由传统农民转变而来,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导致“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丧失了对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正常的社会发展现象,随着农民“农业土地”的流失,诞生了一个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被称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一般特征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

收稿日期: 2022-12-25

基金项目: 广州市教育局教学成果培育重点项目《“一体两训,协同精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20123143)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霞,女,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增城区社区教育学院院长,研究方向:社区教育。

方面,一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农转非”速度必然会越来越快,土地被征用会越来越大,失地农民群体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多;二是失地农民补偿往往不足,很多农民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没有完全接受失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长远生计;三是失地农民因为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上自身文化层次不高,存在一定的社会保障风险,导致失地农民再就业较为困难。

(二) 失地农民的基本现状

以增城区为例,增城是一个面积宽广、农村人口众多的经济后发地区,地处珠三角东岸经济带黄金走廊,农村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 70% 以上。关于增城区“失地农民”的现状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20 世纪 90 年代初增城区“失地农民”开始出现,改革开放后,随着增城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用地从城镇向农村拓展,“失地农民”也随之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两次高峰。近年来,根据市委市政府对增城区域发展定位和功能布局,增城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大批农村土地被大规模征用,很多农民由此成为“失地农民”,在“失地农民”中相当一部分出现了就业困难、收入减少、生活质量下降的情况,同时,大批量“失地农民”就业不足也容易引发区域社会稳定隐患。二是失地农民的分布状况。据调查全区有七成“失地农民”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南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朱村、荔城、镇龙、中新、三江等广汕公路沿线镇,也有一部分集中在墟镇周边地区,如派潭、福和、正果、小楼等镇,此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同时也是招商引资的重点区域,为此,导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较大,由此产生的“失地农民”也因此较多。三是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土地被征用且被开发利用,“失地农民”就业状况要比中北路片要好得多。如永和镇新庄村被征用的土地都已建成厂房并投入生产,全村“失地农民”的就业就会有所保障,但永和镇贤江村的土地被征用后,至今未投入生产,导致“失地农民”的就业就十分困难,失业情况相当严重。^[1]四是失地农民教育现状。增城区失地农民文化素质总体偏低,以永和镇新庄村和贤江村为例,两个村的失地农民中近 70% 左右的农民只有小学至初中的

文化水平,导致农民自身思想比较落后,很难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加上长期生活在农村,很多失地农民对农民教育产生排斥心理,安于现状,不主动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和农业技能,逐渐被社会淘汰。

二、社区教育助推失地农民转型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性

(一) 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应该具备现代农业生产的先进理念。新型职业农民是对传统农民的现代化改造,对农民的现代素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应该具备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要求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能力。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应该具备现代农业经营的基本能力。新型职业农民不仅仅要懂生产,更要懂经营和管理,还需要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新知识的掌握者,新技术的使用者,是现代农业新业态的创新者,更是新农业生产的继承人与开拓者。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应该具备开辟农业生产多功能新业态的能力。新型职业农民应该要具有开拓和整合当地区域资源的能力,能够立足区域农业实践和农村经济发展,大力拓展农业新业态,将农村特色产品与当地生态旅游相融合,搭建集种植养殖、旅游观光、教育养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新业态。^[2]

(二) 社区教育具有提升失地农民转型的现实功能

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得到了快速发展,培育新型农民的政策支撑体系逐步完善,但各地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推进的过程中,持久性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根本问题。而社区教育具有民主性、开放性、现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适合农村、农民田园自由的生活环境,发挥社区教育的功能特性,盘活教育资源、激发创新动力、培育人文素养,可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长效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社区教育的独特之处,社区教育主要面对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居民,人员主体覆盖面较广而且相对群众化。另外,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相比较,其既包括学历教育又包括非

学历教育,既包括正式教育又包括非正式教育,既包括技能教育又包括非技能教育,所以社区教育的范围相对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而言,比较广泛,而且教育形式比较灵活多样,可随时根据教育对象的现实需求作出相应的调整,既有正规的学历教育,也有休闲的非学历教育,既有传统学校课堂教育教学,也有立足田野的现场教学;既有亲临指导的面授教育,也有远程的线上教育。^[3]总之,社区教育立足社区农民的个性化的教育和教育的便捷性,这为提升“失地农民”转型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失地农民转型的社区教育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失地农民转型,社区教育学院肩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增城区社区教育学院经过10年的教学管理实践,探索出了失地农民转型的“社区教育模式”,促使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社区化”模式逐渐成熟,特别是针对部分青壮年失地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体双训、协同精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所谓“一体双训”,即选择增城区域部分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失地农民,如有文化、年轻、肯学、有强烈就业欲望的作为主体,创建“双训模块”,通过对培训主体实施“专业学历培训+短期技能培训”的双训模块,使其失地农民主体成为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达到充分就业的教育目的。所谓“协同精准”,即创建“政校行企研”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协同机制,充分依据全区“三农”实际情况,协同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整合培训资源,持续剖析培训需求、培训效果等,据此精准选定培训对象、精准开设培训项目、精准配置培训师资、精准开发培训教材、精准组织培训管理、精准跟踪培训服务,有效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效性。“一体双训、协同精准”的社区教育模式,还配置了一套包含成人高考学历证书或新型职业农民中职学历证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结业证书、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四证”体系,紧密围绕证书的认定与颁发,对培训学员学习成果进行多元评价认定。总

之,通过“一体双训、协同精准”的社区教育模式,制定“失地农民”分批分类专业培训制度,注重培训过程质量考核和服务追踪,构建“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培训体系和服务体系。通过近四年的坚持,平均我区每年培训390人,到目前为止,共培训失地新型职业农民1639人,学员满意度为97.5%。从培育人数来看,男性占86%,女性占14%。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以下占21%,30-39岁占22%,40-49岁占26%,50岁以上占31%。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占63.5%,高中中专占27%,大专占9%,本科占0.5%,完成参训学习任务的失地学员的科技文化素质得以明显改善,专业生产技能水平显著改善。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失地农民转型的社区教育策略

(一) 制定认定管理制度,引导失地农民更好履行责任义务

社区教育学院要根据相关政策制定失地农民转型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制度,通过认定管理制度制定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管理办法,促进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升级转型。在认定管理制度制订的具体过程中,依据政府主导的方式、在遵循失地农民自愿的情况下、坚持认定的动态化管理,有序建立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转型的认定程序,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学员的个人档案,帮助失地农民积极认定新型职业农民,通过认定管理制度增强“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身份认同,引导其更好地履行责任义务。^[4]

(二) 深入乡村开展调研,制定符合失地农民特点的实施案

首先,社区教育学院通过深入乡镇、村社调研,精准遴选条件较好的适龄就业的失地农民,实行多种形式宣传招生,在全区广泛遴选不同种植业的优秀农民,对遴选出的培育对象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候选人,在选人上做到精准,再深入到果场、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调研,充分了解农业产业现状,掌握失地农民学员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生产经营状况、参训需求等各方面信息,创新方式开展失

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培育。^[5]其次,学院根据失地农民调研情况制定《广州市增城社区教育学院两年制失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方案》,按照“一体双训、协同精准”的社区教育模式,对学员实行“一班一案”,设置符合失地农民特点和意愿的培训课程。

（三）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制定失地农民灵活多元的培训计划

学院围绕区域主导产业,以荔枝产业为例开展灵活多元的培训。增城以荔枝闻名,学院在仙村镇基岗村村委设置荔枝种植理论教学点,挑选多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荔枝生产基地作为实训场地开展培训,培训专业技能岗位方向包括果树栽培、园艺栽培,设置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能力拓展课,开设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果树生产》《仙进奉荔枝简介与栽培管理技术》《现代农业创业》《农业信息网络应用》《植物生产与环境》《荔枝病虫害诊断与防治基础》《农产品市场营销》等12门课程。从荔枝的种到收,依据荔枝生产技术环节和农时季节开展全程培训;依据生产决策、过程控制、产品营销等关键时间节点和产业需求开展全程培训,以荔枝产业为立足点,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同时开设荔枝产业社会实践教学课程,通过实验、专业见习、技能实训、岗位实践等方式,有效解决失地学员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

（四）加强师资和资源建设，打造“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品牌

社区教育学院立足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加强师资与资源建设,积极构建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完整培训体系,打造“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品牌,培育一批技能型新型职业农民,为增城区域发展培养一批高素质技能人才。为此,根据课程设置的不同要求,社区教育学院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库,聘请了一批专业理论性强、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技术骨干和乡土人才等组成的讲师团队,建立了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在此基础之上,社区教育学院还应该进一步进行了资源的整合,围绕“失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从三农的角度,从理念更新、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生产经营等多维度构建“失地农民”向新

型职业农民转型的课程体系,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三大系列通用精品教材,打造“失地农民”升级转型教育培训品牌。^[6]

（五）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提升失地农民教学效能升级转型

社区教育学院在培训过程中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在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培育中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主要采取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线下集中学习主要通过多媒体信息化教学,灵活采取课堂讲授、小组合作、分组讨论、现场教学、情境教学和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进行;分散学习主要采用线上教学,学院基于学员的现实需求,通过互联网平台、APP平台等信息化方式,着力推广“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实现失地农民能够实时在线学习,学院教师则可以针对性地对学员的自主学习和教育实践进行指导和答疑。^[7]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进一步促进了社区教育线上咨询、培训考核与管理服务的一体化进程,大大提升失地农民教学效能升级,全面提升失地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助推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周俊豪.对广州市增城区失地农民就业不足现象的调查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4.
- [2]曾美环,赖文捷.广州市增城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实践经验与思考[J].中国农村教育,2019(13):3.
- [3]吴奕涵,顾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003):16-22.
- [4]桑宁霞,樊云静.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区教育的问题与改进策略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22(13):8.
- [5]李伟林,吴望春.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社区教育开展策略研究[J].成人教育,2012(7):4.
- [6]王冠赞.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区教育研究[D].云南大学,2016.
- [7]王佩.社区教育引领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困境及对策[J].职教论坛,2014(9):3.

【责任编辑：余伟】